



· 中共福建历史第二卷丛书 ·

中国共产党仓山历史

第二卷（1949—1978）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福建历史第二卷丛书 ·

中国共产党仓山历史

第二卷（1949—1978）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仓山历史. 第二卷, 1949~1978 / 中共
仓山区委党史研究室著.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4

(中共福建历史第二卷丛书)

ISBN 978-7-5098-3628-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党史—福州市—1949~1978 IV. ①D235.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0333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贾京玉 于国宁 (特邀)

复 审: 姚建萍

终 审: 李青建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70×240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6.25

印 数: 1—1500 册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628-6

定 价: 32.00 元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纂地方党史二卷”领导小组

组 长：逢立左

副 组 长：郑 龙 汪一朝 黄 玲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纂地方党史二卷”指导小组

组 长：黄 玲

副 组 长：黄超凡

中共仓山区委 《中国共产党仓山历史》编委会

主 任：杨新坚

副 主 任：何杰民 张为民 阮 锋 蔡 文

委 员：翁国平 林 宇 潘仰武 张 宙

陈 峰 刘毅宙 陈登峰 陈 甦

特约编审：黄超凡（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

执行编审：杨占城（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副调研员）

《中国共产党仓山历史》编写组

主 编：林建明

编 务：吴尚一 洪 晨 林 庚

前 言

仓山古称藤山，位于省会福州市南部，辖整个南台岛，总面积142平方公里，现辖5个镇8个街道。1945年10月，国民政府福州市仓山区公所成立，仓山区自此隶属于福州市。1949年8月福州解放后，作为福州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仓山区公所和水上区公所先后成立。1956年4月，福州市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仓山区和水上区合并成立仓山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仓山区于1968年9月更名朝阳区。1978年5月，朝阳区复名仓山区。

仓山人民历来有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许多有识之士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但都未能彻底改变悲惨的社会状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仓山人民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坚决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仓山策划的“台江事件”。在爱国反帝运动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仓山传播生根。1925年4月，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州支部成立；7月，共青团福州市地方委员会成立；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在党的领导下，为配合北伐战争，仓山地区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运动。仓山学生率先举起反对教会学校黑暗专制和奴化教育的斗争大旗，发起了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各行业工人纷纷加入福州店员总工会，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展开了合法的斗争；广大农民发起成立农民协会，为“减租减息，反对拉夫”、“反对苛捐杂税”，进行了积极的抗争。

然而，革命的征途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福州的国民党发动“四三”反革命政变，福州市党团组织因此遭到破坏，部分党团员分散到市郊凤岗、马鞍等地隐蔽。为此，中共闽北临委奉命重建福

州党组织，建立了福州办事处。同年底，中共福州市委成立。随后，吴耶鲁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到福州，住进仓前山塔亭医院，以此为联络站，开展革命活动，并成立仓山锯木支部，领导和重新发动仓山区一度沉寂的工农运动。其中，参与的福州电报工人开展收回英国大东公司电报营业权的斗争，打破了帝国主义对福建通讯业的垄断，震惊了中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仓山区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兴起。1932年9月，在仓山籍中共党员陈道、郑维新等人的积极筹划下，藤山乡民自动肃劣会成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唤醒民众，肃清日货，并发表《告全市同胞书》，推动了福州市肃清日货运动的迅猛发展。肃劣会活动以及后来发生的郑维新被枪杀事件，进一步把仓山区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抗日战争时期，福州两次沦陷，饱受奴役之苦的仓山人民，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比仇恨，积极投入抗击日军、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之中。1944年10月，针对日军进攻福州而组织的仓前山抗日反击战，虽最终失利，但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仓山市民积极参战更是书写了同仇敌忾抵抗侵略的壮丽篇章。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区人民以空前的爱国热忱，积极支援全国抗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闽江工委成立，着手开展建党工作，建立新的工作据点，并把发展党员的着眼点放在各大中专学校。1945年底，以英华中学党员为基础，中共福州第一特别支部在仓山成立，仓山区革命斗争的局面迅速打开。1946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在仓山麦园顶召开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适应新形势，在中共中央和平民主方针下进一步实行战略转变的问题，提出采取掩蔽游击战的特殊斗争形式，把恢复和巩固基本地区、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作为战略重点。在党的领导下，仓山区人民坚决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城市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起来。1948年初，省委地下联络总站迁至仓山，仓山一度成为党领导福建人民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人民革命第二条战线斗争的中心。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分兵三

路直取福州。仓山区党组织积极策应，组织力量配合解放军打通了万寿桥，取得福州战役的胜利。8月17日，福州宣告解放，仓山区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战乱频仍的局面，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

序

在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中共仓山区委党史研究室六年多的艰苦著述，《中国共产党仓山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仓山党史二卷）终于正式付梓，这是仓山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仓山党史二卷的出版，是中共仓山区委重视和加强党史工作的重要成果，也必将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既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29年，又是党在探索中国式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和曲折的29年。仓山党史二卷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全面地记载和反映了这段既波澜壮阔又最为复杂曲折的时期党在仓山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党史权威著作，也是对我区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生动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当前，仓山全区上下正围绕“生态仓山、人文仓山、智慧仓山”的发展定位，大力弘扬“敢于担当、敢于攻坚、敢于争先”的仓山工作精神，积极抢抓福州新区、自贸区等重大战略机遇，在更高起点上建设宜居宜业新仓山。我们要坚持以史为鉴，修好、用好党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了解和熟悉仓山地

方党史，并从中汲取营养剂，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助力新仓山建设。

中共仓山区委书记



2015 年 12 月

目 录

第 一 编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8—1956.9)

第一章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	(3)
第一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3)
一、仓山区解放及面临的形势	(3)
二、接管旧政权和开展社会改造	(5)
三、开展基层民主建政工作	(9)
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各人民团体的建立	(14)
第二节 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	(16)
一、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6)
二、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
三、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22)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25)
一、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25)
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28)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	(31)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制度在仓山区的初步确立	(34)
第一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	(34)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	(34)
二、贯彻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37)
三、实施“一五”计划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41)

第二节 开展社会主义改造	(43)
一、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43)
二、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9)
第三节 党组织的整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55)
一、开展肃反斗争	(55)
二、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一次党员大会的召开	(60)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63)

第 二 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1956.9—1966.5)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及其失误	(69)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69)
一、宣传贯彻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和党的八大精神	(69)
二、“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72)
第二节 反右派、“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73)
一、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73)
二、“大跃进”运动的掀起和全面展开	(78)
三、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83)
第四章 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和曲折	(87)
第一节 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	(87)
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局部纠偏	(87)
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与继续“大跃进”	(91)
三、开展新“三反”运动	(97)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左”的错误再度抬头	(102)
一、反“五风”和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	(102)
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06)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左”的错误日趋严重	(117)

第 三 编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及其终结

(1966.5—1976.10)

第五章 从内乱到区革委会的成立	(125)
第一节 全区内乱局面的形成	(125)
一、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	(125)
二、内乱局面的形成和党政领导机关瘫痪	(127)
第二节 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29)
一、“三支两军”和武斗的升级	(129)
二、建立“三结合”的朝阳区革命委员会	(131)
第六章 “斗、批、改”运动及纠“左”的努力	(133)
第一节 “斗、批、改”运动的开展	(133)
一、“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133)
二、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37)
三、整党建党和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40)
第二节 被扭曲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纠“左”的努力	(144)
一、被扭曲的国民经济建设	(144)
二、纠正极左错误的努力及受挫	(149)
第七章 1975 年整顿与“四人帮”帮派势力的覆灭	(155)
第一节 1975 年整顿	(155)
一、批派性和落实政策工作的起步	(155)
二、整顿工业企业	(159)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四人帮”帮派势力的覆灭	(161)
一、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61)
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162)

第 四 编

在徘徊中前进和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1976.10—1978.12)

第八章 拨乱反正工作的局部进展	(167)
第一节 开展“一批二打三整顿”工作	(167)
一、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	(167)
二、开展“双打”斗争	(170)
三、开展整顿工作	(173)
第二节 平反冤假错案和初步落实党的政策	(176)
一、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176)
二、初步落实党的政策	(178)
第九章 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183)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83)
一、整顿与恢复工农业生产	(183)
二、恢复与发展科学教育事业	(185)
第二节 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187)
一、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87)
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88)

附 录

大事记(1949 年 8 月——1979 年 2 月)	(193)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仓山区历届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任职时间表 (1949—1978)	(239)
后记	(243)

第一编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 年 8 月—1956 年 9 月)

第一章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

第一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一、仓山区解放及面临的形势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及第二野战军第四、五兵团各一部先后挥师入闽，拉了解放福建的序幕。7月上旬，第十兵团在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的指挥下，兵分三路进军福州。8月17日，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攻入福州，福州宣告解放，仓山区同时解放。仓山区的解放，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和战乱频仍的局面，仓山区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新生的仓山区人民民主政权将担负起率领全区人民建设新仓山的历史重任。

但解放之初，党和全区人民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政治方面，区人民民主政权还没有建立，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人民自己的组织力量还不够强大，城市中封建把头、帮会头子、流氓地痞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以及乡村中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还在为非作恶，直接压在人民的头上，甚至控制着基层的政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度尚未彻底摧毁，一些保、甲长依然仗势欺压农民，并借发行报户口等进行大肆敲诈勒索，农民还处在封建制度剥削下，敢怒而不敢言，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有计划地笼络和扶

植土匪，指使其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国民党潜伏下来或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国民党军队溃败的散兵游勇、妄图逃避打击的恶霸地主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相互勾结，形成了一股股“政治土匪”。这些土匪到处烧杀抢掠，造谣生事，破坏交通，袭扰人民政府机关和人民群众，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和生产的恢复。如反共救国军发展组织，印发反共传单，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威胁全区群众，谁要帮助共产党即以暗杀手段对付。此外，台湾的国民党军经常袭扰福建的沿海地区和港口城市，也给全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社会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和破坏。10月29日，国民党军派出4架飞机窜入仓山区仓前一带，投弹数枚，炸死3人，伤及数人。1950年2月7日，国民党军再次派出2架飞机轰炸仓山区，投下燃烧弹数枚，炸毁房屋40多间、楼房2座、民船11艘、死伤80余人。

经济方面，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的破烂摊子。全区民族工业极端落后，规模小、技术落后；产业破败，市场萧条，失业人员众多，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商业凋敝，物资短缺，国民党统治时期滥发的金圆券、银圆券导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恶化，一般百姓更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村经济十分凋零，农业生产困难重重，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破产农民甚多，外出逃荒、卖儿卖女的惨状随处可见。

社会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仓山区即成为帝国主义者福州聚居的地方，直至1952年底3名英国传教士先后撤离仓山回国，才结束外国传教士操纵仓山区天主教的历史。因此，区内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学校多、教堂多、洋行多，区内一些居民在其中任职。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是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一个重大问题。区内反动会道门组织众多，各类成员约有3300多人，约占全区人口总数为4.9%。如三青团有1个区队，4个分队，拥有分队长以上人员7名；一贯道有1个组坛，6个分坛，拥有点传师以上6人，坛主以下办道人员21人，道徒337人。他们在解放后仍积极发展新道徒入道，从事各种非法活动，气焰嚣张，妖言惑众，给全区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另外，解放初期福建省内疫病流行，尤以鼠疫、霍乱、天花三大烈性传染病最为猖獗，严重威胁全区人民的生命，加上缺医少药，人民群众得不到医疗保障。

鉴于解放初期这种复杂的状况和严峻的形势，仓山区党组织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去开展，还有许许多多的难题要去破解。

二、接管旧政权和开展社会改造

福州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各按系统，先接后管，坚持立场，逐渐改造”和“有准备、有秩序的接管”的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福州市军管会）于1949年8月26日派出军代表孙立保、尚慎华等人，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福州市仓山区公所、区警察分局。30日，福州市人民政府仓山区公所成立，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区长孙立保。9月3日，仓山公安分局成立，下辖麦园、仓前、上渡、下渡、舍人庙5个派出所。5日，福州市军管会任命孙立保为仓山公安分局局长。7日，福州市军管会免去孙立保仓山区公所区长职务，改派李新华任仓山区公所区长。仓山区公所下辖25个保、462个甲，共13635户，64077人^①。1950年1月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林森县（今闽侯县）管辖的白湖、双湖两乡划归仓山区管辖，9月又改划归郊区管辖。同年7月6日，福州市人民政府水上区公所成立，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区长杨坤^②，下辖洪山桥至魁岐水域及江南、江北两乡，共26保325甲，3312户，14808人^③。由于新成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尚不稳固，又要承担复杂繁忙的工作任务，且干部少而质量不高，广大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福州市人民政府决

① 仓山区公所：《政权建设总结》，1951年3月，福州市档案馆27—4—48。

② 1951年6月，由张汇三接任水上区区长。

③ 水上区公所：《建政工作报告》，1951年3月26日，福州市档案馆27—4—48。

定在仓山区和水上区继续沿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旧保甲制度，保、甲长均暂时留用。

为领导旧政权的接管改造工作，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工作委员会于1949年11月7日成立，作为市委派出机构，李新华任书记^①。区工委内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并在区直机关建立仓山区第一个党的基层支部。随后，中共福州市水上区工作委员会于1951年6月成立，书记张汇三。

在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为恢复全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新成立的区公所着手开展一系列社会改造工作。

仓山区公所成立后即着手开展全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于1949年9月6日成立仓山区军警联合办事处，着手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并对外籍人员进行登记，同时加强巡防，发动群众揭发和监视隐藏的敌对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鉴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不甘心失败，指示潜伏特务在仓山区刺探军政情报，策划反革命活动，仓山区公所坚决贯彻福州市军管会第一号令，禁止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等反革命组织开展活动。为维护社会治安，防止匪特捣乱破坏，区公所组织8个纠察队，共210余人，成立6个防护队，共150余人，晚上轮流进行打更巡逻工作。

解放初期，仓山区社会治安没有完全稳定，暗地里的贩毒活动仍然十分猖獗。1949年至1950年底，仓山区的贩毒分子在社会上收购大量伪银元券、黄金、美钞、港币，从广东汕头走私贩进烟土1.6万余两，数量巨大，导致烟毒泛滥，给全区人民的身心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危害。据统计，1949年8月至1950年8月，仓山区仍有烟民200余人。为此，根据福州市委的统一部署，仓山区于1952年6月下旬至9月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清毒运动。为加强领导，统一协调开展工作，仓山区清毒委员会于6月17日成立，区工委书记李新华任主任，区公安分局局长吴敏任副主任，区长姜

^① 1952年12月由张质珉代理仓山区工委书记，1953年4月正式接任，1954年7月由姜彬接任。

彬等7人任委员。清毒委员会着手开始收集材料，主要以公安分局为主，对全区走私贩毒情况进行全面的专案侦察。至8月14日，共摸清3个贩毒团伙的情况，逮捕扣押贩毒集团首犯3名，集训了7名二号烟犯。8月15日起，开展了前后2期的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向广大干部群众揭露毒犯的罪恶和毒品的危害，表明清毒的决心，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揭发各种贩毒行为，促使毒犯主动坦白。期间共计发动各种基层干部1141人，组成14个宣传站，召开各种会议634场，受教育人数38359人^①。紧接着，通过开展强有力的政策攻心，采取有效的斗争策略，抓紧对毒犯的审讯工作，挖掘线索，扩大战果，追缴藏货。同时，做好传讯登记和集训毒犯的工作，对全区凡在1950年2月24日以后有活动但不够逮捕条件的毒犯，由各派出所进行传讯审查登记，令其缴出毒品具结悔过，然后取保释放。9月5日至20日，运动转入整理材料和宣判处理阶段，共登记烟民201人、烟贩80人、烟馆26家，逮捕烟毒犯104名，其中，判处死刑1人，判处有期徒刑8人。通过清毒运动，打击了贩毒吸毒活动，基本上解除了烟患，提高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威信，并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为全区社会治安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仓山区公所着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0年9月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区长李新华兼任主任，部署开展群众性的防病灭鼠运动。1952年4月，仓山区公所组织爱国卫生宣传队，发动各单位基层干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工作，前后召开大小基层干部会议1406场，教育群众84107人，召开群众会议1117场，受教育213195人^②。通过这一系列的宣传动员，广大群众普遍提高了卫生意识，纷纷以实际行动投入运动，并订立了爱国卫生公约。

1953年2月，仓山区开展了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全区参加这次运动的共有32个行业，计有店员及手工业、印刷、机器、

① 《1952年福州市仓山区委工作综合报告》。

② 福州市仓山区委《1952年工作综合报告》。

食品、羽毛厂等行业工人 1447 人^①，分为两批进行，至 5 月结束。通过这次运动，广泛地对工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纯洁了工人阶级组织，巩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在手工业方面，通过运动的教育，认清了手工业正确的前途，认识到党对手工业的重视和帮助，使手工业者进一步靠拢了党和人民政府，提高了生产信心；并消除了资方的消极情绪，促进了劳资关系和师徒团结，资方增加生产信心添置生产工具，工人认识到技术不够，决心学好本领，师傅保证教好学徒，订立互帮互助互相督促的公约，对手工业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如富贵伞店通过这场运动后，工人发挥出高度生产积极性，克服了许多困难，提高了生产效率 20%，并使营业额超过原计划 1/3^②。与此同时，水上区公所也于同年 1 月 3 日成立运输改造办公室，着手对船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教育。5 月，水上区小驳船运输合作社成立。6 月，水上区开展船民民主改革补课，历时两个月，建立 9 个船民协会支会，会员 2350 人^③。此外，在福州市以行业为单位开展的评议 1952 年所得税工作中，仓山区负责 20 个行业，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所规定的税收负担政策，严格依法办理，不多征也不少征，在执行税法上则强调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充分协商，共同办税。在协商评议前，不少工商业者对所得税存有顾虑，害怕汇算过高，不相信政府的政策，协商评定的结果使全体工商户对税收的认识有了提高，加强了营业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 1950 年 5 月 1 日颁布之后，仓山区随即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并于 1953 年 3 月间开展了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首先，组织 627 名干部（其中脱产干部 101 人，不脱产基

①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姜彬区长关于 9 个月来政府工作情况及今冬工作任务的报告》，1953 年 10 月 29 日。

②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姜彬区长关于 9 个月来政府工作情况及今冬工作任务的报告》，1953 年 10 月 29 日。

③ 1956 年 4 月仓山、水上两区合并后，船民协会自动消失。

层干部 526 人)进行了学习,明确运动的范围、目的和政策,初步掌握了“坚持教育”的方针,并检查、批判了一些违反婚姻法的思想和行为。期间共召开各种大小群众会和各种类型座谈会 543 次,普遍深入地宣传婚姻法的基本精神与好处,受到教育的成年男女共 26256 人次,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通过学习宣传活动,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初步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减少了干涉婚姻自由和虐待妇女等现象。有些家庭不和睦的,经过宣传后自动改善了家庭关系,从而使男女婚姻自由、家庭民主和睦成为社会的新风气。同时,打破了过去认为“婚姻法是离婚法、妇女法”,“实行婚姻法天下要大乱”等种种错误看法。其次,通过模范评比活动,表扬了模范家庭 19 户,模范夫妻 18 对,模范婆婆 3 人,模范母亲 1 人,模范媳妇 2 人,为广大群众树立了榜样,也推动了婚姻法的执行。经过这场运动,申请办理婚姻登记的人数也有显著增加,9 个月来共登记 1028 人,比上年同比增加了 566 人^①。开展婚姻法的宣传教育,使全区居民普遍受到了教育,消除思想顾虑与批判错误看法,对新婚姻法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广大群众认识到旧婚姻法的害处以及新婚姻制度的好处,认识到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轻视虐待妇女、干涉婚姻自由是违法的行为。

三、开展基层民主建政工作

仓山区公所成立后,即着手开展改造基层政权工作,废除保甲制度。根据 1950 年 5 月福州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改造政权,整理户政”的决定,同年 8 月 9 日,仓山区民主建政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区长李新华、区公安分局局长孙立保、分局治安股长杨凯、行政专员张步余、驻军营副教导员毕政教等 5 人组成。翌日,区公安分局召开区民主建政工作人员会议,讨论通过《仓山区“改造政权,整理户政”28 天工作计划》,确定以原派出所为单位组成

^①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姜彬区长关于九个月来政府工作情况及今冬工作任务的报告》,1953 年 10 月 29 日。

中心组开展工作，组长由派出所所长兼任，以下按原有旧保分成各个工作小组，参加人员共 198 人。经过两天的紧张筹备，民主建政和整理户政工作按计划正式展开。12 日至 15 日，深入普遍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揭露各种散布谣言等破坏活动，并结合调查研究与培养，发现积极分子。16 日至 31 日，分组挨户上门登记、清查、统计户口，按每户每人的性别、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成分、民族、宗教信仰、婚姻等项目进行登记。9 月 1 日至 7 日，按每 50 户至 100 户左右成立一个居民小组。9 月 8 日至 10 日，按每 1500 户至 2000 户左右成立一个居民委员会。同时，确定居民委员会委员的三条标准（一是思想进步，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贤达或公正人士，二是贫苦市民和工人出身，三是烈、军、工属），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以投黄豆（蚕豆）的方式选出居民小组代表 559 名、居民小组正副组长 335 名，居民委员会委员 99 名和候补委员 16 名，共建立了麦园、仓前、观井、临江、新港、藤山、下渡、上渡 8 个居民委员会和 166 个居民小组^①。经过一个月的改造工作，全区解除了所有旧保甲人员的职务，停止了所有旧保甲人员的一切行政活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彻底摧垮了旧保甲制度，建立了人民自己的组织，明确了居民委员会号召和组织广大居民做好各项工作任务。

与此同时，水上区公所于 1951 年 2 月 25 日成立民主建政工作委员会，着手改造基层政权。首先将抗美援朝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了解审查并进一步加以培养教育，随后分别召开小组长会议，对他们进行建政工作的宣传教育，最后进行民主选举，通过投豆的方式选举产生居民小组代表和居民委员会委员。3 月 9 日，召开全区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彻底废除保甲组织，

^① 张步余：《仓山区废除旧保甲制度及基层民主建政简况》，1991 年 9 月；仓山区公所：《1950 年工作总结报告》，福州市档案馆 27-4-16。

建立了5个居民委员会和177个居民小组，并选举产生委员38人^①。

通过基层政权改造工作，一方面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另一方面调整充实组织机构成员，巩固基层组织，为推行人民民主专政和贯彻党的各项决策部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全区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1951年8月28日，仓山区、水上区公所撤销，分别成立仓山区、水上区人民政府^②，作为县一级政权机构。仓山区政府区长李新华^③，内设秘书室和民政、财粮、文教、建设、工商5个股，下辖公安分局、卫生事务所。水上区政府区长由张汇三兼任^④，内不设股，只配秘书和3名助理员，下辖卫生事务所。与此同时，中共福州市委于1952年7月决定撤销中共仓山区工委和水上区工委，分别成立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员会和水上区委员会，书记分别是李新华和张汇三^⑤。

在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作为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在贯彻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组织和发动群众完成各个时期工作任务、密切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联系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居民委员会区划范围过大、多头领导、工作任务不够明确，形成半政权性质的机构，一方面影响了居民干部的日常生产、

① 水上区公所：《建政工作报告》，1951年3月26日，福州市档案馆27—4—48。

② 1955年10月7日，仓山区和水上区人民政府均改称区人民委员会。仓山区人委设秘书室、民政科、工商科、卫生科、兵役局、人事科、手工业科、公安分局、房地产管理所、粮食管理站、税务分局等13个工作机构。水上区人委内不设科室，只配备秘书和若干助理员，下辖公安分局和卫生事务所。1956年4月12日，福州市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仓山区和水上区合并成立仓山区，并成立福州市仓山区人民委员会。

③ 1952年7月，姜彬接任仓山区区长。

④ 1952年12月至1953年11月，周德山接任水上区区长。

⑤ 1955年1月，汪茂森接任中共福州市水上区委员会书记。

工作与居民组织的健全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妨碍了群众参加公共生活和社会活动及与人民政府的密切联系。

为了改变上述现象，进一步加强城市的居民组织和工作，更密切联系居民群众，以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根据《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与《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仓山区人民政府决定建立以公安派出所的辖区为范围的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同时调整缩小以公安户口为范围的居民委员会。

这项工作从 1953 年 2 月 10 日起至 2 月 21 日基本完成，具体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2 月 10 日至 15 日，主要做好准备工作。一是由区长、区委组织部长及区妇联、区团委、区民政科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民主建政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区开展建立街道办事处、调整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工作，并按各街道办事处成立工作队。二是合理配备街道办事处干部。办事处主任一般由派出所所长兼任，没有所长的由第一副所长兼任。配备专职干部 27 名，其中，由区政府委派 8 名，吸收原居委会主任 11 名，工人 2 名，转业军人 1 名，基层干部积极分子 5 名。三是在区机关干部中进行广泛动员，说明建立街道办事处及调整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工作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主要做法，要求广大干部积极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去。四是干部分类排队结合划分地区同时进行，根据干部集中和分散情况，以 15 户至 40 户左右为单位，适当照顾地区自然条件和干部分布情况确定居民小组。干部分为三类，即：政治清楚、作风正派、办事公正、工作能力较强、能密切联系群众、积极主动工作者为第一类，列为居民委员会主任或委员；政治清楚、作风正派联系群众较好、有一般工作能力、热心为人民服务或工作能力较差，一般能完成任务者为第二类，其中较优秀的列为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或委员，一般的则为居民小组副组长；政治不清楚、作风不正派、思想品质恶劣、为群众所不满者为第三类，准备予以清除。五是居民委员会委员和居民小组组长由工作队选拔决定。六是召开区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建立街道办事处及调整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工作计划，并任命街道办事处人员。

第二阶段为2月16日至22日，主要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宣布建立街道办事处及全面完成调整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工作。一是于2月16日晚召开全区基层干部大会，进行宣传动员，并宣布各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名单。二是于2月17日以户口为单位成立调整居民委员会工作组，以街道办事处干部和派出所户籍警为主体，吸收第一类和第二类干部参加，在工作组统一领导下负责本户口段居民组织的建设工作。工作组组长由居委会主任担任，提名干部名单，召开群众会议进行酝酿，征求群众意见，做好选举准备工作。三是分地区召开群众大会。首先进行宣传动员，宣布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干部名单，以及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新划界的管辖范围，号召群众回去酝酿干部人选，以便在居民小组会上进行选举。四是有意识地互调工作干部，深入群众中酝酿征求收集干部人选名单，争取群众同意拥护推选。五是各居民委员会一般在20日选举工作基本结束后，分别在21日召开居民委员会委员会议，推选正副主任并进行委员分工和成立专门委员会。六是于2月21日结合发行新币宣传，向群众宣布新的居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时间和办公地点，并宣布原有居民委员会撤销，进行办理移接手续。

仓山区政府建立街道办事处、调整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是尽速地建立机构，健全了组织力量。全区在2月10日至22日短短的13天时间内，建立了6个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调整了原8个居民委员会为51个居民委员会和526个居民小组。全区各个街道办事处最多的有10个居民委员会，最少的有7个居民委员会；各居民委员会最多的有12个居民小组，最少的有9个居民小组；各居民小组最多的有43户，最少的有14户，全区户口数14742户，68557人。根据以上户口数和组织机构，配备了街道办事处干部27名，民主选举了居民委员会正副主任125名、居民小组长1463名^①，这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奠定

^① 仓山区人民政府：《仓山区建立街道办事处、调整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工作总结》，1953年3月6日。

了坚实的干部基础。二是选举工作既简便易行又发扬了民主，在群众中鉴别并教育了干部，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调整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的选举工作虽然仅短短 3 天时间，但群众表现出较强的民主意识，大都积极拥护选举，选出一贯积极热心、愿为群众当勤务员的好干部，对一些工作不深入、联系群众不够、作风生硬、个别态度恶劣的干部，不但提出意见，而且坚决不予推选，也不推选自普选以来不起作用的干部。这不但使干部能在广大群众面前鉴别出好坏优劣，而且使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民主教育，广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更加提高。许多当选上的干部反映说，只要好好地为人民当勤务员，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拥护，就会更快地共同地把国家建设强大，使大家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居委会组织范围的缩小和广大基层干部素质的提高，方便了居民参加公共生活和社会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各人民团体的建立

针对解放初期百业待兴的局面，为发扬人民民主，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民主建政，仓山区和水上区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向全区人民群众宣传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并成立筹备委员会，进行人民代表选举的具体工作。

1951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根据政务院下发的《大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仓山区和水上区分别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助区人民政府工作，开始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出席代表由区政府与各界人士协商决定，各 145 人。仓山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长李新华《关于解放两年来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区公安分局局长孙立保作工作报告，讨论确定今后十项任务。经过征求各方意见和代表小组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仓山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 19 人。此后，仓山区和水上区又多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

1952年2月13日，仓山区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45人。会议中心任务是贯彻福州市第二届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精神，发动全区各界人士继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以及在工商界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运动。11月28日至29日，仓山区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07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长姜彬《关于目前形势和贯彻劳动就业登记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区政府关于调整居委会区域划分的意见。1953年1月29日至30日，仓山区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45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长姜彬作《关于一年来政府工作及今后三个月任务的报告》和区公安分局局长徐永年作《关于镇压残余反革命分子及防空问题的报告》，讨论取缔反动会道门和镇压反革命任务。6月16日，仓山区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45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长姜彬作《关于区政府五个月来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确定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做好拥军优属、防空、防特和普选工作，号召全区人民大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保证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推行，充分发扬了人民民主，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实现了全区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同时，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行，推动了全区各人民群众团体的建立。1949年11月，仓山区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3人，王依铨任主席。1950年3月21日，仓山区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区农民协会，选举产生农民协会委员20人，王恭贵任主席。农民协会在带领全区农民进行各项社会改革，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政治参与意识，调整农村的阶级和社会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特别是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0年11月，仓山区、水上区成立分别由张玉英、陈照熹为

主任的民主妇女代表会，着手筹备召开区妇女代表大会。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工作，仓山区于1952年8月召开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100人，选举产生区妇联执委17人，成立了由宋宝琴为主任的民主妇女联合会。水上区也于1953年5月召开了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50人，选举产生区妇联执委9人，成立由薛碧轩为主任的民主妇女联合会。民主妇女联合会积极联系全区广大妇女，动员她们关心政治，学习文化，参加修订《爱国公约》，努力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同时，以生产自救形式组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扩大劳动就业，并组织参加全市妇女开展“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教育活动，积极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福州市工商联仓山区分会筹备会于1951年3月31日成立，并于1953年3月正式成立福州市工商联仓山区分会，选出执委会和监委会委员计26人，沈幼兰任主任委员。区工商联在宣传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引导教育广大会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福州市总工会仓山区办事处于1951年9月9日成立，作为市总工会的派出机构，主任施荫棠。区工会努力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团结带领各业工人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和经营，开展增产节约和技术革新活动，并参与企业管理，以实际行动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致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水上区、仓山区工作委员会先后于1951年12月12日、1952年7月成立，并团结带领全区青年团员和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二节 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

一、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解放初期，仓山区内潜伏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土匪、流氓、伪保甲长

等利用区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巩固之机，进行各种暗杀、破坏、造谣等活动，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安定，给全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引起了全区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认为美国已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复辟的时机到了，更是加紧破坏活动，妄图里应外合，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因此，坚决镇压区内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制裁一切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成为巩固区人民民主政权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同年10月，仓山区成立“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工作委员会”，在全区范围内对各种反革命分子进行登记。12月24日，福州市军管会依法枪决6名罪大恶极且抗拒登记的反革命分子并扣押一批破坏登记的特务分子后，仓山区内的各种反革命分子纷纷自首。至1951年1月15日，全区共登记各种反革命分子216名，收缴反动证件235件。其中，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分队长以上共173名，特务88名^①。

从1950年12月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仓山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开展了三期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共召开各种会议2572场，发动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426名，至1953年底，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26名、其他犯罪分子88名，其中依法判处死刑37名（缓期执行3名）^②，基本上摧毁了潜伏在区内的反革命组织，维护了全区的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仓山区于1952年2月9日取缔一贯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登记一贯道徒634名。1953年初，仓山区又进行了群众性取缔反动会道门及继续镇压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发动全区人

^① 仓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仓山区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② 仓山区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仓山区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民群众大胆检举、控诉、揭发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罪行，逮捕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他残存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并经过群众讨论，根据所犯罪恶轻重及民愤大小分别给予不同的惩办。其中，判处反动道首死刑 1 名，判处反动道首及残存反革命分子有期徒刑 9 名，判劳改 2 名，管制 1 名，释放 1 名。2 月 10 日，仓山区成立取缔反动会道门宣传办公室，举办反动会道门罪行展览会，召开公判大会，共动员全区 536 名群众从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自动退道，从而彻底摧毁了反动会道门的组织，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为了检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彻底程度，仓山区公安分局于 1953 年 4 月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动员并组织干警学习有关政策，划清反革命分子的界限，查清反革命分子。同时，在已进行过民主改革的重点居委会试点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复查判定工作，结合选民登记及选民资格审查等工作，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隐存的反革命分子与地主阶级分子。在试点的基础上，仓山区于 10 月 16 日起全面开展镇反复查判定工作，主要做法：一是组织干警学习“户口管理通则”、“劳动就业计划”等文件，并结合思想动员，统一认识，进一步查清区内反革命活动情况；二是结合挨家挨户进行户口更正补报、审查失业工人及散力工人的政治、经济、劳动力情况等工作，找出重点人物及死角、空白点等，并将所发现的问题与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找出疑点，找出线索，找出调查方向；三是结合粮食统销工作，对有破坏可能的重点人及重点米商采取公开警告与秘密监视、调查相结合，对重点地区采取公开巡逻与秘密监视及时收集反映动态相结合，组织专案侦破；四是采取重点调查与一般了解相结合，边查、边研究、边作出结论并处理；五是进行镇反复查判定总结，先由户口段提出问题，再以所为单位进行总结，提出报告，经分局提出意见及区委、市公安局备案，最后再由分局进行全区的总结，提出报告，报经区委、市局批准。通过开展镇反复查判定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全区的反革命活动情况，并作出了结论或处理。至 1954 年 2 月，历时三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胜

利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解放初期敌我矛盾还很突出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错捕、错杀等偏差，但总的来说，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结果，基本上肃清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反动会道门组织，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以摧毁性的打击，同时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全区人民热烈拥护并积极参加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很多群众起来控诉、检举，积极协助政府捉拿反革命分子。在镇反运动的威力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也引起了反革命分子内部的恐慌、动摇，许多反革命分子被迫向政府悔过自新，向人民低头认罪。由于大量反革命分子被肃清，全区社会秩序出现从来未曾有过的安定。在镇反运动中，群众也组织起来，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治安保卫组织。

二、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朝鲜爆发内战，不久美国派兵武力干涉朝鲜内战，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外来威胁，这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经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下旬，毅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此同时，为支援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仓山区内潜伏的匪特分子乘机造谣破坏，抗美援朝是惹火烧身、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国民党马上反攻等言论曾一度嚣张，使少数受美蒋反动毒害较深、不愿进步的反动落后分子随声附和，到处散布崇美亲美言论，制造恐美空气，企图造成社会不安。另外，由于仓山区外国领事馆多、外侨多、天主教、基督教势力雄厚，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在虔诚的教徒中崇美、恐美

的思想较为严重。针对这种状况，根据中共福州市委关于普遍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及贯彻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指示，中共仓山区委结合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活动，采取由内到外、从上而下的工作步骤，有计划有准备地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建立群众性、经常性的宣传队伍，发展宣传员 320 余名，^① 大中小学校组成了数十个宣传队。在各居委会开展时事学习，开办冬季夜校，进行研究讨论，用种种铁的事实，揭露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阴谋。挨家挨户进行宣传教育，先后举办小型漫谈及大型讲座 100 余起，召开控诉美国侵略罪行 50 余次。1951 年 1 月，仓山区工委在全区干部群众中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活动，消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把控诉运动从机关、团体、学校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通过开展时事宣传活动，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

为普遍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推进抗美援朝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相结合，仓山区于 1951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区各阶层代表 305 人参加。区长李新华作《三个月来抗美援朝情况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工作报告》，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作《关于目前形势与福建任务的报告》，区公安分局局长孙立保作《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订立抗美援朝的爱国公约、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签名、对日问题投票、五一示威游行等决议。会后，成立了抗美援朝支会，发动每家每户订立爱国公约，号召各阶层人民用实际行动做好当前，从而推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普遍深入开展，形成一股群众广泛参与的热潮。全区共有 5 万多人参与了这场运动，占全区总人数的 90%。^② 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农村中的抗美援朝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① 《福州市仓山区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工作总结》，1951 年，福州市档案馆 27—4—48。

^②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两年来工作报告》，1951 年。

通过组织下乡宣传队，对农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对全区人民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得到普遍提高，在思想上基本分清了敌我界限，澄清了“崇美”、“恐美”、“亲美”的错误思想，树立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念，确立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全区各阶层人民连爱国的教徒都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工厂、农村纷纷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学校广大学生纷纷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工商界则订立爱国公约，提出诚实经营、踊跃交税，以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区人民积极支持抗美援朝，先后有 800 多名青年报名赴朝参战或参加其他建设事业，开展了热烈的爱国增产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搞好生产支援前线，并普遍地订立了爱国公约。仓山区原定完成 3 亿元的捐献计划，截止 1951 年 10 月已达到 4.3 亿元，超额完成了任务。^① 水上区人民纷纷开展捐献运动，共捐款 549.54 万元，其中，第一居委会捐款 129.3 万元，第二居委会捐款 45.6 万元，第三居委会捐款 84.04 万元，第四居委会捐款 136.4 万元，第五居委会捐款 154.2 万元。^②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教育下，全区广大群众树立了“饮水思源，翻身报恩”的思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军队，尊敬优待烈军属成为一种社会风气。1952 年底，在评选优抚模范中，全区涌现出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拥军优属等各种区级模范 96 名，市级模范 5 名，省级模范代表 1 名，带动了拥军优属工作走上经常化。在优属工作上，贯彻了“政治优待为主，物质补助为辅”的方针，重点帮助烈军属解决生产、生活上以及就业、就学、就医等问题。运动开展 9 个月来，计发放生活补助金 6598 万元，补助 908 户、2857 人，发放生产补助金 645 万元，帮助 2232 户、5358 人解决了困难。

^①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两年来工作报告》，1951 年。

^② 水上区抗美援朝工作队《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总结》，1951 年 10 月 6 日。

1953 年春节和端午节，全区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拥军优属运动。全区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共有 46 个单位，有组织地对烈军属及驻军、伤病员进行了慰劳和慰问。如送贺年片，挂光荣灯、光荣牌；赠送鱼、肉、食粮、布匹、柑桔等许多慰问品，价值约 4795 万元；举行军民联欢或茶点晚会，招待烈军属聚餐、看戏、看电影，大大提高了烈军属的政治地位，激发了光荣感，也鼓舞了前方士气。

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这场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在国内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强大力量源泉。

三、基本完成土地改革

解放初期，仓山区农村的土地状况比较复杂，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地少人多，全区人均占有耕地仅 0.37 亩，且土地占有较为分散，农业土地与非农业土地互相交错，大体上，地主富农占 15%，中农、贫农占 55%，土地出租者占 11%，其他阶层占 19%。二是农民和城市居民交错居住，完整的自然村落少，全区 905 户中，完整的自然村落只有 1 个；非农业人口多，地主阶层中有许多兼营工商业或高级职员，农民中也有许多兼营手工业或副业，在自然村和混杂区中杂居着大批城市贫民、工人、手工业者等，他们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大部分生活贫苦，要求分地的愿望强烈；三是使用土地关系十分复杂，全区有根、面、佃关系的土地达 766 亩，约 500 多户；四是农村生产商品化程度较大，菜园、鱼池塘、果园等占有土地较多，经济作物种植较广，以供给城市需要。

根据 1950 年 6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及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有关精神，中共福州市委为领导开展市区近郊及水上区 5 个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提出了《福州市近郊农村土地改革几点意见》、《关于市区近郊农村土地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对土改中没收、征收和分配工作均作了

较具体的规定：1. 地主在市区近郊的房屋，其直接使用于经营工商业及《土地改革法》公布前已出租给私人使用的不动，租给农民的归农民所有，其他的多余房屋适合农民居住者没收分配给农民所有，不适合于农民居住者亦应没收充作公用或其他用途，其有关具体办法由区人民政府提出具体意见，经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处理。2. 工商业家尚未开始建厂的工厂厂基，无论已耕或未耕者，均一律收归国有，其已耕土地分给农民使用，未耕土地应视实际情况不同，确定是否分给农民使用，如果确能保证在《土地改革法》公布后三年内开始建厂，该项土地届时可以发还。3. 对工商业家在近郊农村中的土地财产，依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一是解放前已开始建筑的工厂基地，因故停修，未建部分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或雇人耕种，并在《土地改革法》公布之日起三年内无法继续修建者，应予以征收分配；二是解放后或接近解放前，因工厂停业，其基地为本人或农民所开垦者，不予征收，在开厂前可由原开垦人继续经营；三是工商业家租进为工厂作业用的基地，其所有权属于应没、征收范围者，应收归国有，但不予分配，由原经营者继续使用。4. 寺庙中僧尼私人占有的土地，不能并入寺产或与寺产同样处理，应按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划分其本人的社会成分，再按其社会成分处理其土地。5. 合股经营或轮营的鱼、池、藕塘及土地等，其中属于地主占有部分应没收分配，如系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非公轮田性质者，应不予征收，但应确定地权，依当地习惯合理经营。

1951年6月15日，仓山区土改工作队分成3片（下渡地区分2片，其他地区1片），分别进驻13个自然村开展土地改革。整个土改工作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放手发动群众，通过申报土地，摸清土地占有情况和地主、富农压迫农民的情况，并根据当地农民的迫切要求，掌握材料，培养诉苦积极分子，有领导地进行反对恶霸分子的斗争。在反霸胜利的基础上，从上而下地整顿组织，同时召开第一届区农民代表大会，宣传党的农村政策，改选区农会委员，清理部分不纯

干部。

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成分。首先在区农民代表大会上结合实例进行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宣讲，使代表们知晓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然后召开各村群众大会进行传达，结合各村具体情况，掌握区别地主与小土地出租者的界线，了解各阶层兼营手工业和兼营副业的情况，用边讲边划、自报公议的方式，先划出农民内部成分，后通过集中教育，对地主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划出地主成分。对那些难以划定的典型户、疑难户作出认真分析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在划分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准许被划户作自我辩解，并张榜公布，召开第二次区农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评定，努力做到各方公认，被划者口服心服。

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及抽补、调剂土地，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没收地主的土地、多余的房屋、浮财、农具等，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在确定没、征收的对象后，召开全区没、征收大会，对地主，要求交出田契，没收其土地，并要求其向农民承认错误；对工商业家、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等征收对象，则说清道理，指明前途，要求积极配合征收工作，尤其对小土地出租者采取协商方式，征收其土地一部分或全部。通过团结征收对象，缩小打击面，从而减少了土地改革的阻力。第二步，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出的土地以优先照顾贫雇农的需要为原则，并在分配时张榜公布定案，最后正式分配土地。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凡应没征收归国有的土地一律不予分配，交原耕者继续使用”，“但对个别生活困难而又善于耕种土地的贫苦劳动人民，仍须在土地使用方面给以适当调剂照顾”的指示精神，土改工作队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在土地较集中在佃中农手中而善于经营土地的贫苦劳动人民又居多的地区，在照顾原耕地后，抽出较多土地；佃中农超过当地中农平均数者，视抽出土地数量予以适当调剂，但应注意掌握被抽出土地的户使用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的平均数，补入户使用土地不超过当地贫农的平均数。二是在佃中农不多而使用土地很少的地区，则照顾面也小，从个别租入土地最多的佃中农照顾给个别

生活困难而又善于经营土地者。仓山区的小巷、补尾、田膝下 3 个自然村土地较集中在中农及佃中农手中，贫农租进土地也较多，因此抽补调剂也多。抽补调剂后，中农、佃中农每人平均有土地 1.2 亩，贫农每人平均也有土地 0.6 亩多，还抽出 30 多亩土地用于水利建设。^①

至 1952 年 7 月 15 日，全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共划定地主 17 户，没收、征收其田地 235 亩，分给 556 户贫苦农民。通过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使全区广大农民真正在经济上得到了翻身，促使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使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当年全区粮食总产量比 1949 年增加了 72%。^②与此同时，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极大地巩固了新生的区人民民主政权，为社会的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仓山解放之初，人心不稳，社会仍不安定，一些投机资本趁机扰乱市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甚至大搞金融投机，以致物价暴涨，一些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出现很大的波动。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解放初期新生仓山区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恢复农工生产，搞好财税工作”的有关部署，仓山区人民政府着手掌握全区经济命脉，建立国营经济，并着力整顿经济秩序，维护金融秩序和市场物价的稳定，解决财经税收等问题。

^① 《福州市近郊农村土地改革总结报告》，1952 年 8 月 16 日。

^②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 年 4 月 12 日。

仓山区解放后，在接管过程中，根据“原封不动、完整接收”的精神，对区内一些企业实行“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并依靠工人群众，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接管的企业和经济部门主要是银行、电力、邮电、交通运输等重要行业，控制了一大批粮食、棉布等重要的民用必需品，这就使新生的区政权掌握了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初步建立起区国营经济。与此同时，新生的区人民政府通过采取规范交易秩序、统一财经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着力稳定市场，稳定财政金融秩序。

1949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管会发出通知，宣布“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银元券’及地方一切货币均为非法货币，即日起禁止流通”，并明确规定人民币与银元券的收兑比价为2000：1，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银元辅券与银元券同价收兑。^①但由于长期受法币贬值之苦，加上对人民币缺乏了解和信任，对市场上投机行为有所防范，人们还是凭以往的经验信任银元券，因此，军管会通知发出之后，黑市银元交易价格上涨，以此为计价的粮食也随之上涨，一批银元券贩子和投机商人趁机大搞银圆券投机买卖，区内的国民党匪特也趁机造谣惑众，破坏人民币信誉，从而造成市场物价出现波动。针对这种情况，仓山区公所和水上区公所在全区范围内展开对人民币的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党的金融政策，声讨奸商投机倒把活动，并严厉打击一批银元券贩子和投机商人趁机囤积紧缺物资、大搞银元券投机买卖的不法活动，取缔金银黑市交易，从而刹住了由银元券引发的涨价风，很快平抑了市场物价。

仓山区公所认真贯彻执行福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福州市市场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申请交易登记手续须知》，致力规范区内市场交易秩序。规定，凡商品批发交易，均需集中在各交易所内进行，严禁场外交易、黑市买卖，严禁买空卖空、投机操纵行为；凡正当商店、作坊、行栈、国营公司、合作社等均可申请登记，批准

^① 《福州市军管会布告（金字第一号）》，1949年8月25日。

为固定交易员等等。通过加强对交易方、交易行为的集中登记管理，初步了解了市场供求状况。仓山区公所还于12月8日设立仓前、文藻巷、万春巷、敦睦里4个市容摊贩管理委员会，着手整顿市场，对流动摊贩、地摊划片定点，加强管理。

1950年3月，为了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节约支出，整顿财政收入，实行财政收支的统一管理。根据中央精神，福州市随即对仓山区、水上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行“三统一”管理，即：统一财政收支，集中使用财力，确保收支平衡；统一调度粮食、棉布、工业器材等重要物资；统一管理现金，各单位现金由国家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使用。同时，福州市还建立统一的金库、粮库和预算决算制度，并加强干部队伍组织纪律教育，坚决反对财经工作上无组织、无政府、无纪律和贪污浪费及渎职等现象。同时，为开源节流，福州市加强了对仓山区、水上区的税收征收工作，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征税原则，在征收过程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用自报查账、民主评议、依率计征和对一部分小业户定期定额等不同办法，克服工商税评议中畸重畸轻、政策变动等主客观因素带来的困难，不仅保证了财政收入，为初期的社会经济建设积累资金，而且加强了对市场的管控，利用和限制了私营经济，保护和促进了新生的国营经济，财政税收的经济杠杆功能逐步建立起来。此外，福州市还加强对仓山区、水上区的统一现金管理，打击金融投机，严格管理私营金融企业，从而逐步规范了货币管理，完善了金融制度。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国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①，仓山区公所和水上区公所动员全区人民群众积极认购，也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出了力。

^① 全国共发行1亿份，以若干实物的一定含量计算票面价值，年息5厘，分5年还本付息，偿还时随计值的实物浮动价格计算面值，以保护认购人的利益。

通过整顿和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建立统一的财政、税收、金融制度，仓山区、水上区的财经纪律有了较大的好转，市场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解放前由官僚资本操纵转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以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为目的，从而极大地维护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也为全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针对全国普遍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许多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福州市委的有关部署，中共仓山区工委和水上区工委随即召开区直机关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和部署。但在运动初期，由于部分机关干部对“三反”运动的认识和重视不够，甚至认为这是领导干部的问题，与自己无关，导致“三反”运动仅限于学习文件，学习各级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省委于1952年1月20日发出《关于继续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后，仓山区工委和水上区工委结合实际，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进一步作出动员和部署，发动机关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自我坦白，检举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1952年2月，仓山区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动全区各界人士开展“三反”运动，运动从学习动员阶段转入普遍检查阶段。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的方法，严格地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举揭发机关内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如盗骗国家资财，泄露经济贸易情报，侵吞公款公粮，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接受贿赂，伪造、涂改账目和单据，冒领公款，勾结奸商挪用公款，投机取利，盗卖物资，集体贪污等贪污行为，在建设和经营上以及机关经费上的浪费问题。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在群众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官僚主

义、铺张浪费和右倾思想，扫除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障碍和对运动的自由主义态度。区工委还认真贯彻福州市委关于处理压制民主的三项办法，消除群众的顾虑，鼓励群众参加斗争，大胆提意见，检举揭发问题。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三反”运动转入追赃定案处理阶段。仓山区工委根据贪污浪费情节的轻重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揭露从严，惩处从宽”的原则，分别对贪污浪费行为及贪污分子作出“正确的定案和适当的处理”。至5月中旬，仓山区“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区工委、区政府、公安分局、税务分局、卫生事务所5个单位共揭发出贪污分子45人，贪污金额共计1.77亿元（旧人民币，下同），退出脏款1.12亿元，共计判处徒刑3人，判处劳改1人，开除9人，撤职8人，降职3人，记过4人，警告1人，免于处分16人。^①

在“三反”运动中也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但总的来说是基本健康的。它正确贯彻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纯洁了机关内部组织，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同时，“三反”还是一场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对于营造健康的社会风气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三反”运动的进行过程中，又清查出一一些机关内部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内外勾结，侵吞国家资产的案例。鉴于这种严重情况，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作出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在工商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通称“五毒”）的“五反”运动。1952年2月，仓山区在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同时对“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作出动员和部署。“五反”

^① 《1952年区委工作综合报告》。

运动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阶层人民组成了统一战线，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不法资本家和奸商严重违法的罪恶事实，使他们陷于孤立。对重点户，采取自上而下的重点检查和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对有一般违法行为的资本家，着重摆明政策，讲清利害，要求他们选择坦白立功的道路；对一些劣迹昭著的不法资本家，则由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五反”运动注意掌握政策，坚持“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等基本原则，但也一度出现打击面过宽的情况，有的甚至采用逼供信方法，伤害了一部分愿意守法经营的工商业者，导致正常的经济生活受到一定的干扰。

5月，中央发出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的指示，规定了合理从宽的政策。仓山区“五反”运动核实定案工作基本上贯彻了“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做法，使定案处理工作做到比较稳妥合理，在工作中也注意掌握“团结斗争”的政策，对生产经营积极、态度较老实的资本家给予适当表扬，对生产消极、态度不老实的工商户则进行揭发批评。同时对工人进行“团结生产”的教育，着力解决劳资纠纷问题，并以贷款、收购、开展生产交流、加工定货等方式，协助部分工商户解决生产上存在的实际困难，从而使劳资关系逐渐正规化，大大提高了工商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信心，推动了生产。据不完全统计，在核实定案中，生产得到发展的146家企业中，工人团结资方搞好生产的有74家；生产得到恢复与维持的159家企业中，工人团结资方克服困难的有41家，^①由此可见核实定案工作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仓山区工会组织通过“五反”运动作了一番整顿，清洗了不良干部73人，提拔了运动中积极分子242人，开除坏分子28人，吸收发展了会员76人，新建22个联合委员会、2个基层工会、3个后备委员会、4个直属小组，共有会员1404人，这就扩大和纯洁了

^① 《仓山区五反核实定案工作总结》，1952年7月14日。

工人阶级队伍。在运动中，青年团组织也建立起来，吸收了 93 名青年工人入团，建立了 9 个团支部。^①

至 7 月，仓山区“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共划清 2748 个工商户的类型，其中，完全守法户 1215 户，基本守法户 1330 户，半守法半违法户 281 户，严重违法户 22 户，揭发出偷漏国家税收 54.47 亿元，偷工减料 1.14 亿元，盗窃国家资财 6.45 亿元，行贿干部 2.8 亿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203 万元，并揭发出其他欺诈暴利、私卖黄金、贩卖烟毒等不法行为计 15.35 亿元，最后依照工商户违法的情节及坦白程度分别给予罚金、警告、补税、退财等处分，共补税 15.68 亿元，退财 5.35 亿元，罚金 500 万元，补偿了国家一部分损失。^②

“五反”运动彻底击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在政治上使资本家低了头，在经济上肃清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树立了新的社会风尚；并且摸清了工商户的底，大大地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初步建立了新的劳资关系，提高了劳资双方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

仓山区解放以来，积极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致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新生的区人民政府对私营企业采取积极扶持和鼓励的政策，并努力恢复水电供应、邮电通讯和水陆交通，为工商业的复工复产积极创造条件。同时，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或利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广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消除工商界人士的顾虑，提振复工复产的信心。1949 年 9 月，福州市人民政府在首届各界代表大会上提出“协助复工复产，维持生产”的任务，并对复工复产有困难的工商户提供必要的扶持和帮助。工商业

① 《1952 年区委工作综合报告》。

② 《1952 年区委工作综合报告》。

复工复业后，由于当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购买力极其低下，却导致仓山区、水上区部分私营商店因生意清淡而停业关闭，一些私营工厂也因产品滞销、生产萎缩而停工倒闭。

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把合理调整工商业作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摆脱困境，并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根据福建省和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有关部署，仓山区公所和水上区公所从1950年5月起，着手调整工商业，限制和排斥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和奢侈品、迷信品工商业等，扶持和帮助那些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主要是在坚持公私兼顾原则的前提下，调整税收，调整国营贸易公司批发和零售差价，灵活掌握地区差价，以便疏通有无，调节供求，打击投机，并保障正当商人的合法利润。在调整劳资关系方面，主要是建立各行业“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在劳资双方同意下，在“劳资两利、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讨论有关维持生产、克服困难等事项。同时，在面对劳资矛盾时，认真贯彻“劳资两利、维持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既要求资方改变对待工人的错误态度和行为，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又说服工人照顾资方的实际困难，从长远利益考虑作出必要的让步，以维持和发展生产。在调整产销关系方面，由国营贸易公司收购茶、米、糖、木材等重要农产品，供应布、纱、煤油等重要工业产品，同时积极引导部分商业资本转向工业生产，并让国营商业把大量零售业务转交给私营商店或小商贩。通过合理调整，全区的工商业生产和经营基本恢复正常，并得到可喜的发展。

新生的区人民政府还十分注意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提高与巩固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方针政策，动员广大工人确立新的劳动态度，树立主人翁责任感，在生产战线上发挥积极性

和创造性，克服困难，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努力恢复和发展工业手工业生产。为解决火柴业的困难，福州市人民政府收购了仓山区内建华火柴厂生产的火柴 1000 多篓。至 1949 年底，仓山区内福建造纸厂、建华火柴厂、何同泰茶厂、福州铁器厂、民天食品厂等工业骨干企业均已开工。广大工人也纷纷表现出努力建设新福州、新仓山的决心和斗志。仓山区内福建造纸厂的工人们振奋精神，积极奋战，把日产量由解放前夕的 170 令增加到 210 令。随着工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到 1953 年，全区工业企业（含手工业）已达 750 多家，为 1950 年初的一倍多。同期，国家在仓山投资先后开办福州茶厂、造纸实验厂、五一锯木厂等国营工厂，区政府也创办食盐加工、锯木、纺织等首批工场。此外，农村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全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也推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

经过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革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仓山区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方面，区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和提高，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空前稳定，全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经济方面，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共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关系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前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开辟了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所有这些都为全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制度 在仓山区的初步确立

第一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随后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完整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根据中央的部署，中共福建省委随即动员和组织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

深刻理解和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弄清有关工业化时期所要遇到的工农业产品不足等各种困难问题，必须认清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和服从国家计划的必要性、重要性。当时，仓山区的粮食需求方面，区内共有6个派出所、8个居民委员会，居民13894户、57367人，约月需用米1606276斤（每人以28斤计）；机关团体等公共户口542户、10234人，约月需用米286552斤。全区合计共14436户、67601人，约月需用米1892828斤。另外，粮食使用商每月约需用米53175斤。粮食供应方面，农民约3600多人，大部分可以自给自足；部分机关团体公共户口与居民到粮食公司批

发部去批发，其余大部分居民及公共户口都在区私营米店、合作社以及零售公司购买。在计划供应前，全区私营米店共有 62 家，每月合计约售米 769552 斤；合作社共有 14 个（其中居民 4 个，农民 3 个，机关 2 个，工人 2 个，学校 1 个，郊区农民在本区设立的 2 个），每月合计约售米 516900 斤；零售公司 1 个，每月约售米 95000 斤。以上合计约能供应米 1381452 斤，其中私营商店约占 55% 强，零售公司和合作社约占 45% 弱。^① 公私营米店（包括合作社）在地区的分布上是不够均匀的，仓前、观井居委会比较多，麦园、上渡、新港比较少。

根据全区粮食需求和供应情况，仓山区深入开展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紧密结合粮食计划供应工作进行的，在具体做法上大致分两个步骤。一是从 1953 年 11 月 20 日至 29 日，广泛深入地宣传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与粮食计划供应工作。这一阶段主要采取大会动员、小会座谈的办法，大张旗鼓地向全区干部及广大群众进行正面教育。20 日，召开全区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大会，作党的总路线的宣传报告。次日，以居委会为单位开展小组讨论，提高对总路线的认识。22 日，召开第二次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大会，作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报告，同时各居委会以两个户口段合并召开群众大会，由区委指定报告员前往作报告，主要宣传统购统销政策，阐明计划供应工作的重要意义及购粮具体办法，劝告广大群众不要争先恐后购买粮食，不要轻信谣言。25 日，再次召开全区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大会，作总路线学习解答报告，出席人数计 1348 人。26 日，各居委会和基层工会进行小组讨论，共分 63 个小组，出席人数 1107 人。27 日，各居委会以户口段为单位（有的两个户口段合并），共召开 21 场群众大会，到会群众 5200 多人，听取工作队作的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报告。28 日至 29 日，以户口段为单位分批组织 250 场 10 余人至 20 余人的小型座谈会，开展讨论和交流。此外，还召开粮食业工人、商人、使用商与合作社干部会

^① 《中共仓山区委粮食统销工作总结》，1954 年 1 月 6 日。

议，并深入部分居民家中进行个别教育，使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全覆盖。二是从12月2日至7日，通过回忆对比，继续贯彻落实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工作。2日，召开各基层工会、青代会、妇代会、居委会等团体的主任会议，座谈四年来的工作成绩，并推荐培养开展回忆对比的骨干分子。3日，各工作队召开全体基层干部会议，由各工作队的报告员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结合当地实人实事进行宣传教育。4日，各工作队先分别召开一场典型小组会，进行回忆对比，积累经验。紧接着于5日至7日分批全面开展回忆对比座谈会。期间，共召开8场基层干部座谈会，参加人数达730人；共召开411场群众座谈会，出席人数达7638人，以一户一人计算，一般出席人数都在一半左右，最多时达三之二。最后，各工作队按户口段召开回忆对比总结大会，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总路线的认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后，中共仓山区委于12月8日召开全区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大会，由区委书记张质珉作宣传贯彻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总结报告，对总路线的内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等进行更深入的宣传教育。据不完全统计，期间共召开全区性基层干部大会4场，到会4849人；工作队组织召开的干部会议80场，到会3627人；召开群众大会69场，到会20436人。合计受教育人数约28912人，占全区居民总人口的50.3%。^①此后，仓山区委和水上区委又根据福州市委宣传部于同年12月23日下发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宣传工作报告》、1954年1月23日下发的《关于运用回忆、算账、对比的方法进一步在全市店员工人中进行总路线教育的计划》、1954年3月5日下发的《关于对店员工人进行总路线教育中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有关精神，在全区全行业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

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党、全体人

^① 《中共仓山区委粮食统销工作总结》，1954年1月6日。

民中间普及社会主义观念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学习活动。通过开展宣传教育，仓山区和水上区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解决了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问题，把思想认识基本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来，进而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同时，宣传教育工作也极大地调动了全区干部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使他们以积极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从而使总路线成为推动全区各项工作的力量源泉。

二、贯彻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针对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出现的全国粮食供需日益紧张的状况，国家决定在全国城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政策。根据福建省、福州市委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全区具体情况，仓山区委于1953年11月15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全区粮食计划供应工作，并决定在区委领导下成立仓山区粮食工作办公室，由区委副书记姜彬兼任办公室主任，区委委员分工负责，每日碰头讨论。区委抽调本区83名干部，以及省、市机关和军区等单位66名干部，合计149名，组成区粮食工作办公室与中心粮站，私营粮店均改为代销店，并按居委会成立8个工作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各1名，深入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及计划供应政策的宣传。参加此项工作的149人中，党员41人，团员68人，群众40人，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25人，一般干部117人。^①

仓山区粮食统购与公粮征收的任务是，粮食统购23万斤，征收公粮219606斤。区委委员会议前，仓山区即着手开展划分粮食供应区的工作，以保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11月12日起，首先布置派出所所长配合市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成员，调查了解各私营粮店过去每月营业、劳力与资金等情况，然后对各户初步做出保留与转业的意见，共了解59家（后又增加3家），准备保留55

^① 《中共仓山区委粮食统销工作总结》，1954年1月6日。

家，准备动员其转业 4 家。17 日起，开始对计划供应进行初步划分。首先召开派出所所长会议，对如何划分供应区做了讨论研究，根据各私营粮店过去自报营业额、劳力等情况，以每人每月平均 1 斤计，先给私营粮店划好供应区，再给合作社及零售公司尽量加大其供应任务，最后对剩余的户口，成立临时粮店供应，以便保证初期所有居民都有地方买米。初步划分的结果：私营粮店方面，除两家准备动员其转业未划外，其余 60 家共划给 6671 户、25804 人、752520 斤（其中，水上区 195 户、1090 人、32700 斤）；划给 8 家合作社供应的共 3611 户、13765 人、412950 斤；划给 1 个零售公司门市部供应的共 868 户、3506 人、105180 斤；划给 4 个临时粮站供应的 2654 户、11910 人、357300 斤。共计划给 13804 户、54985 人、1645950 斤，其中私商约占 45% 强。^① 以上所划均是居民，机关团体等公共户口吃粮均未划区，一律到粮食公司去购买，还有农民因秋收不久，家有存粮，也未划区。

计划供应区初步划好后，区委通过大会动员、小会漫谈以及加快回忆对比等办法，广泛地向基层干部及广大群众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意义。11 月 23 日，开始初步实施粮食计划供应，群众按照划分的地区带户口簿到指定粮店买米（数量暂不限制）。但初步实施粮食计划供应不久，就暴露出初划的供应区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如划给私营代销店供应的数字，有的不足以维持生活，有的粮商不愿转业却要求照顾，而该转业的未予转业，有的合作社划给的任务较少或未划，也反映会影响营业不能维持，部分合作社员要求回本社去买，有的群众反映划区远买米不方便等等。针对这些情况，区委对计划供应区进行了调整。先对私营代销店的收支情况做了几次摸底算账工作，结合摸底算账核定分配任务，最后按就地就人的原则，调整供应区。在调整时，根据实际情况，有的粮店（包括合作社等）以每人每月 26 斤计分配营业额，有的仍以每人每月 30 斤计。要求对回合作社的社员，经过合作

^① 《中共仓山区委粮食统销工作总结》，1954 年 1 月 6 日。

社调查征求意见后，也予适当照顾。农民则全部划归农民合作社，公共户口仍到国营公司去买，未划区。调整后的结果为：62家私营代销店保留的57家（其中动员搬家的3家），划归水上区管理的1家，动员转业的4家，4个临时粮店均撤销。共计划给57家私营代销店的共7931户、35123人、984874斤，划给12家合作社的共4182户、20675人（其中有公共户口约3000余人）、538762斤，划给零售公司的共570户、2290人、59540斤。以上合计共划12683户、58070人、1583176斤，其中私商占62%。^①

随着总路线宣传教育的不断深入和粮食计划供应的初步实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自12月8日起，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转入自报发证工作。一般分两个阶段进行。8日至13日为宣传教育与酝酿摸底阶段。首先召开全区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大会，作自报发证工作的动员报告，会后以户口段为单位进行讨论，然后由各工作队分头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传达。传达会上着重说明做好自报发证工作对国家与个人的好处、实施计划供应的具体做法及对人民群众多方面照顾，动员群众本着“吃饱不浪费”的原则，以“吃多少，报多少”的精神，酝酿食米数量，做到供应合理，计划准确。会后，各工作队一方面召开妇女、青年等座谈会，进行动员贯彻，一方面运用基层干部力量，通过召开小型群众座谈会及个别访问，了解思想情况，进一步宣传教育，并启发酝酿试报食米数量，结合进行摸底。工作队则有重点的掌握，并结合了解各阶层的食米数量，以便做到心中有数。14日至20日为自报发证阶段。在宣传透彻、酝酿成熟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先由典型介绍经验，采取先内后外、先易后难、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全区各工作队先后开展了自报发证工作，至20日大体结束。全面开展前，各工作队一般都选择一两个小组做典型试验，取得了一些经验后才全面开展。开展自报工作，先从干部开始，各队以户口段为单位，召开小组长以上基层干部会进行试报。试报后，动员他们在正式自报

^① 《中共仓山区委粮食统销工作总结》，1954年1月6日。

时，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然后按居民小组以每 20 人至 30 人为一组，分批分组开会自报。会前培养好带头发言人，选择一些较实事求是的基层干部或积极分子，让他们用算细账的方式自报，以启发影响教育群众。自报会开始时由工作队作简短动员，接着分开酝酿 10 余分钟就开始自报。为了便于掌握，有的地区采用先内部排好队，将比较老实的报得少的排在前面，然后点名自报，对报得不清楚的人则动员他们回去精打细算后再报。报完后，由工作队成员作简单小结，并将自报数字宣读一遍，即告散会。会后进行内部审查，为了避免少麻烦群众少开会，有的地区当场填发了购粮证，有的是过两天挨户分发送去。全区参加自报的共 48924 人，共报粮食 1405133 斤，平均每人每月 28.12 斤，每人每日 0.15 斤多。共核定粮油使用商 310 户，计大米 53175 斤，面粉 2049 斤、大豆 22715 斤、食油 7919 斤。^① 全区的自报情况基本上符合实际，为此后进一步做好粮油计划供应工作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数字。自 22 日起，全区正式开始按调整后的供应区凭证定量买粮。23 日，工作队任务基本结束，区粮食工作办公室与中心粮站合并办公。

在市委的领导下，由于区委的全力以赴以及全体工作队成员和基层干部的积极努力，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得到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全区基本上顺利地根据上级要求，实施了粮食的计划供应工作，并结合宣传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至 12 月底，共完成统购粮食 318095 斤，超额 38.3%；征收公粮 202406 斤，完成 92.1%，尚有 17200 斤未完成。^② 与此同时，通过实施粮食计划供应工作，加强了对粮商的管理与教育，改善了经营作风。

此后，根据“自愿量力，积极认购，合理分配，民主协商”的原则，仓山区于 1955 年 3 月间在全区推销 1955 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全区任务数为 112000 元，实际认购总额为 129735 元，超额完

^① 《中共仓山区委粮食统销工作总结》，1954 年 1 月 6 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粮食统销工作总结》，1954 年 1 月 6 日。

成 15.83%。其中，工商界任务数为 104000 元（包括个人认购在内），按行业成立 33 个推销小组，实际认购户数 724 户，认购金额 115705 元，超额完成 11.25%；居民任务数为 8000 元（包括什业小摊贩在内），以 6 个街道办事处为单位，实际认购户数 4903 户，认购金额 14030 元，超额完成 75.38%。^① 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使全区人民受到了一次现实的爱国主义与总路线的教育。8 月间，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城镇粮食“以人定量”的供应制度，仓山区按照“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和照顾生产的原则划分口粮等类别标准进行供应。首先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合理地进行评定等级，完成了任务，进一步压缩了不必要的销量。其次，核实了人口和定量，堵塞了漏洞，消除了粮食供应不合理的现象，在社会上树立节约粮食的新风气。“以人定量”的供应制度，既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又节约了粮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

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力求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将农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得到仓山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与支持。虽然造成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一度很紧张，在粮食供应上仍然有不合理的和浪费的现象，违法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总体成效还是很明显的。

三、实施“一五”计划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前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就根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部署，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全国各省市也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福州市“一五”计划于 1955 年开始着手编制，主要是编制 1955 年至 1957

^① 《仓山区人民政府一年来工作情况与今后任务的报告》，1955 年 10 月。

年的福州市国民经济计划。仓山区、水上区“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由福州市统一编制，列入福州市总体规划。

根据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以及在全国、全省平衡基础上的“三就”（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推销）原则，结合福州地处国防前线的特点，福州市“一五”计划以发展工业为主，满足地方需要，首先是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为主要任务。主要内容是：工业发展方面，主要是整顿现有企业，充分利用和发挥原有设备效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地方服务，个别为当前需要的可适当发展；进一步加强对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达到利用限制改造的目的。农业发展方面，郊区农业生产发展将尽一切力量增产粮食，大力发展油料作物、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为城市服务；发展互助合作，兴修水利，改变耕作制度，保证农业增产；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业。商业方面，在保证国营经济稳步增长的条件下，妥善安排私营商业，加强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私营商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以稳定市场，保证国家对私营商业的领导。此外，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城市交通运输业，并新建、扩建一些为农业生产服务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工业建设项目。

为确保“一五”计划的实施与完成，仓山区委、水上区委对全区广大干部、工人、农民、居民、学生等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阐明“一五”计划的规模和意义，并根据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和省、市委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号召大家努力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进行反偷漏税斗争，保证顺利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计划。此后，各单位纷纷订立增产节约计划，以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迅速展开。各单位积极开展技术管理宣传教育，提高管理水平，巩固劳动纪律，遵守操作规程，学习先进工作方法，找窍门，挖潜力，改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华光火柴公司工人积极响应号召后，杆部车间由原来每百斤木头出 56 斤杆，提高到每百斤木头出

62 斤秆。

1955 年 8 月，福州市委发出《关于工厂企业开展全面节约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市工厂企业中先行一步，开展节约运动。仓山区委、水上区委随即号召广大职工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养成节约的风气，进一步深入开展劳动竞赛，为完成“一五”计划而奋斗。各厂、各单位运用不同方式，组织职工群众开展劳动竞赛，提合理化建议，动脑筋，想办法，改良配方，寻找替代品，降低成本，改进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实现安全生产，完成节约指标。造纸厂工人进一步学习苏联用稻草煮制纸浆的先进经验，使每吨有光纸降低成本 120 余元。火柴厂技术人员改良联合切杆机，出杆率提高到 72%。1956 年 4 月，根据中央及省、市委的指示精神，仓山区委、水上区委把增产节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生产者组织起来，广泛深入地开展先进生产者教育运动，教育动员广大职工学习先进，向先进看齐，推广先进经验，改进与提高技术，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进一步推向高潮。随着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深入开展，全区各行各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为“一五”计划的最终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开展社会主义改造

一、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后，个体农民是土地的小私有者，在当时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如果不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发生两极分化，即少数人靠剥削致富，大多数人重新陷入被剥削的贫困境地，甚至动摇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同时，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仅仅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并不能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解放初期，由于长期受封建半封建制度束缚和压迫的仓山区广大贫苦农民连最基本生产资料，如种子、农具和资金等都十分不足，维

持简单生产很困难，农忙时又缺乏劳力，造成农村许多男劳力因生活所迫，多外出当店员或从事手工业谋生，种田多靠妇女手工耕作，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更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为解决个体生产带来的种种困难，联合起来进行互助合作，也就成为当时农民发展生产的自发要求。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其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只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一些劳动协作和共同使用耕畜和农具。1951年春，为响应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发出的关于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仓山区农会委员菖蒲村农民林发泉带头联合几户播种、耕草能手，自动组成临时互助组，在农忙时为左邻右舍缺乏劳力的家庭帮工。互帮、互助、互利使他们尝到了甜头，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的主观愿望。此后，经过各级党组织不失时机的引导，临时生产互助组逐步发展起来并转为常年互助组。建新乡以典型引路，树立了洪塘黄国基、楼下林玉溪、山东岭王良柱3个互助组的典型，组织农民参观互助协作的成效，使全镇80%的农户先后加入了互助组的行列。盖山区以每10户左右编为一个互助组，广泛开展帮工互助，解决和调节贫雇农无农具耕作、无耕牛使用及劳力缺乏等问题，并注重搞好“论工评分”工作。至1952年7月，全区13个农业自然村普遍成立了临时互助组。

为推动全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整顿和巩固已成立的常年互助组，仓山区着力采取三条措施，做好“引导、发展、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一是大力扶持。通过召开支部会、扩干会、动员会，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扶持新生事物的意识，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扶持一批，巩固一批，发展一批。二是培训骨干。层层分期分批对互助组组长进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和互助组的组织原则以及怎样当好组长等方面的强化轮训，进一步提高骨干分子的思想觉悟和组织领导能力。仅城门区就举办了30多期培训班，轮训骨干1337名。三是典型示范推广。派出工作组和组织农民协会会员，抓两头带中间，帮助互助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农业生产和记工评分中的实际问题。同时，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村，重点试

办部分常年互助组，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城门区在潘敦和敖峰两村试办的互助组，影响面大且极具特色，吸引了不少农户前往参观取经。

由于认真执行“积极慎重，稳步发展”的方针，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全区农业生产互助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广大农民普遍感到，组织起来后的生产确实比单干时搞得好。到1953年春，仓山地区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已占全区农户的65.8%。同时，组织和发展互助组，对恢复和发展全区农业生产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许多互助组依靠集体力量，对农田进行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推广种植季稻，粮食生产增加幅度普遍超过当地单干农户。建新地区粮食单产由解放初期的200市斤提高到400市斤。为确保农田水利灌溉需要，不少互助组还联手大兴修水利。1952年底至1953年春，建新、城门、螺洲等地动员全民进行民办公助修筑防洪堤，广大互助农民自带口粮、工具、被盖到一线，不计报酬筑起了千里村堤和沿江堤防。洋洽水闸、翁排排涝站、淮安涵洞等数百处水利设施相继建成，初步解决了长期内涝、干旱缺水等问题，使上述地区粮食单产由解放初期的200余斤提高到400余斤。“筑防洪长堤建水利设施”，确保旱涝保收，充分显示了互助合作的强大力量。

党的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村政策，客观地反映了获得土地后的农民要求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的要求，为广大农民指出了一条“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避免了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危险性。为了巩固和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成果，适应国家建设对农业发展的要求，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福建省委随即对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贯彻，省、市、区农村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征，在分配上，其纯收入扣除农业税、公积金和公益金后，余下的大部分在社员之前按劳分配，小部分以土地分红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形式付给社员。

早在同年春，仓山区就开始试办初级社。在试办和发展初级社

中，各级党组织针对互助组创办以来暴露出的矛盾，如农忙季节帮工先后的矛盾，由个体素质因素差异所产生的有人怕吃亏、有人占便宜的矛盾，以及小农经济无力购买大型农具或进行必要的农田基本建设等问题，广泛宣传党的总路线，开展向著名的福州市郊郑依姆合作社和盖山郑依水初级社学习的活动，积极引导、帮助先进的常年互助组，自愿申请试办初级社。在试办中，坚持“典型示范，自愿入社”的原则，有效地调动了农民入社的积极性。建新乡在积累互助组经验的基础上，继续以典型引路，将先进的常年互助组转变为初级社，并通过试点增加了台屿陈世清、下镜郑基细、高宅陈孝仁等一批重点示范初级社。初级社实行土地私有制评估入社，统一经营、记工、评分、分红的制度，不到一年时间里，建新乡初级社就发展到近百个。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1955年底，仓山区入社农户已占全区总农户的73.5%，仅城区就有19个初级社，1200多农户参加。仓山区委根据市委部署，以《宪法》为动力，以生产为中心，以统购统销为重点，依托初级社，搞好农副业生产。为了不影响城市供应，还采取限制茉莉花生产、多种植油菜类和瓜果类作物，扩大蔬菜生产合作社数量等措施，缓解城乡供需矛盾。

在初级社发展阶段，仓山区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交错并存，农民粮食需求大部份可基本自给自足。通过广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仓山区城镇居民以户口簿划分的地区实施粮食计划供应，同时，通过粮食供应区的调整，农民户口全部划归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的建立，使社员再次尝到甜头，感受到初级社比互助组有更多的优越性。一是集体主义思想日渐增强。社员们说，互助时大家常为争先干自己田里的活，吵得脸红耳赤，办了合作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分红，不论哪块地，只要多打粮食都有自己的一份，相互间更加团结了。二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购买较大型农具来发展生产。初级社期间，全区共利用集体劳力（每个劳力平均15个工时），修筑高度在8.92米至11.65米之间的防洪堤总长约85公里；改善了12500多亩“锅底田”的排灌条件；90%以上的初级社利用积累购

买了耕牛和一批犁耙等农器具。三是劳动力得到合理使用。创办初级社，扩大了生产劳动范围，不管强弱劳力都可以按特长进行科学分工，按劳分红，并将社内剩余劳力组织起来，发展副业生产，做到农副结合，增产增收。四是依靠集体力量抵御自然灾害侵袭。仓山地处闽江下游，历来水患严重。初级社期间，多次遭受洪水大潮袭击，农作物损失惨重，但社员们依靠集体力量抗灾，仍取得农业生产好收成。1952年7月该区遭受特大洪水侵袭，当年75%以上初级社仍取得丰收，充分显示了集体互助合作组织的抗灾力量。

由于新办初级社的大量增加，在一些办社条件尚未成熟的初级社，社员思想不通，经营管理无序，生产又搞不好，部分行政村在市区规划调整后又出现了管理混乱的现象，许多农民颇有意见。针对上述问题，仓山区委根据省、市委的有关指示，决定暂停发展初级社，先在林浦乡试点整社工作，随后在全区掀起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两条道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整社运动，从而有效地纠正了政策偏差，扭转了一度紧张的中农、贫农关系，使全区初级社普遍得到巩固、提高和发展。

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集中论述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紧迫性，强调“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要求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不要当“小脚女人”^①。仓山区和省、市其他各地农村一样，迅速组织传达贯彻，在全区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各初级合作社的农户纷纷联合起来，大办以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为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在“赶先进、提前高级化、快马加鞭进入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巩固提高”的方针和“自愿入住”的原则被放弃了，全区上下出现了比办社数字、比办社速度、层层分配办社指标、处处硬性动员入社的现象。1956年1月间，全区共办起4个高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页。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 90%。另据当时仓山区委一份上报的《综合报告》记载，城乡接合部 1300 多户农民，仅用一天时间分片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并成立筹委会，三天内办起 4 个高级农业合作社。许多农民在一片“反右”声中，敲锣打鼓送喜报，纷纷宣告成立高级社，也有一部分农民抱着“大势所趋，反正都要入社，迟入不如早入”的思想勉强入社。至 1956 年底，全区通过“转让”和“新办社”，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区总农户的 97.5%，土地有 3487.29 亩，占土地总数的 95.8%。其中，城区共组织了五星、万里、金星、联建、燎原 5 个高级社和 1 个仓山蔬菜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 1565 户，占城区总农户的 99%。^① 至 1957 年上半年，全区基本上完成了农民个体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集体经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在办高级社的过程中，农民中主要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办高级社可发展生产。绝大多数农民经过几年来农业合作化生产实践，体验到集体经营的好处，同时又感到初级社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因此要求办起高级社发展生产。另一种是认为生产资料归公怕吃亏。土地无代价入社，大农具、果木折价入社，劳动力以投资形式入社等等做法，改变了农民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当时有 10% 的农户思想有所顾虑，不愿入社或等待观望，特别是田多、有经济作物收入的农民更不愿入社，怕入了高级社无地租收入吃亏。为了提高办社速度，仓山区各级党组织加大宣传教育力量，解决一部分农民思想顾虑。仅建新乡、城门区就先后召开动员大会 120 多场次，号召群众报名入社。在建社过程中，仓山区委抽调了 100 多名干部到示范高级社任职，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区委还提出要从生产入手，边抓生产边办社的要求，反复强调，办高级社不能强制，更不能采用暴力；要采取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财政适当援助的方法；要实行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来兴办高级社。基层党组织积极按照区

^①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 年 4 月 12 日。

委要求，在办社中继续组织劳力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副业生产。为改良土壤，还组织农民挖河泥，进城运人粪垃圾等，使当年大部分高级社实现增长增收的目标。

然而，由于在发展高级社过程中，各级党组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新办起来的高级社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按劳分配不落实，“吃大锅饭”思想开始抬头。有些社员认为现在是给社里干，干多干少一个样，出现了“出工一条龙（排队去），种田一窝蜂”，出工不出力，怠工浪费现象严重。二是社员对政策不落实有意见。因取消了土地入社分红，耕牛、农具、花果木等折价低，兑现少，社员利益受到损害，导致出现了社员思想动摇闹退社，甚至出现偷换粮种、盗窃农器具、私自外出打工等现象。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违背了客观规律，不顾实际条件，搞并社升级，办大社和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自愿结合，照一个模式去搞“快马加鞭进入社会主义”、“单干农民可以一步登天”，并且在合作社经营管理上，没有认真地研究和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按劳分配原则也没有得到充分贯彻落实。究其原因，一是“左”的错误思想激发了高级社的大发展；二是脱离实际，降低办社条件，一个劲地缩短实现高级社的时间；三是过高地估计当时农民办社的积极性，否定了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问题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都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为“人民公社”的一哄而起埋下了伏笔。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关系改变农民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场社会大变革，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实现了土地的公有化，标志着对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从总体上看，农业合作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积极、稳步和健康的，因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仓山区基本没有大型工业，手工业作为地方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弥补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以及特种工艺品出口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就其生产方式及发展现状而言，它又是分散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不能使用新的技术。因此，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任务，就是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1952年，仓山区委结合手工业民主补课运动，着手开展关于手工业生产和改造方面的调查工作。总路线提出后，区委正式成立了区手工业生产办公室，开始全面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方面对广大手工业者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手工业在过渡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为实现合作化打下思想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加工定货、收购包销和银行贷款等措施，维持、扶持和发展生产，为进一步实现对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1953年，全区共有9个行业，由因困难不能维持或仅能维持不能发展，经国家援助后转为能维持发展。据统计，1954年共有20多个行业接受加工定货和包销。1954年6月至1955年5月，全区定货包销总值为240462元，加工的工缴费16283元，有19个行业取得了国家贷款55395元，使广大手工业者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私商和高利贷的剥削，促进了生产和合作化的发展。另据资料统计，全区手工业者从1953年前的677户、从业人员1805人，增至1956年3月底的817户（增加20.6%）、从业人员2163人（增加20%）。如雨伞业1950年有4户、24人，1954年增加为5户、36人，产值也由2385元增长到7646元，增加2倍。^①

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手工业生产小组，首先从供销方面把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有组织地购买原料、推销成品或接洽加工业务。这是广泛组织手工业劳动者的初级形式。第二种是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是由若干手工业劳动者或几个手工业生产小组组织起来，统一购买原料、推销成品，统一承

^①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年4月12日。

揽加工订货，并以业务经营中的积累来购置公有的生产工具，进行部分的集中生产，逐渐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第三种是手工业生产合作，这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其中一部分社的主要生产资料已完全归社员集体所有，完全按劳分配，已经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另一部分社的主要生产资料尚未完全成为集体所有，实行工具入股分红，统一经营，收益的一部分采取按劳分配，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仓山区委根据党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视行业的不同性质，分别对区内 500 多家手工业采取不同形式组织起来。1951 年 6 月，福建省工业厅在仓山区港洲路 30 号创建地方国营造纸实验厂，当年底建成投产，是区内第一家国营工厂。7 月，福州市人民政府结合整顿火柴市场，以仓山区内港头建华、南光两家火柴厂为基础，合并全市数十家大小火柴厂，由国家投资 70%，设立福州华光火柴公司^①，成为区内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同年底，又建立福州脱胎漆器有限公司。1952 年 5 月，经过广泛宣传发动，仓山区 20 多户藤器个体户自愿组成全区首家生产合作社——仓山藤器生产合作社。至 1956 年 6 月，全区共有生产社 25 个，供销社 2 个，生产小组 11 个，社（组）员 1975 人，占全区 2163 名从业人员的 91.6%，^②基本上完成了全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对老社组织起来后开展的一系列整顿巩固工作，以及调配充实新社（组）的力量，手工业组织起来的优越性逐渐发挥出来，广大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大部分社（组）生产、业务均较原有扩大，产量、质量均有了提高。如脱胎社原来因材料使用不当，造成产品不合格，经常返工，每月平均损失 160 多元，通过加强技术管理后，质量大有提高，至 1956 年 2 月止，合格率从 84.18% 提高到 98.49%。藤社原来织一张藤席需土藤 12 斤 8 两，经过改进技术、加强管理后，每张藤席只用 9 斤 9 两，比原来降低

^① 1958 年 3 月改为国营福州火柴厂。

^②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 年 4 月 12 日。

成本 7 角 6 分。据 3 个老社资料统计，1956 年规定的生产指标比 1955 年增加 95%，降低成本 10%。劳动竞赛在老社中得到普遍开展，新成立的社（组）群众生产积极性比过去也大有提高。如铁器社打锄头小组由一天打 8 把提高到一天打 12 把，很多社员主动到处争取业务，扩大生产。木桶、白铁组织原来供销有困难，由于干部群众积极想办法，克服了困难，生产比过去还有扩大。与此同时，手工业者的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全区实现合作化后的 690 户手工业者中，增加收入的有 609 户，占 88%；保持原收入或收入降低的分别仅有 38 户、43 户，只占 5.5%、6.5%。每人每月工资最高 28 元，最低 5 元。^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总路线提出的三大改造任务之一。1953 年以前，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为主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私营工业中已有发展。仓山区委积极贯彻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结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充分暴露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本质，提高广大工人群众的觉悟，为私营工商业改造创造有利的条件。1952 年 11 月，福州市消费合作社仓山总社、三塔儿消费合作社、仓山供销合作社合并为一家国营、集体合资企业，下设 7 个供应点和 1 个门市部。1953 年 1 月，水上区成立运输改造办公室，对船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5 月组建小驳船运输合作社。同年，仓山区开始贯彻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将粮、油、燃料纳入国营轨道，私营店转为国营代销店；同时，率先对木材运销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福州贮木场，实行木材国家专营。

总路线提出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新阶段。由于总路线的教育，广大群众日益向往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逐渐认识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唯一的光明前途。1953 年下半年，仓山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摸底调查，统计全区私营工商户共 2000 余家，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好准备。1954—1955 年，在国家

^①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 年 4 月 12 日。

减免税和供销优先等倾斜政策的引导下，在私营企业工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仓山区食品、造纸、制茶、锯木等工业主要行业均实行了合并和公私合营。1954年8月15日，仓山区对私营棉布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11户私营棉布商合并为4家代销店、经销店。8月30日，设在仓山洋洽的福州市最大食品厂——民天食品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12月，仓山区成立2个国营百货门市部和16家供销合作社，对私营工商业者实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1955年3月，仓山区制茶业开始公私合营。9月，仓山区62家私营粮油代销店经社会主义改造，合并为17家国营粮油店。同年底，区内何同泰等33家私营茶厂（行）并入地方国营福州茶厂，1956年产茶3726.75吨，职工1500多人，成为全省最大的制茶企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956年春节，全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迎来了高潮，广大私营工商业者积极申请公私合营。1956年1月，仓山区内协记、大茂等30多家私营锯木场并入地方国营“五一”锯木场，另有20余家并入福州贮木场，区内私营木材加工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至同年3月底，全区700多户零售商已全部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杂业和摊贩也根据各自特点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区杂业298户、321人，其中15户、19人组成1个杂业总店门市部和3个合作商店；摊贩685户、700余人，其中672户组成61个联购分销小组。7月，水上区船民组织1个初级运输社，拥有小驳船553艘，社员1327人，占总人数97.2%，基本完成对船民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区旧货合作店组成合作社，为全市首批旧货合作社。12月，区内商业各行业完成合作化，全区小摊贩2308户2580人，其中，1141人上山支前、返乡或从事副业劳动，1439人安排到国营、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工作。至此，仓山区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据1957年对区属企业职工收入进行的调查统计和分析，比合作化前收入增加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70%，降低的占20%，持平的占10%。此后，仓山区食杂、食品、柴炭、百货、饮食、服务等行业合作商店于1958年上半年转为国营商店，酒杂、废

品、贸易、缝纫等行业商店及民天食品厂、福泰糕饼厂由福州市下放区管。1958年9月，仓山区开始以国家赎买方式，对私人出租的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年底，共改造2601户，建筑面积39.9万平方米。^①

仓山区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之前，进度较为缓慢。全区手工业从业人员2163人，社组员仅有746人，占34.6%；私营商业762户，仅改造203户，占26.7%。这主要是因为怕供产销不能解决，怕手工业成分复杂，怕组织起来不好管理，怕城郊地少人多组织起来剩余劳动力无法解决，总之是怕困难，怕背包袱。这一方面说明了右倾保守落后思想在作祟，只看到困难的方面、消极的因素，看不到广大群众积极拥护社会主义和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工作路线上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解决合作化过程中的困难。同时，改造工作不深不透，在已改造的行业中还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大部分合作中各种管理制度还不健全，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薄弱，有的不经批准乱雇工作，加工定货中偷工减料现象较严重，劳动纪律松懈，产品质量常出问题，造成很大的浪费现象。据脱胎、藤器、糖果等4个社统计，半年时间所造成的浪费即达9611元，其中因劳动纪律松懈和废次品返工所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即达3180元。此外，劳动竞赛开展不够经常化，往往流于形式，不能进一步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进。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同样存在形式主义，改造后违法现象也较为严重。1956年迎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又因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盲目集中、合并，忽视行业特点，造成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的偏向，导致部分企业管理跟不上。然而，仓山区委注重加强指导，采取切实措施进行调整，使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普遍增加了生产，提高了收入，充分表现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①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年4月12日。

第三节 党组织的整顿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一、开展肃反斗争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随着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党的干部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情况。195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便进一步了解干部，保证各项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审干工作进行过程中，中央又决定开展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并确定审干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清除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①。随后，根据中央《关于审查干部工作同肃反斗争结合进行的指示》精神，各省、市委修订了审干工作计划，首先审查和处理已被揭露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有的还通过肃反斗争来解决审干当中突出的重点问题。这样，原定列入审干范围的县级以上机关、厂矿企业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被列入肃反审查对象。

1955年5月5日，中共仓山区委成立肃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分四批开展一场肃反斗争。6月底，区委、区人民委员会、区公安分局3个单位共201人（其中干部187人，勤杂人员14人，内党员57人，团员85人）参加了第一批肃反斗争。肃反斗争在福州市委五人小组统一领导下，在区肃反领导小组直接掌握与各中心组具体领导下，先后经过了学习文件、坦白检举、思想批判、小组斗争、专案审查等步骤，查清了重点分子的主要问题与复杂分子的嫌疑问题，并分别予以适当的处理。共排出重点分子15名，经过小组斗争的11名，转专案追查的8名（其中立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

案的6名)。通过调查搜索、小组斗争、专案追查,以及反复复查等方式,至1956年5月底全部结案上报,其中,经市五人小组甄别定案6件,报备案同意下降的5件。105名干部参加了坦白检举运动,占总人数5.02%。^①期间,区委还结合肃反斗争开展了社会镇压反革命运动。1955年9月17日,仓山区社会镇压反革命运动办公室成立,并在街道、派出所成立工作组,领导开展社会镇压反革命运动。至1956年1月底,共组织3次统一行动,逮捕反革命分子97名。11月10日,仓山区公安机关再次组织229人参加全市统一行动,破获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集团,逮捕反革命分子32名,搜查121个点,缴获一批反革命罪证。1956年1月11日,仓山区公安机关又组织156人参加全市统一行动,逮捕隐藏在基督教内的反革命分子8名。

第一批肃反斗争,纯洁了干部队伍,澄清了干部的政治情况,增强了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对敌斗争的警惕性;揭发批判了机关内部的各种漏洞,以及各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加强了对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识别能力,查出了隐藏在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进取心与工作积极性,加强了团结,建立健全了制度。

1956年3月下旬,区委抽调专职干部12人,着手组织开展第二批肃反斗争。参加的有粮站、清洁队、救火会3个单位,共105人(内干部45人,工人51人,其他9人,其中党员11人,团员12人)。4月至7月上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市委关于肃反斗争的有关精神,了解肃反斗争的大致做法。7月中旬至8月底,开展广泛的讨论,发动群众进行坦白检举,列出了17个调查对象。共有45人参加了坦白检举,占总人数的42.8%。^②由于没有肃反清查对象,第二批肃反斗争于9月至11月直接转入内部复查工作。此次斗争揭发暴露出各单位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闹不团结、

^① 《仓山区第一批肃反运动结束报告》,1956年5月28日。

^② 《仓山区第二批肃反运动总结》,1956年11月3日。

小偷、腐化等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弄清性质（只是一般思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有重点地归纳出主要的问题，采取对事不对人的方式进行批判之后，提高了广大干部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批判与克服了右倾麻痹情绪，进一步明确开展肃反斗争的重大意义。第二批肃反斗争比第一批肃反斗争有了显著的进步，表现在：一是材料准备较充分，花的时间较长，占整个运动的大半时间，做到了心中有数；二是政策界限给交由广大群众讨论，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团结，稳定了不少人的不安情绪；三是反复细致地研究材料，先后排队达四五次，调查工作也较细微。

1956年6月初起，区委抽调专职干部12人，着手开展第三批肃反斗争。参加的单位21所小学和16所市民业余小学，参加的职工和教员有412人，其中干部45人，工人51人，勤杂人员40人，小学教员253人，扫盲干部4人，业余小学专任教员11人。由于以上人员特别是小学教师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再加上解放以来对小学的政治思想教育比较薄弱，材料掌握不全，心中无数，党团员少（412人中只有党员19人，团员42人），骨干力量薄弱，所以开展肃反斗争的任务比较艰巨。除组织有关政策学习外，第三批肃反斗争以写自传的形式来收集材料，然后进行查证，做到心中有数以后再反复进行九次排队，列出搜索调查对象。通过调查排队，初步列出了3个肃反清查对象和16个调查对象。同时，培养训练肃反积极分子，对在斗争中可以作领导骨干和依靠力量的33名教师进行了审查和训练。^① 1957年初的10天寒假期间，广泛组织群众开展讨论，发动群众坦白检举。结合知识分子特点，强调高高兴兴搞肃反，对有错误有缺点的好人提出“不追不逼不斗争，但交代有好处”的口号。通过交待政策反复讨论，发动了群众坦白检举，暴露了不少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对小学教师中已批准的肃反清查对象，根据知识分子特点一般不用斗争办法，而是采取和平谈判，促使其交待问

^① 《中共仓山区委关于第二、三批肃反运动总结报告》，1957年8月22日。

题。1957年3月，第三批肃反斗争转入专案斗争阶段，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和调查研究后又进行一次排除，对肃反清查对象和调查对象进行专案斗争和外出调查。6月至8月，根据防错防漏的精神，进行一次复查，一方面对有调查线索的怀疑材料进行查证，另一方面查阅有关档案，证实了一部分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最后在批准的8个清查对象中，查出反革命分子7人，集训290人。^①第三批肃反斗争在吸收第二批肃反斗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贯彻“严肃谨慎”方针和宽大政策，强调高高兴兴搞肃反，一般不采用小组斗争方式，最后做到了一个不斗，坦白检举的人数达82%以上，纯洁了人民教师的队伍，增强了团结，群众反映也好。同时，运用寒假集训办法，真正做到了肃反斗争和工作开展两不误。

此后，仓山区委又于1958年初组织开展了第四批肃反斗争，参加对象是公私合营企业和个别工厂职工，共配备专职干部15人。在整风运动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下，第四批肃反斗争走群众路线，坚持“稳、准、快”，奋战10个月，查出反革命分子18人。10月，区委在区属新扩建工厂和公私合营企业新职工中再一次开展新四批肃反斗争，在“以钢为纲，保卫生产”的要求下，按照单位复杂情况分别发动群众和个别审查，在普遍教育基础上对35名有反坏嫌疑的对象采取集训审查，历时3个月，共查出反坏分子18人，并做到生产、肃反两不误。

根据中央关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政策为准绳”和“既严肃又慎重”的原则以及“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②，中共仓山区委又进行了肃反斗争的大复查工作。经过三年半的努力，仓山区肃反斗争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47人，占人数1.03%，其中，

^① 《中共仓山区委关于第二、三批肃反运动总结报告》，1957年8月22日。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第三批 7 人，占总人数 307 人的 2.3%；第四批 18 人，占人数 831 人的 2.17%；新四批 13 人，占总人数 2993 人的 0.43%；大复查 9 人，占总人数 8890 人的 0.11%。按各系统划分：区级党政机关 452 人，查出反坏分子 1 人，占 0.22%；小学教员 307 人，查出反坏分子 12 人，占 3.9%；工业厂社 2827 人，查出反坏分子 9 人，占 0.32%；财贸企业（包括公私合营）997 人，查出反坏分子 25 人，占 2.5%。在查出的 47 名反坏分子中，现行反革命 1 人，占 2.1%；特务 13 人，占 27.7%；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17 人，占 36.1%；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 9 人，占 19%；汉奸 1 人，占 2.1%；敌对阶级中反革命分子 2 人，占 4.3%；其他坏分子 4 人，占 8.6%。对反坏分子的处理情况是：给予逮捕判刑 6 人，判处管制送劳动教养 4 人，判处社会管制 5 人，判处管制留用监督改造 3 人，以上四项占反坏分子总数 44.7%；给予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3 人，占反坏分子总数 6.46%；给予开除清洗 3 人，占反坏分子总数 6.4%；给予开除留用察看 3 人，占反坏分子总数 6.4%；给予遣回原籍监督生产 1 人，占反坏分子总数 2.1%；给予行政处分 2 人，占反坏分子总数 4.3%；宽大不予处理继续留用 14 人，占反坏分子总数 30%。此外还查出普通反革命 57 人，不再论处的反坏分子 61 人，反动分子 10 人。肃反斗争共计查清 914 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占参加运动人数 20%，其中，第一批弄清 15 人，占 4.3%；第二批弄清 17 人，占 16%；第三批弄清 46 人，占 12.1%；第四批（包括新四批）弄清 187 人，占 4.9%；大复查弄清 649 人，占 7.2%。^①中共仓山区委为他们做出结论或调查报告，卸掉了他们的精神负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尽管当时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估计得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导致发生斗争面过宽、处理过重等偏差，但总体上看，肃反斗争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是健康的。它充分发动了群众，全区应参加肃反斗争 4583 人，均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社会主义

^① 中共仓山区委会：《仓山区四年来肃反运动总结》，1959 年。

觉悟空前提高；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扩大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堵塞了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漏洞，为整顿和加强党的组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生产和工作，呈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

二、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一次党员大会的召开

仓山区党组织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以保证全区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一是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对全区各项工作的领导。结合实际情况，向全区人民提出各项工作的实施计划和具体做法，并在推进过程中不断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使各项工作不走弯路。组织区属各群众团体，如工会区办、区农会、团区委、区妇联、区工商联等，动员各阶层群众，发动与依靠群众的力量，保证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从而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得到不断提高，党在全区工作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党支部在各单位堡垒作用得到不断增强和逐步巩固。分布在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广大群众做好各项工作。脱胎一社刚划归仓山区时，曾存在不团结的现象，影响了生产，但发展了党员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党员的模范行动感染了群众，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二是吸收新生力量，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干部的培养提拔、管理调配工作，保证各项中心工作和生产、改造等任务的完成。根据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解放后区委不断地从工人、机关干部、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农业合作社社员、小学教师等队伍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的队伍得到扩大。在解放初，全区只有1个党小组，6个党员，至1953年成立了4个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46个，至1956年3月底，共成立13个支部，党员计149人，等于1953年的3.24倍，等于1949年的24.1倍。^① 这些新党员在入党时都经过了教育与考察，一般都符合党员标准，入党后表现很好。

^①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年4月12日。

在干部方面，解放后区委从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居民基层干部中吸收了 54 名干部，调配到区属各部门组织中去，并向上输送 31 名干部。同时注意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与管理工，建立干部档案及鉴定制度，并建立干部的后备名单。至 1956 年 3 月底，从原来的干部中经过培养教育得到提拔的计 63 人，他们一般都能担负起新岗位的工作。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社的领导，还曾派 6 个共产党员到社里担任政治领导工作。^①

三是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全区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解放后，区委在工人、居民中普遍建立了宣传网，发展了 62 个宣传员，每逢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时，即普遍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在 1953 年党中央提出总路线后，区委即通过回忆对比的方式在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全体居民中开展深入的宣传，此后结合各项中心工作反复进行宣传。1954 年 4 月，区委开始在工人中筹备建党，并于年底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工人党支部。在 1955 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合作化问题后，区委又大规模地开展了宣传。通过宣传，大大提高了手工业者、农民和私营工商业者的觉悟，不到一个月时间，农民入社的达 99%，手工业者入社的达 91.6%，私营商业全部申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空前高涨。在机关内部，则组织动员全体干部进行理论、时事政策或文化学习，举办马列主义业余学校，并结合各项中心工作或典型案件，对全体机关干部进行组织教育和纪律教育。通过这些教育，提高了全体机关干部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和巩固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为迎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福州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进一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仓山区委决定召开全区第一次党员大会。1956 年 2 月起，区委先后组织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意义、党内民主集中制、党员权利义务等内容的 3 场报告，并组织广大党员展开讨论，进一步

^①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 年 4 月 12 日。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同时，认真组织起草区委六年来的工作总结，并严格审查出席党员大会的代表以及区委委员、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资格。1956年4月12日至15日，根据福州市委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福州市仓山区第一次党员大会在仓山区进步路原市劳动局礼堂（现微生物研究所）召开。大会共有正式代表150名，其中正式党员86名，候补党员64名。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中共仓山区委成立六年来的工作，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一届委员会及出席中共福州市代表大会代表。

大会听取并审议了中共仓山区委书记郝玉生作的《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报告指出，在福州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区人民群众的团结努力下，六年来仓山区委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52年以前，主要进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各项极为繁重艰巨的工作，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区人民民主政权。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在全区各阶层人民中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力推动了手工业、农业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生产运动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并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文教、卫生运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 and 健康水平。与此同时，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党组织日益壮大和巩固，团结发动了全区人民，保证了各项工作的胜利完成。

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坚决执行城市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加强手工业、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对生产工作的领导的决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城市工作以生产为中心，而生产又必须贯彻为农村服务并与农村经济密切结合的方针；必须加强手工业、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地向社员进行集体主义和社章教育，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必须加强党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社中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扩大党的队伍，吸收生产积极、成份好、觉悟高的优秀分子到党内来。

大会选举产生郝玉生（女）、孙志忠、孙荣桂（女）、徐坤义、

施荫棠、曹恒雅、林良浦、黄清风（女）、胡芳清、冯以贤、林书金、黄玉清等 12 人为区委委员，组成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一届委员会。15 日，中共仓山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郝玉生、孙志忠、孙荣桂等 3 人为区委常委，郝玉生任书记，孙志忠任副书记。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委员 7 人。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出席中共福州市代表大会的 4 名代表。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采取了在中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地方通过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式，逐步地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经过三年的努力，国家各项工作走上新的轨道，人民的组织程度、觉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53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作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2 月，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部署开展全国范围的普选工作。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召开代表大会前，实行全民普选，各选区选民用无记名投票方法直接选出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年 6 月，仓山区、水上区人民政府分别成立区选举委员会，对全区首次普选工作做出安排部署，至 9 月 25 日结束。仓山区 18 岁以上选民 38483 人，分为 51 个选区，选出区人民代表 95 人。水上区 18 岁以上选民共 10163 人。^① 选举工作按组织准备、宣传发动、选民登记、民主协商、投票选举等步骤进行。

仓山区选举共设 8 个工作区，工作区设若干个选区。其中，下渡工作区设 6 个选区，藤山工作区设 7 个选区，临江工作区设 5 个

^① 《福州市仓山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经过及普选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10 月 29 日。

选区，新港工作区设6个选区，观井工作区设4个选区，仓前工作区设4个选区，麦园工作区设9个选区，上渡工作区设9个选区。选举工作自1953年6月6日开始，至9月25日基本完成，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7月6日前为准备阶段，主要是建立机构，组织训练工作队，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宣传动员，划分选区，为人口调查及选民登记做好准备，并改选了居民委员会。7月7日至27日为第二阶段，第一步工作是完成人口调查及选民登记，第二步是领导各选民小组审查选民资格，结合进行代表候选人提名方法的教育和讨论，初步酝酿代表候选人名单。7月30日至9月25日为第三阶段，第一步工作是进行代表候选人提名，领导选民小组讨论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步是正式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并进行了宣传补课。截至8月20日，全区各个选区都先后召开了选举大会，进行选举代表工作。

水上区选举自6月12日至10月10日，历时近4个月。全区共划分为5个工作区、21个选区，首先分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展宣传动员准备工作。接着，进行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编排选民小组，公布选民榜，并领导各选民小组对有关选民资格进行审查讨论和提出意见，同时公布代表候选人选举办法。再接着，提名代表候选人，介绍和组织选民讨论代表候选人，正式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动员选民参加选举大会。最后，各选区分别召开选举大会，完成代表的选举工作。

通过民主选举工作，一是充分发扬了民主，教育了干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主人翁思想，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二是通过选民登记与审查，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清了敌我界限。据统计，仓山区剥夺选举权利的计255人，其中有地主106人，反革命犯66人，其他犯人35人，不能行使选举权的精神病患者48人。三是动员了最高比例的选民参加选举，选出了合格的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仓山区共选出代表95人，其中女性24人。四是完成了人口调查工作，基本上达到“不遗漏、不重复、全面正

确”的要求。据调查，仓山区人口计 65090 人，其中男 34816 人，女 30274 人。^①

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同年 10 月 29 日至 31 日，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仓山区和水上区分别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仓山区出席代表 95 人，选举产生区长姜彬，委员 11 人。水上区选举产生区长张汇三，副区长张心绪，委员 7 人。

1954 年 2 月 11 日至 12 日，仓山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选举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贯彻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工作，区长姜彬作《区人民政府三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选举姜彬等 33 人为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 月 5 日至 7 日，仓山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区长姜彬作《四个月来政府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总结区政府四个月来的工作，对第三季度工作任务作出部署，讨论宪法草案的宣传问题，审查处理了 26 件提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 1956 年选举工作的指示和省、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执行国务院指示的几项规定，仓山区制定了选举工作计划，成立区选举委员会，于 8 月 3 日着手进行第二届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整个选举工作分为三个阶段：8 月 4 日前为准备阶段，主要是建立组织，了解情况，宣传动员，划分选区；8 月 6 日至 13 日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办理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划分选民小组，公布选民名单；8 月 14 日至 24 日为第三阶段，主要是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协商、讨论和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以及进行投票选举代表工作。全区 18 岁以上选民 52286 人，参加选举 49718 人，占选民总数 95.08%，选出区人大代表 125 名。在普选的基础上，9 月 24 日至 26 日，仓山区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代表 125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三年来区人民委员会工作及今后任务的

^① 《福州市仓山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经过及普选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10 月 29 日。

报告。会议选举产生梁寰海为区人民委员会区长，施荫棠、叶鸿宝为副区长，郝玉生等 16 人为委员；选举王学芝为区人民法院院长，梁寰海等 47 人为福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正式实行，为实现全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并监督了区人民政府的干部更好地做人民的勤务员，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第二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的曲折历程

(1956 年 9 月—1966 年 5 月)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 良好开端及其失误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一、宣传贯彻福建省第一次党代会和党的八大精神

1956年6月27日至7月13日，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在正确总结解放六年多来福建党的工作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精神，结合福建实际，提出了富有创造精神的新的方针和构想。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业发展为重点；二是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和多种经济的关系，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多种经济；三是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四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争取90%的社员能够增加收入；五是及时纠正商业战线两大偏差，坚持商业工作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向；六是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这是对福建今后经济建设方略进行的一次初步探索，对于调动全省各方面的积极性，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系统地论述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战略问题。会议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10月20日至21日，福建省委召开规模空前的八大精神

传达报告大会。此后，八大精神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全省人民的行动指南。全省人民思想活跃，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经济建设的具体道路和发展战略。

根据省、市委的指示，中共仓山区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讨论党的八大和省第一次党代会有关文件，研究具体贯彻意见。结合本区实际，仓山区委决定于1957年2月在手工业社中有领导地开展一个全面、深入、持久的增产节约运动，同时积极稳妥地处理集中与分散问题，大力组织供销业务，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社员收入，巩固提高合作社。为此，在区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增产节约办公室，并抽调区委、区人委、联社等单位共25名干部组成8个工作组，由区委书记郝玉生带领，深入各社（组），并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帮助合作社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开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具体要求，一要充分发动群众，挖掘生产潜力，积极寻找增产门路，克服消极保守思想，努力扩大经营范围，改变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并严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节约原材料，特别要解决原料困难问题。为此，凡是原料销路没问题的产品要尽量增产，原料销路有困难的社（组）应积极寻找增产门路，寻找代用品及利用废料（节约原材料5%左右）克服困难，并大力降低管理费用，减少非生产费用开支3%—5%，以达到降低成本、贯彻勤俭办社的目的；二要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质量合格率，降低废次品率，要求对某些产品已有提高的要加以巩固，一般产品要向优质产品看齐，优质品和名牌货要进一步巩固提高，并对某些产品逐步推行商标制和根据社会需要积极增加花品种，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三要开展深入广泛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特别是教育干部在工作上必须学会走群众路线，提倡以身作则地与群众同甘共苦，树立艰苦朴素和民主办社作风，要求发动全体社员树立“以社为家”的观念，明确集体与个人关系，进一步发挥其劳动积极性。

增产节约运动大体分三个阶段，时间约两个月。第一阶段是肯定办社成绩，鼓舞生产情绪，加强增产节约教育，结合了解情况，

时间约两个星期。主要是召开区社员代表大会，或通过干部、群众的座谈会及个别访问和群众大会，以及运用回忆对比的方式，以群众亲身体验来加强合作化优越性的全面教育，根据全国、省、市以及本区具体情况，通过典型材料说明办社好处，肯定成绩，使其明确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是暂时的，只要通过努力就能逐步解决和克服，以此来鼓舞生产情绪。广泛宣传全面增产节约的意义和目的，以提高信心，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同时，结合了解情况，找出有关阻碍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供产销、民主管理和节约原材料，以及干群关系、群众思想和浪费等。第二阶段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找关键、找原因、找窍门”活动，提合理化建议，解决有关增产节约的关键问题。同时进行生产管理、财务管理、计划管理的教育工作。生产管理方面，注意充分发挥现有技术力量，重视技术研究工作，做好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开展技术互动，举办技术座谈会，扩大订立互助合同，以达到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办好合作社的目的；逐步推行计划管理，以计划指导生产；积极改变不合理的经营制度，扩大经营范围。财务管理方面，做好仓库保管，大力节约非生产性的费用开支，杜绝一切浪费现象；慎重处理合作化的分配，正确全面宣传先工资、次福利、后积累的分配原则，加强劳动保护，重视社员的福利工作，对不合理的工资要进行妥善调整。计划管理方面，重点组织供销业务，特别是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凡原料销路无问题的社，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在第一阶段做好调查了解、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这个阶段还根据存在问题，向社员作一次启发性报告，然后分组让社员群众充分讨论，提出建议与批评，并加以解决。第三阶段主要是结合社章教育，健全基层组织，建立健全一些切实可行的必要制度。整顿与健全社内组织，充分发挥理事会、监事会及各种党团组织的作用，使其明确职责，克服个人包办代替和理监事会流于形式的偏向，并根据社员意见，建立健全社内制度，经社员讨论后，由理事会公布实施。

二、“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一五”期间，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高度的热情积极投身各项建设事业之中，使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通过贯彻地方工业发展方针，推进工业化建设，工业取得较大发展。1954—1956年区内工业各行业调整合并，并变革了所有制，增强骨干工厂的实力，初步实现集约化生产，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1956年全区工业产值达5000多万元，比1949年约翻了两番半。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区手工业和工商业实现了较快发展。全区共有手工业生产社25个、供销社2个、生产小组11个，社（组）员1975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1.6%。广大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提高，大部分社（组）不仅实现了生产和业务规模的扩大，而且实现了产量和质量提高。全区700多户零售商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杂业和摊贩也根据特点采取不同形式进行了改造，市场物资丰富、物价稳定，实现经济初步繁荣。1954年全区仅工商税一项就达540万元，仓山区因此成为福州市税源的重点地区。

农业合作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至1956年底，全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7.5%，占土地总数的95.8%。其中，城区入社农户占城区总农户的99%。“一五”计划期间，仓山区农业总产值以年平均增长4.9%的速度持续增长。特别是在面对南台岛易受洪涝灾害的地理环境，仓山区农业合作社通过修筑防洪堤，兴修水利，进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采用农业新技术，抵御天灾人祸等，较好地发挥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通过组织劳力兴建水库、小型水电站、修渠道、围垦造田、开垦荒山、绿化造林等举措，为以后农村和农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改善水稻生产环境、持续改良品种等，逐步淘汰了产量低且不稳的水稻品种，推广种植了“短脚南特”、“陆材号”、“红410”等新品种，成功地进行“粮食革命”，使

全区粮食生产无论在产量和产值上都比 1950 年翻一番，农户蔬菜生产从自给性转为商业性，畜牧业生产比重日益提高。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普遍增长，全区有 1118 人就业，有 12470 人参加了市政建设和修建铁路工作；政府对生活困难的烈军属和居民进行了大量的补助救济，共发放救济金 134197 元。文化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全区共有 18 所小学，有 75% 学龄儿童得到入学机会；有 9 所业余小学，112 个识字小组，5600 多人参加学习；组织 1000 多人的扫盲队伍，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识字受教育的机会。爱国卫生运动和妇幼保健事业有了很大推进，全区有 7 所联合诊所，2 所牙医诊所，4 所保健站训练班，许多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大大减少，有的已基本消灭。环境卫生事业有了很大改进，每个居委会都建立了爱国卫生组织，并开展了捕鼠运动，保证了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①

在中共仓山区委的领导下，经过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仓山区提前一年完成了福州市下达的“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和任务，为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节 反右派、“大跃进” 和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党中央、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是在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并发动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全党整风运动。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以后，各级党组织进一步行动起来，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① 郝玉生《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1956 年 4 月 12 日。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中共福州市委的统一领导和仓山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区委常委等成员组成的中共区委整风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于4月10日成立，领导开展整风运动。全区共12个区属机关单位分别成立整风中心小组，约400名机关干部、民警参加了整风运动。在组织学习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以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等有关文件的基础上，整风运动主要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从上到下，由内至外，广泛征求意见。一方面鼓励机关党员干部及群众向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意见及建议，以帮助区委和领导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部分机关党员、干部在认真对照检查自己的同时，出于公心向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邀请党外各界人士帮助整风，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然而，随着5月中下旬至6月初国内政治生活气氛的日趋紧张，全党整风运动的主题逐步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了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了反击右派的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和《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的下达，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根据上级指示，仓山区机关随即转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约336人参加了这场斗争。区委经过反复分析研究，认为区机关内没有真正的右派分子，并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但在政治舆论的压力下，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8月，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听取区委宣传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反右派斗争进一步趋向深入。通过组织学习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精神及《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由群众广泛开展讨论、揭发、检举，集中批驳了区内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斗争至10月底基本告一段落，全区共有5名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

子”^①。9月至12月，在整风的基础上，区委着手精减机构，下放干部，共分两批下放29名干部到鼓岭参加劳动，占机关干部总数的9%，有13名干部作退职处理。1958年1月，反右派斗争延伸到教育系统，共有5名中小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1人被开除送劳教），被分批分期地下放到农村劳动。2月，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浮夸风，企业之间在经济指标上盲目攀比，提出了许多诸如一年翻一番、一年翻数番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针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却被认为是右倾，遭到严厉批判。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确实存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使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遭到群众的彻底批驳，使少数右派分子在群众中陷于孤立。反右派斗争中，左派（包括中左）占总人数67.5%，中间派由斗争初期占总人数47.8%降到38%，尤其中右分子由8.7%降到4%，右派占总人数2.6%，^②从而极大地分化孤立了右派。反右派斗争还锻炼和考验了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由于当时全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狂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反右派斗争中，把思想和言论有着某些片面性但却是真诚地帮助党整风的人错当成“右派分子”来处理，把历史转变时期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误判为敌我矛盾加以错误处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样的沉重教训是极

① 中共仓山区委整风指导小组：《仓山区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1957年10月25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机关整风中心组：《中共仓山区委机关反右派斗争总结报告》，1957年10月29日。

其深刻的。

1957年10月25日，中共仓山区委整风领导小组发出《仓山区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整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主要对象是区委、区人委、各领导机关以及党的各部门负责干部，关键是整顿思想作风，认真改进工作。通过发动与依靠广大群众，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力求反掉工作上和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解决机关内部存在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各项主要工作出发，解决与广大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全区机关内部的民主作风、集体领导、上下关系、党群关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必须通过整改运动进一步解决，但整改的主要方面是针对解决与广大人民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方针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就全区范围来说，这些重大问题是：一是手工业生产方面，着重解决如何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问题。同时，手工业与水上生产要检查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如何减少非生产人员，解决一些不合理工资与制度；二是商业工作方面，解决如何加强市场管理，防止抢购套购、提高价格、偷税漏税、短秤等扰乱市场的行为，同时解决一些有关体制方面的问题；三是检查贯彻勤俭治家的方针，如何设法搞起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勤俭节约的风气，包括节约粮食、木材、棉布，搞好收买运动。研究大力开展副业生产，组织发展蚕桑、抽绣、养兔与对群众的劳动教育问题；四是加强基层，动员与组织干部参加劳动锻炼。

整改阶段自始至终贯彻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以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放手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揭露问题和研究解决问题，坚持遇事与群众商量，贯彻群众路线，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从了解研究与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使整改与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密切结合，真正从实际行动上做出效果，防止了关门整风和孤立地解决机关内部的问题。整改阶段的时间约2—3个月，大致分四个阶段。10月中旬至10月下旬为准备与动员阶段。主要做好以下几项

准备工作：一是反右派斗争尚未结束的及早结束，并按单位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要求右派分子作全面检查、批判；二是收集了解中间分子的思想动态，检查中间分子工作是否搞细搞透；三是召集一般干部漫谈反右派斗争以来的心得、收获以及对下一步整改工作的意见；四是做好反右派斗争的全面总结，包括开展斗争与没有开展斗争的单位；五是把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征求到的意见集中分析排队，对有关言论进行分析，收集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对开展下阶段整风存在哪些思想。准备工作完成后即开始动员。首先，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根据福州市委动员内容，结合本区领导干部实际思想组织漫谈，结合学习周恩来、刘少奇在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告，把这次整风的基本精神弄通，解除思想顾虑，端正态度，积极主动参加整风运动。然后，组织一般干部在市委动员后参与讨论，并根据讨论情况，针对反映的各种思想再由区委负责同志进行思想动员。动员过程中主要解除思想顾虑，根据情况需要结合学习有关整风文件。

全区动员后，各单位再分头动员，并层层表明态度和决心，各系统同时动员基层群众开展整风。11月上旬至11月20日为“大放大鸣”阶段。在深入动员的基础上，坚持边“放”边改、边改边“放”相结合的原则，重新组织一个“大放大鸣”和整改的高潮，重新采取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一起“放鸣”，运用以大字报为主，配合座谈会、小组会、讨论会、提合理化建议等办法进一步“大放大鸣”。除机关内部开展以大字报为主的“大放大鸣”外，各系统召开各种座谈会，包括居委会主任、妇代会主任、党团支部书记、中心店主任、校长教导主任、合作社主任等一级的基层干部，组织他们向领导机关负责人提意见并发动他们到领导机关贴大字报。11月20日至次年1月20日为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和领导干部结合检查阶段。在“大放大鸣”充分开展的基础上，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抓住一些重大的和关键性的问题，由各业务部门为主组成的整改小组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贯彻领导干部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交区委讨论，并订出全面贯彻整改

措施。检查方法是，先召开全区党员大会，由区委负责人作检查，提出整改措施，大会修改补充后，然后再召开全区干部会，作全面检查报告并提出全面整改措施，交群众讨论修正；其他各部门负责人再向下属群众在一定的会议上作检查。各部门在研究改进方案时，凡属本区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设法解决，能马上改正的马上改正；须在一定时期内解决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对一些重大的问题，须与上级部门协助或须经上级部门批准的问题，提出改正意见交区委讨论后报上级批准；属于群众过高的不合理的要求或错误意见，加以研究汇集，准备下一阶段组织辩论，分辨是非。1958年1月20日至2月初为开展群众社会主义大辩论阶段。根据群众在“大放大鸣”阶段中需要进一步辨明是非的问题，提交群众开展辩论，以分清是非，教育群众。

二、“大跃进”运动的掀起和全面展开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党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取得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为此，党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称作“三面红旗”。

1958年2月，中共仓山区委召开千人干部（扩大）会议，传达福建省、福州市委会议精神，提出全区生产“大跃进”规划，并重点检查和批判了“不能跃进、不必跃进、不敢跃进”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区委结合全民整风和总路线教育，开展了“为谁劳动”等思想教育活动。从此，仓山区“大跃进”运动拉开了帷幕。在“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下，区委多次召开生产计划会议，修改跃进计划，全区工业企业出现盲目攀比现象，提出了产值翻番等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不计成本地扩大生产。同时，配合各个中心运动，不断反对右倾思想，依靠鼓干劲，加班加点，促使组织生产不

断升温。1月，区委在各系统、各单位开展“双反双比”（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至3月暂告一段落，共有6766人参加。3月12日，区委整风办公室发出《关于在机关进一步开展双反双比运动的意见》，决定开展一场“双反双比”的整改运动，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以适应工农业生产的新形势。同时，要求在机关内部以反“五气”（官、暮、骄、阔、娇）、反保守为中心，在全体干部中掀起一个比干劲、比深入群众、比先进、赶先进、向先进看齐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在苦战三昼夜的号召下，放出大字报36474张，大大超过了整风运动开展以来所放出的大字报。^①

5月，省委提出“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号召，仓山区立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办工业”热潮，“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据当时统计，仅仅5、6两个月内，全区就办起了以手工业为主体的528个厂（场）和100个工业卫星厂，组织生产人员有1200多人，投资5万多元。6月，为加强街道工业管理，区各街道办事处设立工业办公室。同时，区委还决定将三叉街百余亩土地作为工业生产基地，创办农业机械厂、郭宅竹器厂、仓山焦化厂（现三化）、民政砖瓦厂等。到7月底，全区各街道均设有工业办公室，下辖176个厂（场、组），员工9421人。同时，区委圈地百余亩为工业生产基地，创办了农业机械厂、医疗化工厂、铅笔厂、第六塑料厂、郭宅竹器厂、仓山焦化厂、民政砖瓦厂等，尊定了仓山区工业经济基础。据1958年统计，全区地方国营的合作工厂计29家，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1700人增加到1958年的5116人。区委起初制定全区手工业生产的跃进指标为200多万元，经过基层干部讨论后增至300多万元，后发动广大职工充分讨论后又增至400多万元，

^① 中共仓山区委整风办公室《仓山区机关干部整风运动总结（1957.4—1958.12）》，1959年1月20日。

而实际完成竟达 620 万元。^①

“全民办工业”的热潮促进了大闹技术革新、大搞机械化生产运动的开展。全区广大干部职工解放思想、“敢”字当头，大胆创造，从小入手，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先后研制出土机床 193 台、土机械专用设备 126 台，研制或仿制 308 种新产品。许多工厂开始建立机修小组或机修车间。仓山竹器厂批判守旧思想观念，克服“文化低、革新难”的畏难情绪，利用废旧材料试制出了锯竹机、破竹机、劈篾机、开蕊机等 10 台机台，初步实现了生产半机械化，大大减轻了体力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福州铅笔厂原基建计划要到 1959 年底新机台设备才能全部到位，但该厂职工在大搞技术革新运动中，干劲冲天，土法上马，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先后制成了土球磨机、椿料机、压蕊机等 19 项土设备，提前一年正式投产运转。脱胎厂职工手工制出一部铁木结构的车床后，制造出铣、袍床各一台。还有，许多产品是在毫无设备或设备不全的情况下，用手工硬干起来的。其中，铅笔、胶布、滚珠轴承、三线闸刀开关、马达等产品填补了福建省的空白。热水瓶竹壳、脱胎漆器、楠木漆筷、拉线开关等 14 种产品达到或超过先进地区水平。

随着“全民办工业”热潮的深入，全区群众纷纷自觉行动起来，自筹资金、腾让房屋、捐款物资、收集废料等，大办街道工业。仅两三个月时间，共献售铜铁 43537.5 公斤、锡 1269 公斤、转头 175171 块、瓦片 11952 片、毛石 1326 条。民政砖瓦厂在试验高温耐火砖中缺乏鼓风机、高温表，就用土办法试制成功，涌现出不少群众自力更生和勤俭办厂的事迹。对湖居委会 77 岁老人薛凤英为了办厂自愿投资 200 元，还捐献了五十九年前订婚时陪嫁的银镯。在“全民办工业”热潮的推动下，全区街道工业拥有资金 4.6 万元，创产值 1.2 万元。^②

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全省范

① 《中共仓山区委 1958 年工作初步总结报告》，1959 年 1 月 2 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 1958 年工作初步总结报告》，1959 年 1 月 2 日。

围内很快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的高潮。仓山区广大群众为了争取高产，不辞辛苦，不畏困难，昼夜奋战在炉旁、河边和山上，汇成了一股全区大炼钢铁的洪流。区内福建师院附中、省造纸厂、火柴厂、省建筑工程学校等60个单位2.4万多人停止正常工作，广大学生停课，建立土炉、转炉1452个，加入到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在10月15日至21日的“钢铁生产高产周”中，全区共有40单位12169人投入到声势浩大、万马奔腾的炼钢战斗中。各战场捷报频传，产量日升，从战斗前两天日产钢1.5吨，到18日即跃进10吨大关，19日又以日产19吨告捷，20日再闯过30吨大关，21日更青云直上，达到42吨的高峰，比原计划超额完成35%，比高产周第一天猛增近40倍。一周内全区共产钢11879吨，比高产周原定任务超额完成41.4%。高产周中，全区贯彻小、土、群方针，即用“土法”建立起炼铁、炼钢、炼焦、开采煤矿和铁矿的小型生产设备群体，共建各种土炉1216个，投入生产670个。各炉群也捷报频传，“卫星”争飞：日产钢5.4吨的福建师范学院，日产钢6吨的师院附属中学、第九中学，日产钢2.9吨的贮木场，日产钢2.7吨的火柴厂，日产钢1400斤的乐群居委会。^①在“小土群”方针指导下，大炼钢铁运动出现不少“奇迹”。“小”的有农干校一位16岁少年创造的一种炼二斤钢的小坩锅；“土”的有家庭妇女使用烧饭炉灶配以扇子、火管吹风的炼钢炉，贮木场用手摇自行车来带动鼓风机，农干校用喷雾器代替鼓风机等；“群”方面，许多居委会自愿结合在互相邻近的空地上建立炉群，居民按队组织，成立班、排，每天三班轮番作战。同时，大炼钢铁运动也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有老当益壮、自告奋勇举八磅锤砸铁的白发老翁陈信桂，有祖孙三代鏖战钢场的张逸一家，有夫妻双双齐上阵的唐兆利，有驼背残疾又坚守岗位的陈依铨，有因紧张劳动昏厥而不肯下火线的甌阿梅，有还佩戴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和尚、盲人等。高

^① 中共仓山区委钢铁指挥部：《中共仓山区委关于全民炼钢第一个高产周运动总结》，1958年10月25日。

产周中，全区共 1450 名学生、居民、干部组成了运输大军，昼夜奔忙抢运各种原材料，共出动 80 次，出勤人数达 3500 人次，抢运铁、煤等物资 7.4 万多吨，^① 保证了炼钢原料的及时供应。其时，“血可流、人可倒、钢铁任务不可少”的口号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

在“大跃进”的号召下，1958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 1271.68 万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 44.2%，比上年增长 166.7%；实现利润 79.55 万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 17.8%，比上年增长 76.38%。农副业生产获得全面增产、丰收，水稻亩产达 1500 斤，较上年增长近一倍，金星亩产放出“卫星”，达 2109 斤；蔬菜生产亩产达 350 担，比上年增长一倍，红旗营芹菜放出“卫星”，亩产达 15800 斤；淡水鱼亩产 1037 斤，比上年增长一倍半。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大搞积肥达 1500 万担，使春耕施肥由往年平均每亩 30 担，增加到 500 担；大修水利，安装了抽水机、电力水车、柴油机等，使灌溉面积增至 3000 多亩，基本实现灌溉自动化；开展技术革新，97% 的水稻田改间作为连作，密植、连作面积较上年增长 15 倍，并创造和推广了许多新式农具，其中，新创的中耕器被选送北京展览。^②

在“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的形势下，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推动下，党内许多人的头脑都“热”了起来。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过于着重抓产值指标，忽视产品质量和成本核算，甚至存在“现在是供不应求，质量差点没关系”“要求产量高，质量就难好”等错误思想。有些部门对革新出来的项目或土机台，没有及时加以改进、提高、使用和推广，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有些党员干部对某些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提出异议，反遭到批评，从而导致“报喜不报忧”，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实际经济活动中出现了混乱。

^① 中共仓山区委钢铁指挥部：《中共仓山区委关于全民炼钢第一个高产周运动总结》，1958 年 10 月 25 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 1958 年工作初步总结报告》，1959 年 1 月 2 日。

“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头脑发热现象到处蔓延所导致的。它最大的失误在于，在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政策措施，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违反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从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这样深刻的教训是值得后人永远汲取的。

三、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

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经过 1955 年冬季至 1956 年春季的社会主义高潮，至 1956 年底，仓山区共建立起 6 个高级农业社，即：五星、万里、金星、联建、燎原等 5 个农业高级社和 1 个仓山蔬菜合作社。这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从 1953 年至 1957 年，全区农业总产值以年平均 4.9% 的速度持续增长。小社并大社，本来是出于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不少人认为，农业合作化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从而演变成不顾客观条件、争相推动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的一场普遍的群众性运动。

1958 年 4 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后，各地在较短的时间内广泛开展了并社工作。七八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披露和宣传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8 月 29 日，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合一的、政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仓山区于 8 月下旬开始酝酿，并着手在勤工居委会、临江街道、港头地区工厂及近郊农业社试办人民公社。当

月，盖山红旗人民公社率先成立。9月15日，仓山区内成立了福州市第一个以福州造纸厂等工厂为主体的城市公社——先锋人民公社。

为了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同年9月中旬，仓山区委制定了《关于建立仓山区人民公社的工作方案》，并成立公社、分社筹委会，加强宣传教育，保证办社、生产、工作三不误。《方案》强调指出，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的组织者，使劳动进一步集体化，而且是生活的组织者，使城市居民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生活，通过互助合作，逐渐走向集体化、社会化，改变个体家庭的社会经济单位、为生产组织的集体单位，彻底解放妇女劳动力，为男女的真正平等和逐渐缩小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创造充分条件。

按自然条件、地区分布、群众生活习惯和经济基础，区别不同的生产主体，《方案》拟将仓山区人民公社划分为5个分社。一是以工业为主体的临江分社，包括造纸、火柴、制茶、脱胎一厂、冷作等工厂和小岭、下池、上平、上藤、前街、勤工、菖蒲、新街、河边、信平、中藤、新建、港墩等13个居委会，共5621户、25841人；二是以商、学为主体的仓前分社，包括九中、十六中、师院附中、高级中学、技工学校 and 处全区交通要道且市场繁荣的观井、仓安、中洲、龙峰、亭下、池后、乐群、聚和、巷下、梅坞、公司等11个居委会，共4556户、20260人；三是以工业为主体的上渡分社，包括漂染、滚珠轴承、碍瓦、五金、橡胶等工厂和龙潭、上渡、岭后、岭下、德园、竹榄、对湖等7个居委会，共3038户、13914人；四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跃进分社，包括万里、金星、五星、燎原、联建等5个农业社和师范学院及浦头、通明、展进、迪芦、下藤、埔顶、程埔、施埕、洋洽、鹭岭、横江渡等11个居委会，共4528户、28143人；五是以水上运输为主体的水上分社，包括小驳、上游、下游、外海等运输社和鳌峰洲地区工厂，亚峰、万寿、海关、港洲、复仁、坡尾、恒昌、龙潭、外海工会、排尾等11个居委会，共2923户、17741人。

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便于集中指挥、发展生产的原则和

从小到大、从少到多、逐步设立、逐步充实的精神，《方案》规定，仓山区人民公社实行区社合一，党政合一，设立公社党委会，书记1人至3人，区长兼社主任，社员代表大会代替区人民代表大会，社管理委员会代替区人民委员会。下设若干部门、分社和工作区。分社设立党总支，书记1人至3人，正副社长若干人，并成立分社管委会。工作区可根据党员质量和数量，建立党支部和相应的群众团体组织。《方案》还明确了公社、分社、工作区的管理范围。工业方面，根据集中领导、统一规划、分散管理、工农业密切结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凡属投资大、技术高、数量多的应由公社管理；投资小、不便集中经营而分社又能办得好的，可由分社管理；凡是工作区可以办的而且对生产发展有利的，应大胆交工作区管理。商业方面，凡属国营工厂、商店和部分较大型的公社合营店，应由公社管理，其余可分别由分社和工作区管理。农业方面，主要由分社管理，并本着有利生产、充分发挥土地潜力的原则，根据生产需要在工作区中可适当调整劳动力、畜力、工具，同时以农业为主体的跃进分社对其他有少量农副业地区的兄弟分社应加强协作和业务指导。文教卫生方面，凡属正规的大、中、小学和业余大、中学应由公社管理，其余由分社管理；较大型的文化馆、图书馆等应由公社管理。财粮工作方面，应由公社统一核算，分级管理。水上运输方面，除驳船队统一由水上分社管理外，大小摆渡及住家船一律由工作区管理。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至10月底，仓山区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共有2万多户、10.6万多人，下辖临江、仓前、上渡、跃进、水上等5个分社。区内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居民均加入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并实现食堂普遍化、托儿经常化、服务事业集体化，大搞商业服务部，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和普及文化教育活动。随后，区内自由市场被撤销，各菜市场成为具有国营和合作性质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全区居民日常消费实行配给制，主副食品、蔬菜及生活用品等实行配额供应。据1959年4月统计，“大跃进”运动中，全区共兴办76个公共食堂，用膳1.6万人，其中居民公共

食堂 29 个，用膳 6000 多人；区属基础托儿所 60 多个，受托儿童 2000 多人。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它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作。它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供给制的实行和浮夸风的盛行，大办人民公社化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不仅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第四章 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和曲折

第一节 纠正“左”的错误的努力

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局部纠偏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并着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中共仓山区委也看到，由于一些党员干部谦虚谨慎的作风逐渐谈忘，骄傲自满情绪逐渐发展，对掌握经济建设规律认识不足，对发展工业生产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群众积极性缺乏有效保护，加上前一阶段“以钢为纲”带动全面工作“大跃进”，片面追求工业产值的浮夸风普遍存在，使全区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出现失调，市场供应开始紧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小商品严重短缺，服务行业也由于“全民办工业”的影响，所剩无几，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为此，按照省、市委的部署，仓山区委于1959年起逐步采取了局部性的纠偏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整顿人民公社。1959年新年伊始，省委就要求把整顿人民公社作为党在农村中的中心任务来抓。仓山区委认真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澄清对人民公社问题的某些模糊思想，统一认识，然后派出部分区委委员和大批干部，深入人民公社检查生产规划、分配制度、生活福利、财务管理、干部思想作风等。同时，根据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原则规定，在人民公社中实行“一定”、“六下放”、“六不动”及“两个重要政策”。“一定”，即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确定为：三级管理、三级核

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除管理全社性的企事业和全社的公共积累外，其余均下放归大队管理，大队所有，各计盈亏。“六下放”、“六不动”，即把生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保证 80% 以上用于农业生产，不准随便调整、调动；把农业生产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下放给大队或生产队所有，归其管理使用，不要随便调整、调动；把原为高级社所有，现由生产队分散管理的牲畜、果树、茶园、鱼塘，均下放归大队或生产队所有，不要调整、调动；政原有的肥料厂和农具厂，不要调整、调动；下放粮食，凡粮食征购任务已完成的地区，应先安排队的生活，有余的应继续向国家交售，无力完成征购任务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减免，减免任务后自己安排仍有困难的，应本着多生产多吃、少生产少吃精神，合理进行统销，受灾区和经济作物区粮食不足的，应按需要量予以统销。完成征购任务而有余粮的，粮食不予调动，售出的粮款，队归队有，社员归社员所有；下放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一律归大队或生产队管理，粮食等费用和所需教养员等劳力，亦由各队自行安排，公社不进行统一调整。“两个重要政策”，即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其产品和必需的劳力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的政策；队的收入向社员分配的部分，必须实行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政策。

二是开展街道算账整风。1959 年三四月间，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除了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外，还决定将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省委随即召开会议部署人民公社的算账整风运动。5 月，仓山区委在区直机关开展算帐整风运动，发动群众揭发“作风不纯”的党员。6 月 26 日起，区委开展街道算账整风运动，先集中街道干部和基层干部进行整风，有街、所、干警 107 人参加，到 8 月 8 日基本告一段落。8 月 9 日转入群众性的全面整风，先后召开 80 场大会，受教育人数达 3525 人，于 8 月底基本结束。开展算账整风运动，主要是为了算清区和公社、公社和大队间的旧账，检查解决公社体制遗留问题，彻底算清集体的账目。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教育广大基层干部，改进干群关系，增强党的威信。全区居委

会经过整顿改造，由原来的 54 个调整为 42 个，选出基层干部 1260 人。^①

三是整顿民办工厂，着手纠正工业、商业盲目发展的偏差。民办工厂的发展，在进一步弥补大工厂生产不足和改善城乡人民日用品需要，增加国家财富，解放妇女劳动力，解决失业问题，减少社会救济，增加群众收入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民办工厂迅速发展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造成办厂的性质和生产方向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账目不清，工人思想觉悟不高，生产经营混乱等。鉴于这种情况，区委决定于 1959 年 6 月至 8 月着手整顿民办工厂，将区内 394 家微型工厂（场）合并为 25 家，其中，生产性工厂（场）17 家，加工性工厂（场）5 家，服务性工厂（场）3 家，共有职工 732 人，干部 54 人。同时，7 月 22 日起，开始整风工作，充分发动群众，耐心倾听群众意见，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访问、生产中漫谈等方式，广泛征求有关利于发展生产的意见建议。据仓前、水上、下渡 3 个街道统计，民办厂受教育职工都达 90% 以上。^② 10 月 15 日，省委财贸部工作组配合区委对区商业体制进行调整，纠正“大跃进”期间盲目发展商业的偏差。精简区内商业机构，紧缩区商业局，撤销工业品、饮食、服务等 3 个总店，精简蔬菜、废品调拨站。公社设综合商店，大队设供给部，精简职工 1342 人，占职工总数的 41.44%。

四是贯彻省、市委关于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指示，促进小商品生产。1959 年 4 月至 6 月，对竹、藤、木、铁器等 4 个手工业行业进行了调查摸底和排队，弄清了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原料供应和销售、质量、价格、成本等多方面情况，并初步提出了生产安排意见。6 月底至 9 月，进一步对各行业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和分析研究，重点摸索经验，全面安排生产。恢复手工业管理机构，成立区委小商品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区小商品生产工作队，并在区人民委

^① 中共仓山区委《街道整风总结报告》，1959 年 9 月 27 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民办工厂整风总结》，1959 年 9 月 2 日。

员会下设手工业联社办事处，同时成立区手工业劳动者协会。大力解决原材料问题，扭转过去只顾产值不顾产品品种、只顾数量不顾品种质量的状况，有计划地安排生产。从适应手工业经营特点，有利于生产发展，便利群众，满足社会需要出发，对一部分手工业进行了体制改组。注重开展修理服务业务，在全区工业系统和商业系统中掀起大搞修理服务突击周运动，恢复门市部，从而缓和了市场紧张局面。1959年5月至8月，共恢复手工业品种84种，新增22种，^①全区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品种、数量、质量等方面基本恢复到上年8月份的水平，基本上满足了市场的需求，福果、柑桔剪、远东皮鞋等名牌优质产品也已恢复生产。

五是贯彻“为生产服务、为消费者服务、为国家积累资金服务”的方针，努力做好财贸工作。1959年4月至7月间，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对缝纫、理发、修车、修鞋、五金修配等19个服务行业进行全面彻底的整顿。服务网点从上年的98个535人增加到223个（包括27个流动点）682人，并对457种修配价格和缝纫、理发店的等级作出适当调整降低。为更好地服务生产和群众生活，9月间又在街道普遍建立服务网，组织街道居民和妇女从事劳动服务工作。全区共开办34个服务站，服务人员735人，服务项目达35种。经过整顿，改善了服务态度，延长了服务时间，大大便利了群众。全区营业员受表扬的占90%以上，出现了通宵窗，服务项目也有所扩大。^②

然而，这些纠偏措施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作出必要的反省，并未能扭转“左”倾思潮占居主导的态势。不久，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全区又陷入继续“大跃进”的混乱局面。

① 中共仓山区工业部仓山区小商品生产工作队《关于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工作的总结报告》，1959年9月17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1959年工作总结报告》，1959年12月21日。

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与继续“大跃进”

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后，在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根据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省、市委关于“鼓干劲、反右倾”的有关精神，仓山区“反右倾”斗争开始主要在机关干部中进行，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检查对“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问题的认识和对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的态度，对“右倾思想”展开批判。随着庐山会议文件传达范围的扩大，“反右倾”斗争逐步扩大。在农村，“反右倾”斗争的主要方式是整风整社，主要批判对象是有所谓右倾思想的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在工厂，除重点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不满的“右倾言论”外，还批判一些领导干部的“一长制”思想；在学校和科研单位，则主要是批判“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最终，全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4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人，被定为“严重右倾思想”的46人，严重个人主义15人，蜕化变质分子1人，敌对分子1人，坏分子1人。^①

仓山区工业系统于8月10日起，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积极分子后群众的原则，普遍把“鼓干劲、反右倾”运动的精神传达贯彻下去。20日，仓山区工业部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鼓干劲、反右倾工作意见（草稿）》，明确了“鼓干劲、反右倾”运动的具体要求。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充分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使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二要抓住中心任务，组织力量，分期分批展开攻关，确保各项工作的完成；三要加强企业管理，以合理调整劳动组织、健全技术管理、加强责任制为主，加强计划管理，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四要掀起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高

^① 中共仓山区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总结（初稿）》，1959年12月23日。

潮，开展一场以质量为主的优质、高产、低耗、安全为中心的生产节约运动。10月28日，仓山区委又召开区、街、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干部扩大会议，部署开展全区“反右倾”斗争。参加对象主要是工厂和企业支部书记、厂长（主任），农业大队长以上的党员干部。

随着“反右倾”斗争的进行，在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新的跃进高潮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再度泛滥起来。仓山区委提出“借东风、鼓干劲、大干八九月，迎接国庆节”的口号，追求工业产值的飞速发展。紧接着提出“十月超九月，一月高一月，十二月最高月，提前40天跨入1960年”的口号，进而又提出“今年红到底、明年开门红”的奋斗目标，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劳动竞赛，以及“检查评比，交心献礼”，“结对子、对口赛”等一系列活动。全区各部门对一些生产指标不断加码，重新提高原来已经降低的指标，使1959年全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任务实现了“大跃进”。

工业战线上，经过广大职工干部同心协力，苦干巧干，终于提前47天完成全年生产计划。1959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338万元，比上年增长73.83%，超额完成27%左右；上交利润130万元，超额完成16.12%；85种主要产品（除橄榄外）全部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普遍比上年增长50%以上，其中铅笔产量增长将近7倍。创制仿制的新产品有高级云母绝缘材料降压开关、煤气发生炉、半电动车床、雨衣、胶布等200余种，新花样167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优质品大大增加，很多产品的质量已经达到或超过国内外先进地区的水平。其中，医用药棉和纱布、高级云母绝缘材料以及热水瓶竹花壳、楠木漆筷等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出口皮鞋质量居全省第一，竹壳质量超过全市水平。一些条件较好的工厂在技术革新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边投入生产边探索改进，采取“请进来，派出去”，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增长。1959年每人平均产值达3433元，比上年的2516元增长36.4%。不少工厂充实和健全了机修车间或机修小组，推动了机械化进程，区属工业机

械化、半机械化程度达 23%。^①

农业战线上，积极贯彻“以菜肉为纲、全面发展”、“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农副业生产取得大丰收，蔬菜和副食品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至 1959 年底，蔬菜播种面积发展到 1739 亩，比上年增长近一倍，超额 16% 完成年度计划；全年总上市量 95941 担，同比增长 25.4%，金星大队每人平均种菜 2 亩。市场肉菜供应有所缓和。全区生猪发展到 7056 头，同比增长 20%，红旗大队达到平均 1 亩地有 1.37 头；家禽发展到 56401 头，同比增长 143%，公社系统平均每户饲养家禽 15.5 头，同比增长 5 倍，先锋大队平均每户养家禽 54.5 头，每人养 13.5 头。区委还发动群众开垦“十边”地（如田边、路边、池边、房边、墙边等）种瓜豆，至年底共开荒地 750 多亩。^②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公社进一步巩固，公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大大增加。1959 年公社全年总产值为 67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3%，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 566 元，比上年增长 39%。食堂、托儿所也得到巩固和提高。^③

财贸战线上，商品采购和销售以及财政金融工作都取得了较大成绩，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市场总体稳定。1959 年，废品收购和贸易分别超额 28% 和 30.5% 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 1 倍多，大大支援了工农业生产；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93.21%，蔬菜销售额同比增长 344%；商业系统管理费用由上年的 17% 下降到 4.8%，商品损耗率大大下降，超额完成上交利润计划；税收全年入库 215.77 万元，比上年增长 69.19%，储蓄余额比上年增长 50 万元，超额 25% 完成计划。此外，文教战线上，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小学在校学生 16198 人，普

①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 1959 年工作总结报告》，1959 年 12 月 21 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 1959 年工作总结报告》，1959 年 12 月 21 日。

③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市二届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总结》，1960 年 5 月 15 日。

及了小学教育，还组织 3665 人参加各类业余学校；几种主要流行性疾病发病率比上年下降 99%，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①

1960 年春之后，全区人民再度掀起了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在“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和“大战煤铁钢”的号召下，继续开展“更大的跃进”运动，工农业生产实现飞跃发展，并带动了各项工作全面“大跃进”。

在组织生产中，各街道本着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的原则，使街道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巩固提高发展。至同年 3 月底，全区共办起大小工厂 1075 个，经整顿归并后为 348 个（其中社办 42 个，队办 306 个），参加生产人数达 7506 人，占全区居民中可以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劳动人数 9232 人的 81.3%，其中 80% 是家庭妇女。同时生产出硫酸亚铁、松节油、碳酸钾、小五金、小商品等 266 种产品。3 月份全区工业总产值达 689 万元。此外，还积极贯彻“服务生产、方便群众”的方针，整顿、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生活福利事业。4 月中旬以后，通过整顿巩固，全区大小公共食堂增至 53 个，在膳人数由 3 月底的 12000 人增至 28804 人；托儿所增至 138 个，入托儿童 2039 人；幼儿园 37 个，入托儿童 3618 人；服务站 94 个，服务员 493 人。^②

工业生产方面，1960 年 1—4 月的工业产值达 2699 万元，为 1959 年产值的 2 倍。全年工业生产的特点，一是开门见喜，生产一月高一月，直线上升。1 月比上年增长 11.63%，2 月环比增长 9.27%，3 月环比增长 31.4%，4 月环比增长 6.9%。二是向高精尖进军，大搞综合利用，大搞新产品试制，取得显著成绩。4 个月间共试制新产品 124 种，到 4 月底止，成批投入生产的有 64 种，试验成功的高精尖产品有录音机、绝缘机、绝缘漆、教学仪品、氢

①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 1959 年工作总结报告》，1959 年 12 月 21 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市二届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总结》，1960 年 5 月 15 日。

氧化铝、风琴等。在原材料综合利用方面，也试制成功牛尿代汽油、粘土浆糊、木屑制电木粉、肥皂水代洋油等等。三是街道工业进一步蓬勃发展。进一步明确了街道工作应面向组织生产、组织生活，以发展工业生产为重点，批判了街道居民没有技术、没有劳力不能办工业的错误思想，充分发动了群众，开展了全民办工业运动，出现了“男女老少总动员，家家户户闹生产，街街组组办工厂”的局面，因而街道工业有了飞跃发展。4个月间街道工业产值共1197万元，占全区工业产值的44%。共有产品如胱氨酸、硫酸亚铁、碳酸钾、磷肥、小五金、小商品、文化用品等266种，正常生产的产品有222种。^①

农业生产方面，1960年5月，全区播种面积从1958年底的3700亩发展到14598.27亩，增长了394%，并加强了田间管理和田间“四化”。蔬菜上市量不断上升。1—4月份共上市195644担，平均每天上市1630.4担，为1958年平均916担的179%，从而保证了市场上蔬菜的供应。贯彻“以菜肉为纲”的方针，大搞全民养猪，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通过抓思想、抓防疫、抓饲料、抓饲养管理、抓猪苗，毛猪有了很大的发展。到4月底止，全区毛猪饲养数达14864头，存栏数13032头，比1958年增长84%。其他家禽家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5月中旬为止，小家禽共达116285头，其中鸡42567头，鸭59651头，鹅6585头，兔7482头。贯彻“积极发展多种经济作物”的方针，经济作物生产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二三月间，根据省、市委指示组织职工、社员、居民、干部、部队等6880人上山开荒大造经济林，共开荒9912亩，造林8653.5亩，植树429890株，促进了经济作物生产的进一步发展。^②

①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市二届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总结》，1960年5月15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市二届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总结》，1960年5月15日。

为适应继续“大跃进”和生产不断发展的要求，全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出现了男女老少人人闹革新，白天搞生产晚上闹革新的局面。工业和财贸战线上有95%的职工投入了运动，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共提出合理化建议34274条，实现技术革新3701项。其中，重大革新485项，有3291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基本实现了手工操作机械化半机械化。工业战线机械化程度由1959年底的23%提高到1960年4月底的83.05%，财贸战线也从35.1%提高到76.41%。工业战线还出现了5个生产自动化半自动化单位和2条生产自动线，并创造了全省第一台包糖机、做鞋铆面机、印刷双面划线机、电动拼纱机以及全市第一台淌鞋机。技术革新和革命运动从工业和财贸战线开始后，迅速推广到农业、街道、文教等各个战线。到1960年5月中旬，全区有“跃进”法制造成功的有23531个，投入生产的561个；新代法试验成功6项，投入生产4项。^①

与此同时，在以生产为基础、以食堂为中心，大办工业、大办集体福利事业的基础上，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1960年4月10日，区人民委员会与区人民公社管委会实行政社合一，区辖5个街道办事处均改为人民公社。至5月1日，全区共建立8个城市人民公社，即：以街道居民为主组织起来的临江、仓前、上渡、下渡、水上5个人民公社，以国营工厂为主组织起来的先锋、亚峰2个人民公社，以福建师范学院师生为主组织起来的长安人民公社。全区居民应报名入社的9858人，批准为社员的9203人，占95.8%，机关、工厂等集体单位报名入社的团体社员35105人。^②至此，全区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0月8日，区委决定从农业公社中划出4个大队给城市人民公社，挂钩办农场，其

^① 中共仓山区委员会《关于市二届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总结》，1960年5月15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公社办公室《仓山区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小结》，1960年5月17日。

中，金星大队划给仓前街道，后坂大队划给临江街道，东升大队划给下渡街道，联建大队划给上渡街道。共组织闲散妇女劳力 753 人，办起 4 个农场。

三、开展新“三反”运动

由于“大跃进”运动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广大群众的积极受到严重挫伤，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大滑坡，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全国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市场供应极为紧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一些腐败分子却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活动，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泛滥，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也很严重。面对这种情况，1960 年 5 月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广大农村中发动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中共福建省委随即召开全省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对“三反”运动作出部署。这是继 1951 年“三反”运动之后开展的又一场新“三反”运动。

根据全省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精神，中共仓山区委成立了“三反”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叶聿芳任组长，区委组织部长林良浦、区法院院长王学芝任副组长，组员包括 2 名区委常委以及区委工交部长、财贸部长、农工部长、宣传部长和区检察长、监委副书记，共 8 人，下设办公室，由区监委副书记郭玉茂任主任。同年 6 月 8 日，区委“三反”办公室结合本区实际，提出了《关于本区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意见》。同时，作为福州市和本区的试点单位，饮食行业的冷作厂和农村的后坂、黎升两个大队先期开展“三反”运动。7 月 12 日，根据试点取得的经验，区委“三反”办公室又提出《关于全面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意见》。两份《意见》阐述了“三反”运动的必要性、指导思想、组织准备工作以及运动的对

象、政策等。

《意见》指出，几年来，在充实干部队伍的过程中，渗进了许多新的成份，其中有少数人的思想意识未得到很好改造，觉悟不高，沾染着资产阶级思想恶习，甚至还有极个别不法分子、屡教不改的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他们趁大家集中精力忙于生产，或某些管理制度不严之机，大肆进行贪污、盗窃等活动，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因此，开展“三反”运动的目的，一是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二是清除隐存在干部队伍中的坏分子，以纯洁党的组织。《意见》特别指出，要克服和批判右倾麻痹思想，反对姑息养奸，以及认为那些贪污分子“有办法”、“下不了手”，认为所在单位是“清水衙门”、“反不到我们头上”等错误思想，才不至于怂恿、包庇和丧失立场。《意见》要求层层建立领导开展“三反”运动的机构，除区委成立领导小组外，各系统都应成立“三反”整风运动领导小组，由基层支部副书记专管。

《意见》明确了“三反”运动的对象。工业系统主要是工厂企业的车间主任以及供销、会计、出纳、仓管员、承包基建人员等所有行政脱产干部，财贸系统主要是店主任以上干部和采购人员，街道系统主要是大队长以上和工厂、食堂的领导干部，农业系统主要是小队长以上干部。除上述重点对象外，凡有贪污嫌疑者，也属运动对象。在对这些对象摸底排队时，应考虑其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及历次运动中的表现。

《意见》规定，处理贪污分子的基本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大致可分为三类，区别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类为错误不严重的人（一般指贪污100元以下的），一般不给予处分，不戴贪污帽子，主要进行严肃的批判教育；第二类为错误较严重的，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并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第三类为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要给予严肃处理以至逮捕法办，是共产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另外，运动中揭发出的五类分子应一律清除出党和干部队伍。关于对贪污分子的分类和处

理，可以对照《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农村“三反”运动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计算贪污一般以执行中央规定的二三百元为宜，贪污千元以上者，即确定为大贪污犯，不要过高或过低，以免在处理上失之偏宽或偏严；对于贪污二三百元以下的，一般不给予处分，不戴贪污帽子，但应该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凡贪污千元以上，应定为大贪污犯，给予刑事处分、是党员的应开除党籍。《意见》还规定了对贪污分子进行批斗的审批权限。对贪污500元以上的个人或集体进行批斗，要报市委批准；500元以下、300元以上的报区委批准；300元以下的由各系统批准；100元以下的一般不进行批斗。^①此外，《意见》在初步摸底的基础上对全区贪污情况进行了初步估计。全区工业、农业、财贸、文教、街道5个系统中被调查的8575人中，贪污分子有456人，其中党员37人，团员35人，贪污嫌疑分子160人；贪污金额约100162元，粮票5041斤，粮食谷子5032斤。^②这个估计有扩大化的倾向。

“三反”运动试点期间，主要开展了反贪污斗争。试点结束后，开始以反官僚主义为重点，同时继续开展反贪污斗争。同年8月6日，根据福州市委扩大会议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对“三反”运动重新作出研究和部署，确定“三反”运动必须从反官僚主义入手，克服片面性。区委副书记施荫棠在会上强调指出，全区干部队伍中存在官僚主义、贪污盗窃、浪费等问题，特别是一部分干部存在严重官僚主义，工作不深入，或有严重暮气，不执行党的政策。因此，开展“三反”运动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开展“三反”运动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主要目的是为了普遍提高干部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改进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

^① 中共仓山区委“三反”办公室《关于本区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意见》，1960年6月8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三反”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意见（初稿）》，1960年7月12日。

系；整顿基层组织，纯洁干部队伍，清除坏分子；树立职工群众的主人翁思想，进一步鼓足干劲，推动生产；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堵塞漏洞。^① 会议号召群众揭发检举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重点检举生产、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以及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情况等，发动群众大放大鸣大字报，并根据放鸣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抓住关键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边整边改。此后，“三反”运动转为以反官僚主义为主，但反贪污斗争并未放松，仍在同步进行。

以饮食行业为例，共有 465 名职工实际参加了反贪污斗争，占全部职工的 97.28%。斗争从 6 月初开始，经历了四个阶段，历时一个多月。第一阶段为调查摸底阶段，主要是建立组织，排队研究，培养积极分子，汇集和整理材料。其中，排队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排队排出重点分子 33 人，后根据“宁宽勿严”、“大胆怀疑”的原则，又进行了第二次排队，重点分子增加到 60 人。排出重点分子的根据，一是已经发现有贪污线索或掌握部分可靠材料的，二是其个人和家庭经济收入显然悬殊很大的，三是所在店经济手续混乱的，四是群众有怀疑的，五是有关部门检举揭发的。第二阶段为坦白检举阶段，主要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和批判斗争会的方法，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共召开了 3 次动员大会，掀起了 3 次运动高潮。第一次动员大会是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动员大会之后，群众贴出大字报 1000 多张。第二次动员大会主要是讲政策，特别对重点对象，反复说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其主动坦白交代，同时号召群众继续放鸣。第二次动员大会后，群众又贴出大字报 1324 张。第三次动员大会的内容与第二次相同，实际是第二次动员大会的进一步深化。60 个重点分子中，共有 28 人作了坦白交代，还对 10 名阻碍群众鸣放和带有集团性贪污的重点分子，实行停职反省和隔离审查。第三阶段为批判斗争阶段，主要是对已暴露出的贪污分子开展批判斗争。共召开批判大会 3 场，小组批判会 23 场，批斗 38 人次，实际批斗 26 人，其

^① 《区委施书记在区委扩大会上讲话》，1960 年 8 月 6 日。

中，贪污 200 元以上的有 23 人。还对 60 名重点分子进行反复排队，逐个复查过滤，排除可能有小问题属于内部掌握的 24 人。其余 36 人中，贪污 1500 元以上的 5 人，贪污 1500 元以下 1000 元以上的 3 人，贪污 1000 元以下 500 元以上的有 6 人，500 元以下 200 元以上的 9 人，200 元以下的 13 人。最终确定问题较严重的 11 人，上报批准后，通过召开会议，责令这些人详尽坦白问题，重新作出书面交代，而后根据其坦白情况和认罪态度，分三批放回店内由群众监督劳动，等待处理。第四阶段为建设阶段，主要是开展正面教育，健全制度、堵塞漏洞；订立爱国公约，加强对不良行为的约束；根据有关政策，做好对贪污分子的善后处理工作。

从饮食行业开展反贪污斗争试点的情况看，全区反贪污斗争开展得较为深入彻底。据统计，全区在反贪污斗争中共揭发出贪污、盗窃、偷摸等不法分子 244 人，占参加职工总数 3095 人的 12.69%，其中有干部 53 人，党员 9 人，团员 6 人。被大会批判斗争的 60 人，被小会批判斗争的 88 人，停职反省的 78 人，集训的 45 人，畏罪自杀的 3 人。在定案处理中判处劳改、劳教、管制等刑事处分的 29 人，受开除、撤职、记过等行政处分的 122 人（其中干部被撤职 18 人），党员被开除党籍的 2 人，严重警告的 1 人，警告处分的 3 人，取消预备期的 1 人。

新“三反”运动的开展在当时还是较为顺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看，当时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做到为政清廉，腐败问题也不是那么严重，所以敢于发动群众，敢于引火烧身，只要有苗头就抓，决不姑息迁就；二是群众支持和拥护，相信党、相信干部真正能解决问题，所以一号召，运动就开展起来了，而且开展得较为彻底，在对犯错误对象的处理上，也比较严肃公正，很少或没有出现讲人情、走后门等不正之风。通过开展新“三反”运动，全区广大干部职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同时改进了企业管理水平，堵塞了管理漏洞，打击了不法分子。

然而，新“三反”由于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带来了一些副

作用。有的职工怕接近领导，怕上级找他谈话，怕积极分子暗算，整天提心吊胆，不敢大胆工作。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运动来势很猛，政策交待不够深透，工作简单，一些觉悟低、怕斗争的人试图通过假交代争取过关；二是政策界限不清，扩大了斗争范围，甚至混淆了是非；三是方法粗暴，甚至根据可疑的材料就进行斗争，存在追、逼、诱、哄现象；四是开展评比竞赛，区与区、系统与系统进行评比；五是存在经验主义，给工作带来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据统计，在全区被揭发的 244 人中，除刑事处分的 29 人由执法部门复查，自杀的 3 人，一时尚不能定案的 9 人外，其余 203 人中，批判处理基本错了的有 21 人，占 10%。直至 1962 年 6 月，根据关于对历次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指示精神，区委对新“三反”运动中被批判斗争的 244 人进行了核实定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运动中的错误，并给被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平反，向他们作了赔礼道歉。其中，恢复职务的 7 人，取消处分的 2 人，开除党籍改为留党察看的 1 人。^①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和 “左”的错误再度抬头

一、反“五风”和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

面对继续“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全面紧张，全党和中央决心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从农村开始。1960 年 10 月，中央发出指示，着手部署整风整社，坚决扫除“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11 月 3 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党用

^① 中共仓山区委监委《“新三反”运动核实定案工作总结报告》，1962 年 10 月。

最大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无偿调拨），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福建省委随即转发《紧急指示信》，并联系福建实际，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补充规定》，将中央的指示精神具体化。

接到《紧急指示信》后，仓山区委于同年11月15—17日举办了有农村人民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小队长、贫农积极分子、大队长、支部书记、会计、各部门负责干部）近600人参加的训练班，通过思想动员、学习文件，反复教育、解决问题，统一认识、部署工作等步骤，对《紧急指示信》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贯彻。12月27日，区委召开五级干部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并联系实际全面检讨“大跃进”运动期间的工作失误，研究制定落实《紧急指示信》和省委《补充规定》的具体措施，消除思想障碍，安定民心，把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真正动员起来，迅速彻底地纠正“五风”，以整顿被破坏了的思想作风。共有10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会后，仓山区委组织全区党员干部进行深入讨论，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工作实际查找思想根源，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统一到实事求是的原则上。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全党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仓山区委把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的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此前，由于一方面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城市各行各业对粮食、原材料和副食品等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区、社（队）工业战线太长，过多地占用了农业的劳动力，造成农业战线上力量相对削弱，仓山区委召开全区工农代表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城市大办农业过副食品自给关，精简劳动力，加强农村第一线的工作。到1960年底，区属38个单

位（含系统）共精简职工 8097 人，占职工总数的 24.8%。其中，6 个机关单位共精简职工 138 人，占机关单位职工总数的 20%；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作的 5572 人，占精简总数的 68.8%；抽调 69 名干部到仓山公社工作，充实农村第一线干部力量；组织 2000 多人的专业队，兴办 12 个自给性农场。^① 随后，仓山区委又于 1961 年下半年三次较大规模地压缩城市人口，分别动员 1958 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员返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并组织工厂富余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上山开荒种地，创办北峰山区和近郊共 4 个农场。

仓山区委还派出工作队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区经济形势作出比较客观的估计，根据上级指示和部署对存在的问题逐步加以纠正。1961 年 2 月，区委决定恢复上渡、亭下山、文藻山、中洲、敦睦里 5 个自由市场和市管会，在三叉街、洋洽设服务部，突破了原来由国家统一经营副食品的格局。同月，区委动员并批准 1958 年以来转为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小商贩 414 人，携带资金、用具，自由组建了 88 家合作商店，在商业体制调整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5 月起，又进一步调整商业体制，将 7 家地方国营商业企业改变为集体商业企业，压缩整个商业系统的经营规模，共精简职工 2069 人。8 月，区委开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业上，在广泛进行清仓核资的基础上，对全区工业体制进行初步调整，把全区 32 家工业企业中的 26 家工厂调整为 21 个合作社、3 个合作工厂、2 个合作小组，其中有 17 家全民企业转为集体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同时，开始全面压缩生产规模，调整产品结构。到 1961 年底，全区 32 家工业企业共有职工 4607 人，比上年减少了 2235 人，工业产值 1281.84 万元，比上年减少约 2000 万元。尽管生产和经营规模下降，但改变了严重浪费的局面，遏制住了经济效益下滑的趋势。

为彻底肃清“五风”对农村工作的影响，仓山区委于 1961 年 2

^① 中共仓山区委《关于城市大办农业，实现副食品自给的工作情况报告》，1960 年 10 月 8 日。

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场以反对“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进一步揭露“大跃进”运动期间浮夸、独断和瞎指挥的作风问题，进一步纠正工作中的重工轻农、重大轻小、重产值轻效益等思想偏差，以吸取教训，教育干部，转变作风，端正政策，健全制度，纯洁组织。4月19日，区委又开展了一次区委领导核心的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五风”，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教训，教育广大干部。整风运动大体分两个阶段进行，通过采取内外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充分揭发了问题。4月19日至27日为第一阶段，在区委常委之间开展思想交锋，揭开盖子，并召开有部长、局长、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放鸣揭发，充分暴露问题。同时，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召开有工厂、企业、街道、学校支部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动员，发动全体党员解放思想，帮助区委领导开展整风。5月4日至20日为第二阶段，主要召开有基层支部书记参加的区委扩大会议，掀起大放大鸣高潮。首先在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交锋的基础上，召开区扩大会议，由区委第一书记郝玉生代表区委常委作检查报告，然后以大会、小会的形式开展大放大鸣，揭发区委领导各方面的问题，再根据揭发的问题，由郝玉生书记向区委扩大会议作个人补充检查，最后由区委副书记梁寰海作整风小结报告，系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工作作风有了较大的改进，党的集体领导得到了加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工农业生产。

结合整风运动的开展，1961年初，全区各系统、各公社普遍根据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一般群众、层层发动、层层教育的原则，采取大会报告与小会座谈相结合、算账与回忆对比相结合、培养典型现身说法与普遍开展算账对比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组织实践相结合等办法，在广大干部与群众中开展了以生活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深入地进行大好形势教育、政策教育、艰苦奋斗与工农联盟的教育。3月10日，仓山区委批转区委宣传部《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

抓紧时机，坚持正面教育和大鼓干劲的方针，根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补充规定》的指示精神，区别不同对象，针对实际思想，运用各种形式，大讲形势，大鼓干劲，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活的思想教育，并将社会主义教育与整风教育密切结合进行，做到生产、生活和整风三不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在工厂、企业职工和其他群众中，广泛开展“两忆、四好”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具体方法：一是“两忆”，即忆阶级苦和忆民族苦，通过忆苦、谈甜的活生生具体事例，进行现身说法，进行苦甜、新旧对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树立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心；二是树立“四好”标兵，即阶级立场好、生产工作好、艰苦朴素好、生活安排好，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标兵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三是“一总”，各系统、各公社选择1至3个先进基层单位，发动群众总结工作成绩和经验；四是“三讲”，通过领导讲、标兵讲、群众讲，组织开展讨论交流，提高认识；五是“一结合”，坚持文娱活动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增强教育效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提高斗志，鼓足干劲，迅速克服畏难松劲情绪，争取农业增产和工业生产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以及更好地安排人民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面对三年连续“大跃进”后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出现新的不平衡局面，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当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的中心内容是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发展；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使其向纵深发展；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由此，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有关指示和部署，仓山区委、区人委着手贯

彻实施“八字方针”，对全区国民经济作出调整。

在农业方面，区委、区人委根据中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及省、市委有关指示精神，从整风整社入手，以退赔为中心，对农业进行调整。同时，区委、区人委积极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着力解决《紧急指示信》没有完全解决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根据“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以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区委、区人委分期分批进行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工作，把原来 41 个生产队（每队平均 44 个劳力）调整为 55 个生产队（每队平均 32 个劳力），^① 并实施超产奖励和一包二照顾等政策，从而大大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65 年是仓山农业战线自解放以来增产最多的一年。粮食总量达 1561123 斤，比上年增长 13.6%；蔬菜上市量达 107787 担，完成年计划的 128.3%，比上年增长 17.5%；生猪上市 2003 头，比上年增长 40%。此外，淡水鱼、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都获得最新成绩。

在商业方面，区委、区人委进一步检讨了“大跃进”期间的失误，虽然思想上并未正面批判“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这一脱离生产力实际状况的错误观念，但在具体工作中已采取了否定这一错误观念的做法。

一是整顿街道公共食堂。全区 4 个街道公社共 37 个公共食堂，炊管人员 287 人。^② 针对公共食堂在经营形式、管理制度、分配、供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规定，食堂应以寄、炖饭为主，也可适当经营稀饭、机动饭，但一般不经营果点，若开支不平衡，则从调整人员入手，把多余人员安排搞其他生产；应在单独核算、自负

^① 中共仓山区委会《1962 年工作总结报告》，1963 年 1 月 10 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办公室《关于街道食堂的问题与整顿意见》，1961 年 10 月 19 日。

盈亏的基础上，加强公社、大队对食堂的领导，主要由大队组织群众加强监督与加强炊管人员的思想教育；应建立真正的食堂民主管理委员会，促进食堂更好地为群众服务；食堂财务自行管理，但对有兼营果点的食堂应督促建账，防止漏洞，并将此前所结余的粮食冻结，防止贪污浪费；食堂可有一定比例的积累和福利，大队也可收少量的管理费，工资可采取评工记分的方法，防止一切都分光的现象；应发动炊事员开展增产节约活动，解决煤炭供应不足问题；各公社应对食堂的房屋问题进行一次摸底，凡是多余的应和房管部门配合予以调整，首先应退还确实有居住需要的原居住户；对于公社、大队投资的设备，凡食堂需要的可折价，可采取借给食堂或租赁办法，每月按总收入摊提一定的比例分期交还。

二是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根据中央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殊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精神，区委于1961年12月11日提出了《关于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初步意见》，要求认真贯彻“团结职工群众的绝大多数，打击极少数，教育与惩办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快、稳、细地推进运动的开展，并明确运动的重点是财贸部门以及工厂企业的领导和掌管经济物资的采购、供销、仓库部门，在机关、街道、居民、农村、工厂职工、学校中则应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严厉打击处理二盘商、严重违法和蜕化变质分子，以配合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开展。16日，区委决定成立反对商品“走后门”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委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胡芳清任主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庆生任副主任。并研究确定了工交、文教卫生、财贸系统和临江、上渡、下渡、仓前公社反对商品“走后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同时要求建立相应办公机构，配备适当数量的专职干部。全区财贸系统中参加单位11个，参加人数1991人，占总人数的92%，其中区级干部29人，一般干部264人，职工1698人；有党员108人，团

员 109 人。^① 运动历时 3 个多月，共经过五小阶段。第一阶段采取从上到下，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干部后一般群众，层层贯彻，内外结合的方法，先后分别组织基层领导干部、全体党员、干部和职工进行学习、座谈、讨论，提高认识和觉悟，明确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针政策，启发参加运动的自觉性，为整个运动健康开展打下思想基础。第二阶段在不断提高干部职工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首先从基层领导干部开始，普遍层层开展联系实际，自觉地“洗手”“挖根”，动员坦白检举，揭发问题，同时对企业和人员等问题进行分析排队，调查摸底，初步揭发了企业问题和重点对象。第三阶段根据暴露出的问题，进一步分析研究，确定重点单位和重点对象，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接着分别先后有计划转入重点批判和斗争。第四阶段从小结检查前一段运动入手，普遍发动开展普查漏洞的群众运动，在普查中贯彻边查边堵边反边建的精神，同时在复查中结合核实查对重点分子材料。第五阶段是堵漏洞，全面整改，对重点分子核实定案，分别处理，并都向群众作总结，进一步巩固运动的成果。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开展，扭转了全区财贸系统各单位普遍存在的“走后门”之风，并且揭发出情节比较严重的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 31 人，根据政策分别给予应有的处分，其中上报法办 2 人，行政处分 13 人。^② 同时，通过查漏洞，清查出一一些严重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及其他违法乱纪、蜕化变质等重点对象，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并通过初步建立健全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企业的管理，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供应，缓解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当然，作为一场群众性运动，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具有一定“左”的色彩，在对重点对象开展批判斗争中，仍存在不执行政策和简单急躁的现象。但因运动开展的

^① 中共仓山区委财贸部《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总结报告》，1962 年 2 月 28 日。

^② 中共仓山区委财贸部《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总结报告》，1962 年 2 月 28 日。

时间较短，也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各种关系，所以，总体上看，其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三是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决定进一步开放农贸市场，以改变过去居民群众生活用品全部由国家统一配给的局面。1962年初，相继恢复开放梅坞、洋洽、三叉街、菖蒲、太平巷、河边、公园、对湖、岭后、程埔等10个农贸市场，并在三叉街、洋洽开设依托行栈，组织物资交流。同时，加强市场管理，全区共设立9个管理委员会，配备管理人员95人、协管员64人，由城市人民公社副社长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以及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代表和市场管理员组成管理委员会，执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管理政策。各市场除国营、合营企业的门市部供应各类副食品外，也允许个体商贩和社员（农民）个人进场销售。为了活跃市场，区商业部门还动员1958年被并入国营商业后又转为个体商贩的500多户参与市场销售，并把1958年动员上山劳动、筑路、支前的220名个体劳动者召回本区从事商业活动，准予发证经营。初始时对市场经营的品种范围做了一定限制，规定凡不属于国家统购的一类物资和国营商业定购的二类物资，如木材、毛竹、黄麻、烤烟、茶叶、香菇、莲子、龙眼、荔枝、笋干、生猪、牛皮、水产品等，以及持有完成国家定购任务证明书的农民所拥有的三类物资，均可进入市场买卖。同年下半年，区委贯彻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活是目的、管是手段”的指导思想，对农贸市场实行“大胆地放，认真地管”。8月之后，取消原来的经营限制，允许国家统购的一类物资如粮、油、肉等公开上市，使市场销售活动渐趋活跃。至同年底，集市商品平均价格总水平指数比1961年下降23%。

在工业方面，区委、区人委进一步认真吸取“大跃进”期间盲目发展工业的教训，组织工业调查小组，深入企业第一线，一家一家地进行调查摸底，然后作出客观的分析，并对存在问题作了探讨，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只重产值不计成本，造成全区工业利润大幅度下降，有三分之一工厂由盈转亏；二是在兴办企业方

面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盲目兴办“卫星工厂”，1961年、1962年间共兴办了近400家，后来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合并，但生产水平仍然很低；三是在产品结构上，重视重工业产品生产，轻视农业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部分企业还放弃了农业和生活日用品方面名牌产品的生产，转为生产机械产品；四是在体制上搞平均主义，没有真正实行按劳分配，盲目发展全民企业。针对以上问题，区委、区人民委员会根据“八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规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全区工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1962年1月，区委着手调整农村家庭手工业，将全区2458户、2933个妇女参加的88项家庭手工业归口管理，采取“三收一统”，即机电、运输、土木修建收归公社管理，闲散劳力、粗杂工、临时工的调配权归公社，各大队设生产管理员收管理费。3月5日，区委成立精简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施荫棠任组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庆生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区委工交、财贸、组织、宣传等部门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领导开展精简职工、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到12月止，全区共精简干部122人，精简职工3048人，有943人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同年3月，区委着手调整区属工业，将全区15个工厂占总数的45%上调市管，有20个厂（社）下放社办，改为手工业合作社8家，生产小组8家，职工共1237人。6月，区委开始对管理体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工业和商业的主体收归市主管局管理，对余下的企业进行再压缩，精简职工500多人。全区32家企业中仅保留福州第四印刷厂、福州铅笔厂、福州医疗化工厂、仓山糖果厂、仓山化工厂5家地方国营工厂，其他27家企业均转为合作社生产性质，恢复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停业整顿仓山橡胶厂、仓山麻袋厂，停办25家街道小型工厂中的18家。同时，在生产上，增加民用必需品和农业用具的生产，停止机床、电机等12项工业服务器生产，转向农业和生活日用品生产；在供销上，开放集市贸易，允许私人经商，并对紧缺物资实行严格的计划供给。7月16日，区委成立建筑业整顿领导小组，对3家区属建筑社、3家公社（街道）建筑社进行整顿。年底，建立区建筑合作联社。11月17日，区委批准

1958年后改造的13个行业、1153名小商贩退出国营企业，归各行业统一领导，实行分散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活跃市场经济。经过调整，工业生产中的各方面关系得到理顺，为工业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年底，全区工业总产值245.6万元，比1961年减少近千万元。

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仓山区国民经济得到了调整和恢复。从1963年起，区委、区人委逐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巩固、充实、提高”上，推动国民经济调整不断走向深入。

区委、区人委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为突破口，在确保原来名优产品的基础上，狠抓技术革新，推动产品更新换代，促进区属工业稳步发展。1963年上半年，仓山机电生产合作社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着手研制农用喷灌机，经过一年数十次的试验，于1964年7月成功研制出全省第一台农用喷灌机。后经菜农试用获得满意效果，于同年10月送北京参加全国农业机械展览会展演3个月，受到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产品名列全国喷灌机第一名。仓山铁器生产合作社（“大跃进”期间为福州轴承厂）于1962年停止机械产品的生产，于1963年恢复了正金利牌柑桔剪、马草刀、泥铧、锄头等市名优农用产品的生产。同时，大力发展市名优产品生产的还有，仓山五金生产合作社生产的竹刀、弹子锁，仓山木器生产合作社生产的丰收牌尿勺、双喜牌镜框、双狮牌镜箱，仓山缝纫生产合作社生产的美丽牌、联合牌服装，仓山鞋革生产合作社生产并用于大量出口的飞脚牌皮鞋，仓山毛笔生产合作社生产的双狮牌小楷毛笔，仓山算盘生产合作社生产的灯塔牌算盘，仓山藤器生产合作社生产的福塔牌藤箱，仓山竹器生产合作社生产并大量出口的竹制品等。由于大力发展上述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又使区属工业生产摆脱了困境，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至1964年底，全区工业总产值613.72万元，比1962年增长了1.5倍，实现了无亏损企业的目标，企业也发展到28家，职工2016人。1965年，虽然福州市进行了又一次工业体制大调整，仓山区共有7家较大企业收归市管，但全区工业生产仍然保持良好

的发展势头，年产值达 483 万元，扣除收归市管的 7 家企业，仍然比上年增长了 23%，企业总数相比 1962 年增加了 3 家。

区委、区人委继续开放市场，实行以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个体经济为辅的经营体制，加强了城乡物资交流，市场供应日趋好转。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国家掌握的物资越来越多，1963 年 4 月，根据中央《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精神，区委、区人委着手对市场供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对私营商业实行“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替代、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将肉类食品收归国营商店经营，增设国营粮、油议价网点，以代替市场粮、油交易，同时开放国营商店经营的全部熟食品和一般日用品供应，不收票券，从而有效地平抑了市场物价，使集市商品价格与国营商店牌价大体平衡。1964 年，发给居民的三大商品供应票券即粮票、油票、烟票的黑市交易价格比 1961 年大幅度降低，其中，每斤粮票从 4.15 元下降到 0.26 元，每斤油票从 11 元下降到 0.9 元，每包香烟票从 1.6 元下降到 0.05 元。全区集市贸易平均价格指数也比 1961 年下降了 75%，集市价格与国营商店牌价大体一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全区人民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但 1965 年后，由于进一步控制市场规模，对粮、油、糖、肉、茶、柑桔等主要副食品作出了禁止上市的规定，并通过增加国营和集体商业网点排挤个体商业，又造成了集市贸易的萎缩。1965 年全区农贸产品年上市量和成交额分别比上年下降了 23.83% 和 16.29%。

经济调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随着调整的全面展开，不仅经济发展中的体制、结构、比例需要调整，而且诸如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和因管理问题造成的物资大量积压、浪费，以及商业渠道不畅、物资供应困难等，都成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中的瓶颈问题。由于“大跃进”期间盲目发展生产，也给仓山区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区委、区人委根据省、市委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指示精神，恢复和健全了各级精简领导机构和办公机

构。区委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精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工交、财贸、文教、机关和4个街道都指定一各部长或街道办主任分管此项工作；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居委会等基层单位也都由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负责此项工作，建立了层层负责的精简工作机制。同时，在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制订规划，着力开展精简城市人口和就业安置工作。1961年至1962年，全区共精简机关干部122人，职工7302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人3183人，集体所有制工人2756人，临时工1363人。为了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减轻城市人口压力，区委、区人委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一是动员由农村招工进城的职工全部返回农村，共有3048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二是组织和动员城市户口的社会青壮年上山下乡，先后有1032人赴崇安、建阳、罗源、顺昌、浦城、光泽等地农场、林场、茶场和生产安家落户。1963年3月27日，第一批150名社会青年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崇安、建阳农村落户。三是先后组织被精简职工800多人参加修建永泰至闽清的101公路，另把其他被精简的失业人员和毕业的中学生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自救，成立福州市劳动服务处第四大队。1963年，全队共有454名职工主要在市区承接基建工程、修路、筑堤和为较大工厂搞厂内搬运等业务，由于服务质量好，队伍发展很快。1964年第四大队还创办附设电气修造厂和化工厂，到1965年全队职工发展到1800多人。四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巩固发展，安排就业人员2000多人。上述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城市人口规模，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稳定，并支援了工农业生产。1965年，全区人口仅比1956年的9.5万多人增加了5000余人。

区委、区人委还着手对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调整。一方面由于福州城市发展规划的要求，对仓山区的教育投资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出现了盲目办学的倾向，掀起了全民办学的热潮，学校数量大增，办学规模膨胀。1957年全区有幼儿园9所、小学19所、中学8所、大中专学校5所，在校生1.6万多人。到1960年，全区共有幼儿园55所、小学33所、中学6所、技

工学校 1 所、中专学校 5 所、大专院校 2 所，在校生 3.5 万多人。办学规模与实际能力相脱离，办学质量也明显下降。“大跃进”期间，为了支援工业和农业，学校过多地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 1958 年秋季，全区大中专院校和中学的 1 万多名学生停课 3 个月，参加了全区“大炼钢铁”运动，破坏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导致办学质量严重下降。1961 年下半年，根据上级部署，仓山区开始纠正办学偏差，整顿学校工作，恢复学校教学秩序，局面有所改观。1962 年，仓山区全面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压缩办学规模，停办了一批学校，使办学规模与财力物力和师资状况相适应。其中，停办幼儿园 19 所、小学 5 所、中专学校 2 所、大专院校 3 所。1963 年，仓山区继续抓好整顿学校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办学成绩较为显著。福建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福州高级中学被评为省重点中小学，仓山小学被评为全国教育红旗单位，使全区重点中小学达到了 4 所。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青少年就学率大大提高，各类学校规模也随之扩大。区委、区人委在大力抓普通教育的同时，于 1963 年创办了第一所职业中学仓山公社农业中学，采取走读和住宿相结合的办法，并将三县洲 50 亩田地拨作农业生产实验地。仓山区因办学成绩显著，被省教育厅授予“福建省办学先进单位”。1965 年底，全区有幼儿园 36 所、小学 33 所、中学 7 所、技工学校 2 所、中专学校 3 所、大专院校 1 所，在校生达 2.8 万人，比 1957 年增加了 41 所学校、1.2 万名在校生。同时，教学质量也大大提升，高考升学率名列全省前茅。

通过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仓山区国民经济得到了调整和恢复。一是初步建立起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大跃进”运动期间，受“左”的思想影响，过于强调建立计划经济，突出表现在流通领域取消集市贸易，采取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度，以配额方式在全区建立中心供应点及供应网点，对生活日用品实行完全的计划供应，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其结果是限制了城乡商品交流，造成供应物品减少，居民生活严重不便。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区委、区人委从 1961 年起逐步取

消了原有的供应体制，陆续开放农贸市场，在注重发挥国营主渠道作用的同时，鼓励个体商贩和农民参与商品销售，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供销体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使市场供应渐趋繁荣，仅两三年时间就根本改变了面貌。二是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辅的所有制体系。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期间搞“穷过渡”和过分强调公有制的偏差，区委、区人委从1961年底开始在所有制方面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将地方国营工厂转为集体性质的合作社工厂，动员1958年以来并入国营商业的一批个体商贩退出，或重新组建合作商店，或让自行开业，成为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调整，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状况，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三是较好地处理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大跃进”运动期间，全区工业产值虽然逐步增长，但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亏损企业数不断上升。通过国民经济调整，区委、区人委在发展工业方面克服了只讲速度不讲效益甚至靠牺牲效益来求速度的弊端，一方面大规模压缩生产、精简职工，另一方面加强了成本核算管理，开展清仓清算运动，大大降低了生产消耗，实现了工业产值和利润同步增长，到1964年全部消灭了亏损企业，从而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四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有计划地调整生产和产品结构。纠正“大跃进”运动期间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偏差，停止一批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大力抓好以满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名牌产品的生产。

然而，由于受“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后果纠正并不够，广大党员干部在政治上的顾虑还没有真正消除。1964年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解往往同具体工作相联系，把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和市场调节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加以严格地限制，从而造成初步建立起来并且行之有效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遭到破坏。1965年对全区中心市场进行整顿后，个体商贩甚至合作小组都被调整掉，个体劳动者也被逐步收回工商执照，至该年底全区只剩下个体户498户。这些都影响了全区国民经济的继

续正常发展。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左”的错误日趋严重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批判了“单干风”和“翻案风”，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此后，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同年12月下旬起，在总结3个整社试点合作社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仓山区在手工业系统开展了第一批整风整社运动。参加运动的有18个厂（社），1279名职工。^①区委组织18个整社单位支部书记、指导员、厂长、主任、厂（社）骨干积极分子和工作组成员共54人进行训练，认真学习和讨论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和省、市委关于整社工作的指示，并广泛交流整社试点工作经验。在训练好整社干部的基础上，全面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宣传教育和组织准备；第二阶段为发动群众提意见，排查问题，进行整改；第三阶段是建立制度，健全组织；第四阶段是巩固提高，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整个过程自始至终贯穿以教育为动力，以生产为中心，边整边改，做到教育、生产、整改三结合，生产和整社两不误。1963年2月1日，区委成立整社办公室，并抽调70多名干部进驻厂（社）开展整风整社。至年底，共发现社干中弃

^① 《仓山区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批整社第一阶段工作情况报告》，1963年2月1日。

工经商的有 493 人，退社单干的有 445 人，开地下工厂的有 78 人，买卖票证的有 40 人，贪污盗窃的有 47 人，聚餐请客 3.5 万余元；工交 28 个厂（社）因管理不善损失 11.2 万多元。

1963 年 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即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此后，城市“五反”运动首先在中央机关和部分基层单位展开，农村社教运动也开始了试点。

4 月 20 日，根据省、市委的指示和部署，仓山区委决定以增产节约运动为中心，有计划、有步骤地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区开展“五反”运动。全区共有 118 个单位（机关 14 个、工交系统 68 个、财贸系统 10 个、文教卫生系统 26 个），总人数 8716 人，其中，干部 930 人（县级 23 人、区级 117 人、一般干部 790 人），职工 7716 人。^① 整个运动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组织动员学习，做好思想准备，提高认识，消除顾虑，端正态度；第二步领导干部“下楼”“洗手洗澡”^②，向群众作检查，结合整顿相关制度，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包括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特殊化，以及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等缺点错误；第三步根据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加以排队分类，提出整改意见，制定整改措施，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4 月 24 日，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区委书记、区长在会上作“下楼”检查，开展互相批评。紧接着，区委、区人委的各部（局）长也先后在各自单位党员大会上作检查。5 月 17 日，根据市委关于机关“五反”运动转入第二阶段的指示精神，区委安排在区属机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历时一个月，主要是澄清各种混乱思想，提高工作水

① 中共仓山区委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区开展五反运动的意见》，1963 年 4 月 20 日。

② 即指领导干部下到群众中去作自我检查，交代问题。

平，改变工作作风，反对特殊化（包括经济上的特殊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感），解决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

7月16日，仓山区委发出《关于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手工业合作社开展整社运动的初步意见》，决定在全区广大职工群众中进行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社教运动，在全民所有制及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手工业合作社（店）中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和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整社运动。全区属全民所有制及大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企业共有5个，职工659人，同时开展“五反”运动；属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有66个，社员5323人，^①分四批继续进行增产节约和整社运动，不提“五反”。“五反”运动和整社运动的做法大体相同，分四个阶段进行，约三个半月时间。第一阶段是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职工、社员的思想认识和觉悟进一步提高，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运动中去，时间约25天。先由区委领导干部做报告，联系实际，开展活的教育；后组织小组讨论，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再自上而下一层层地训练好骨干和积极分子，使教育者先受教育，并通过骨干去教育和影响群众。同时，注重发掘先进典型，进行现身说法。第二阶段是充分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开展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工作，时间约为45天。在全民所有制及大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结合增产节约，集中力量充分发动群众揭发生产上、工作上的浪费现象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与这些现象和问题有密切联系的分散主义、官僚主义，为深入开展增产节约、改进经营管理工作创造条件。在手工业合作社中，认真检查贯彻勤俭办社方针的情况，查质量、查原材料消耗、查财务开支、查劳动定额、查管理制度和清财务账目、清物资、清仓库，彻底暴露问题；认真检查民主办社方针的贯彻情况，整顿企业。第三阶段是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时间约15天。放手发动群众，大

^① 中共仓山区委会《关于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手工业合作社开展整社运动的初步意见》，1963年7月16日。

胆检举揭发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号召有问题的人坦白交代，并采取群众检举揭发和专案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查清、查实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事实，并做好定案处理工作，确保证据确凿、处理适当。第四阶段是总结经验，更加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巩固“五反”运动和整社运动的成果，时间约30天。根据暴露出来的问题，结合企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行再一次的社会主义教育；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整顿党团、工会、民兵等组织，纯洁队伍，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做好审核定案工作。

12月24日，仓山区委在总结信平居委会、区木器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关于贯彻市委“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报告”的意见》，要求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搞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使一切人都受到教育；进而放手发动群众，大放大鸣，大揭盖子，使面上运动起到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促进生产和工作的作用。对于职工、手工业社员群众，要求进一步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思想，自觉清除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并认真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劳动竞赛；对于财贸系统合作小商小贩，要求自觉接受改造和群众监督，揭发批判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加强爱国守法观念，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对于街道居民，要求进一步发扬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做好勤俭持家、教育子女、提倡晚婚、计划生育，鼓励亲人积极生产和工作，并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树立新道德、新风尚。全区74个单位首批展开了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间约为1个月，共有6460人参加。

1964年3月，仓山区决定在全区开展“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专业队伍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宣讲

“双十条”^①、张榜公布账目、内外查账查证、狠抓整改，充分、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大放大鸣，进行大清大查。除在区属机关开展“四清”运动外，重点在开展第二批整社运动的18个单位中清查企业漏洞，包括仓库管理不严，进出仓没有验收、登账制度；财务制度混乱，“四多”（报销白条多、库存现金多、没审批验收手续的多、乱冲账的多）现象严重；不合理乱开支；原材料、工具散失；私设银行假户头等等。同时，促进领导干部带头“下楼”“洗手洗澡”，接受教育，充分认识官僚主义的严重性。通过开展“四清”运动，查清了7个贪污盗窃集团，有73人进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其中贪污盗窃60人，金额4.9万元，投机倒把13人，金额9400多元。^②在查漏洞的基础上，还进行了群众性的整改工作，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在企业管理方面，加强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分工负责制；在财务方面，建立仓库管理制度，财务预算、审批、验收制度，财产登记保管制度；在生产方面，贯彻勤俭办社方针，精简非生产性开支。为推进“四清”运动的开展，区委还于同年12月决定从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抽调干部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到该年底，共处理违法案件330起。

1964年底1965年初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规定：全国城乡的社教运动一律以“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也改为“四清”。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7月22日，仓山区委派员进入公、检、法机关开展“四清”社教运动，并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后来成了“文化

^① 即指中央于1963年5月20日作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和9月作出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

^② 《仓山区第二批开展“整社”运动单位的“四清”情况》，1964年8月5日。

大革命”的主要口号，也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根据中央关于“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的决定，仓山区“四清”运动至1966年4月结束。

社教运动的开展，对于纠正一些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现象，克服集体经济管理制度中的某些缺点，以及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问题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迫害；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也被扣上“资本主义倾向”或“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而不能得到贯彻执行。这些左倾思想的日趋严重，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左”倾错误的不断升级埋下了伏笔。

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的 内乱及其终结

(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

第五章 从内乱到区革委会的成立

第一节 全区内乱局面的形成

一、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

1966年，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时，“文化大革命”降临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主观愿望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力图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中国自己的理想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以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他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严重地脱离了实际，夸大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所谓“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避免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

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①。“五一六通知”成了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从而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波及全国、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中共福建省委于5月29日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宣传、文教、新闻、出版、学校等单位全体党员干部，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紧接着，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次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在短短的时间里，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6月19日，中共仓山区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会后，成立区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区属工厂、商店、学校干部职工及街道居民群众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24日，区文革小组调查本区“二社、二摊、一馆”（美术社、缮写社、茶摊、连环书摊、文化馆）的政治问题，揭发其“开黑店”、“说黑书”、“讲黑话”等行为。至7月6日，在20个书摊收缴禁书5350本，取缔无证商贩410户，整顿有证商贩440户，整顿美术、缮写两社及20家连环书摊，整顿17个茶摊。

6月25日，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决定》，强调要分期、分批、有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运动，并确定县以上的领导核心机关和宣传、教育部门作为首先开展运动的重点。7月，仓山区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区励精、福民、晨光等3所民办中学，在教育系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老师，区内社会动乱的局面开始出现。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76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二、内乱局面的形成和党政领导机关的瘫痪

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出有十分错误的规定，确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省委随即作出《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队（组）的决定》，由学生和教职工组成“文化革命筹委会”取代工作队（组）领导运动，引发了全省红卫兵运动的迅猛发展。8月间，区内省、市属大学、中学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出现“停课闹革命”、“革命大串连”、“红卫兵运动”等所谓新生事物，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和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高潮。8月6日，仓山区内各中学以“东海前线红卫兵”为主体的部分学生冲向社会，进行“破四旧”运动，冲击或捣毁教堂、寺庙17处，一批由单位或个人珍藏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物品遭焚毁，不少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或被完全毁坏。24日，区内红卫兵1983人、基层干部和工人796人先后3次搜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所谓“牛鬼蛇神”的住宅，对其进行批斗游街，许多珍贵书籍、文物等在抄家时遭到毁坏和没收。陈雪菲等一批工作成绩显著的专家学者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至10月，全区共抄查769户，批斗83人，戴高帽游街110人。

随后，为盲目的政治热情所支配，受极左思潮的煽动与驱使，红卫兵运动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各种造反派组织也相继涌现。8月29日，仓山区内福建师大附中学生成立“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后，全区各行各业陆续成立了造反派组织。9月初，区内市属中学红卫兵首次冲击区党政机关。同月，在梅坞路边墙上出现第一张由区属仓山小学一工友贴出的第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矛头指向区党政领导干部。22日，全区各单位掀起大搞“红海洋”活动，区内各主干道和单位院内墙壁

均用红油漆刷作底，书写毛主席语录；各种红色的旗帜、标语、臂章、语录本随处可见；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个人崇拜盛极一时。此后，各学校师生、工厂工人、机关干部、居民纷纷上街贴大字报，一场所谓揪党内“走资派”的运动在全区扩展开来。

红卫兵们还四处串连，奔向社会各个角落，到处炮打党政领导机关和各种“走资派”，揪斗各种“反动权威”。9月12日至10月10日止，全省组织师生赴京参观开出34列专车，总人数达7100人。仓山区第一批赴京串连的红卫兵约40多人，在京期间参加了北京大学批斗校领导的万人大会，还到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看抄大字报，国庆节当天在天安门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后于10月5日乘火车返回。同时，北京等地学生也到各省市串连，与当地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大造各级党组织的反，大动乱的局面进一步升级。根据福州市委的部署，仓山区委在麦园路18号成立“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抽调区委、区人委干部接待外来串联的师生食宿，并购置一批冬衣、棉被供他们御寒。由于受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大串连的影响，区内中小学停课，许多教师成为被学生批斗的对象。在36所幼儿园、23所小学（其中民办11所）、7所中学（其中民办2所）、3所中专学校、2所技工学校、1所大专院校（以上合计在校生2.8万人）中，停办了10所公立、民办幼儿园和2所民办中学。与此同时，全区企业工人也开始走向社会“闹革命”，使大多数企业陷于瘫痪状态；个体工商业被取缔，市场被撤销，街道、居委会办的工厂（场）也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停办；肉食、水产等副食品供应均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制度。

同年10月初，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邪风便在全国范围内狂暴地刮了起来，从省到地、县及至社、队各级党政的机构组织普遍受到冲击。1967年1月初，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得到

毛泽东的首肯，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机构的全面冲击，开始发展为遍及全国的“全面夺权”。1月24日，仓山区委、区人委被区机关造反派“市机联总”非法夺权，区委、区人委及所属工作机构的印章相继被收缴，造成区机关工作无法进行。25日，“市机联总”、“工联总”九分部、工农赤卫军、教工赤卫军、附中66915、附中红九二以及仓山公社农民组织等宣布联合掌印，区委书记、区长及各部门负责人“靠边站”，区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状态。随后，区属4个党委会、2个党总支、49个党支部也相继陷于瘫痪，全区447名党员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①区委、区人委及所属各部门负责人普遍“靠边站”（即停止工作），而且被扣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黑帮分子”、“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揪斗游街，甚至惨遭毒打。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区党政领导机关普遍处于难以运转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基本陷于停顿，全区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第二节 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三支两军”和武斗的升级

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难以正常工作，从而造成几近失控的混乱局面，这是毛泽东没有料想到的。于是，他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工作。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

^① 中共仓山区委组织部、中共仓山区委办公室、福州市仓山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福州市仓山区组织史资料（1949年10月—1987年12月）》。

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据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抽调大批力量介入福建地方“文化大革命”，协助地方工作，维持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后的艰难局面。2月底，为制止仓山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以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武装部奉令派出人员进驻区委、区人委机关，并成立区人武部生产领导小组，由区人武部副部长曹明文任组长，下设农业、工交、街道、文教、卫生、财贸、组织、宣传、保卫、综合10个组，替代区委、区人委的全部职能，领导全区的革命和生产。

同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同月，福州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仓山区军管小组成立，取代区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的职能，直接介入全区“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且承担起支援全区工农业生产的任务。同时，区人武部生产领导小组下发通知，要求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做好春耕生产和各项工作，并强调指出，“对于原来造反派勒令靠边站的干部和党、团员，只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反坏分子，都要让他们工作”。这也保护了一批干部，其中许多干部参加了生产领导小组的工作。

被派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和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最复杂的情况下，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然而，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既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他们在“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错误，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而且，实行军管后，各造反派之间的严重分歧仍然没有消除，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及实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问题上，斗争激烈，矛盾复杂，最终武斗频发，且不断升级。

1967年，全区发生了多起武斗事件。1月底，区内各造反派组织因对1月26日福州市群众冲击福州军区的看法不同，逐步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区机关内形成以“市机联总”为首认为“糟得很”的反对派和以“朝阳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一司”为首认为“好得很”的赞成派。之后，区内群众组织又有分化组合，两派从大字报上互相攻击的“文斗”发展到“武斗”，严重破坏了全区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全年仓山区连续发生武斗和抢枪事件，伤者不计其数，死亡7人。特别是1967年夏秋，中央文革的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公开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后，导致全国武斗开始不断升级，仓山区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流血事件。7月，由上山下乡回城人员组成的“山鹰部队”在仓前桥头（观音井仓山银行办事处）开枪打死群众3人。8月13日，福清、闽侯县农民组织群众组织“五·二九”农民造反总司令部以抢救“八·二九”革命小将、彻底解决老区平反问题为借口，组织几千名农民进城，途经仓山区上藤路时遭到革造会工联总九分部的阻击。当进城队伍到达海关埕江边时，被对岸的台江区造反派组织枪杀3人，最终未能进城，被迫撤回。8月，城门还发生一起武斗事件，死亡2人、伤4人。9月，造反派组织冲击驻仓山烟台山的福州警备部队某营驻地，1名战士被流弹打死。这几个月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全区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二、建立“三结合”的朝阳区革命委员会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促进福建“大联合”、“三结合”，从1967年12月起，中央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1968年2月2日，在京的105个福建造反派组织代表达成《关于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予以确认，使福建武斗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紧接着从2月20日起的5个多月时间里，省军管会连续举办了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开展“革命大批判”，

“斗私批修”。仓山区人武部组织区内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了北京学习班和全省的学习班，并签订了有关实现大联合的协议。随后，举办原区直机关部分中层干部和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全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为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作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同年8月福建省、福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省革委会于9月11日批准仓山区更名为朝阳区，陆上4个街道办事处和52个居委会也都改名，其中，临江改名朝阳，仓前改名文革，下渡改名先锋，上渡改名红星，水上区未更名。19日，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区革委会由29名委员组成，由军队干部、机关干部、群众代表（包括“八二九”、革造会两大造反派群众组织）“三结合”。军队代表区人武部政委吴树坤任革委会主任，军队代表区人武部副部长曹明文、机关代表陈金堡、群众代表张为忠、赵锁金任革委会副主任。区革委会取代区委、区人委职能，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后又在这三大组内下设组织、宣传、外事等职能小组。革委会还内设党的核心组，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随后，全区各街道（公社）、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也实行“三结合”，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至1969年1月，全区实现了所谓“山河一片红”。

革委会尽管被认为是广大群众的“创举”，却不是经过群众代表选举产生的，而是在“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环境中出现的畸形产物。革委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取消了现代国家内部所必须的一些基本分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包揽党务、人大、行政、司法等各项工作。区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看是实行“三结合”，但实际上由军队干部主持，尽管做了大量工作，还是带来了消极影响。而参加进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则互相勾结或相互对立，使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然而，区革委会的成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局面，使得社会各项工作有可能有所恢复和继续展开。

第六章 “斗、批、改”运动 及纠“左”的努力

第一节 “斗、批、改”运动的开展

一、“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斗、批、改”^①的任务，最先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提出的。党的九大之前，毛泽东曾经提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②这表明“文化大革命”从“夺权”阶段进入了新的“斗、批、改”阶段。为了实现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毛泽东把“斗、批、改”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阶段，实际上要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以巩固这场革命的实际成果。随后，党的九大又作出了总体部署，“斗、批、改”运动便在前一段基础上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68年9月仓山区革委会成立后，便在福建师范学院组织召开约2万人参加的批斗所谓“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

^① 即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提出，“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② 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

其在省、市、区代理人的大会，拉开了全区“斗、批、改”运动的帷幕。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斗、批、改”运动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被认为就是为了建立一支纯洁有力的无产阶级队伍，为进一步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清理之初，其对象一方面是所谓“走资派”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另一方面则是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9月，福州市革委会同各大、中工厂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各农村公社、大队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宣队”）进驻仓山区内各大学、中学和小学以及基层单位，领导“斗、批、改”，开展“清队”运动。区革委会随之派机关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街道、企事业单位。红星街道先后分别举办了革委会成员、居委会干部、专政队员、居民群众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9期，近千人参加。全区组织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召开声讨会、批判会，开展以“三查”（即：一查没有改造好的和漏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二查叛徒、特务和混在广大革命群众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三查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惯犯等严重违法犯罪分子）为内容的“四忆、四查”活动（即：一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查幕后指使者和参加活动的人；二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查什么人干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三忆经济、生活的反常动向，查阶级敌人的活动情况；四忆来往人的疑点迹象，查阶级敌人的线索）。区革委会在居委会中建立班、排、连组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动居民群众大检举、大揭发，揪出所谓叛徒、特务等9种审查对象226人，以班、排为单位开各种批斗会500多场。

11月7日，区革委会在省农业干校举办“清队”学习班，约有150多人参加，包括原区委、区人委主要负责人。学习班开始时先忆苦思甜，开展大批判，揭发问题；后召开批斗大会，对这些干部进行批判、教育，有的干部还被拉去揪斗、游斗，施以肉体上的折

磨。在此次学习班上，先后有 38 人被扣上“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等罪名而受到重点审查。到 1969 年 3 月学习班结束时共定案 19 人，除 2 人犯经济案件外，其他 17 人都属扩大化的冤假错案。12 月，区革委会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各街道也相应成立“群众专政指挥组”，全区掀起了“清队”和实行“群众专政”的高潮。1969 年 3 月至 9 月，区革委会又在省农业干校举办“清队”学习班。区直机关干部 122 人参加了学习班，占机关干部总数的 91%。先后有 30 余人被扣上“特务”、“反革命”、“走资派”、“变节分子”等罪名，致使一批干部、群众蒙冤受屈。

同年 4 月党的九大召开后，区革委会作出《关于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决定》，要求各基层革命委员会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九大精神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组织 116 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街道宣传党的九大精神，在 4 个街道设 4 个固定宣传台。9 月以后，根据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指示，全区各单位陆续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2000 期，参加学习的达 15 万人次。朝阳街道举办了 78 期学习班，参加学习的达 9180 人次。

举办学习班，开展“清队”运动，带有强烈的左倾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挟嫌报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结果必然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些在解放后积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的同志，被诬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些为革命做出了历史贡献的同志，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特务分子”、“漏划地主、富农分子”；有些历史上曾经被俘、被捕，但经党组织多次审查已经作了结论的同志，被错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叛徒”；有些仅仅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是有海外港台关系，就被错误地当作“社会关系复杂”而没完没了地进行审查；有些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所抵触和不满，则被定为“恶毒攻击”、“现行反革命”，等等。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天下大乱”的背景下，在没有法治约束和党的有关政策被弃之不顾的背景下，极左的

“清队”运动造成了打击一大片的严重的后果。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于是，全国开展了一场“一打三反”运动，给“清队”以新的内容和推动，进一步延伸了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打击迫害。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根据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的精神，福建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这场运动中又走向了极端。2月，仓山区革委会着手在各单位全面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之初，由于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出现了集中面过宽的现象。有些单位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是先有概念，后有事实；有些单位则错误地认为“集中看管才有压力，才能促进他们交代问题”，用看管代替过细的思想和调查研究；少数单位出现逼、供、信和体罚、变相体罚等现象，甚至出现打人、抓错人等违反政策规定的问题。4月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着手狠抓落实政策的薄弱环节，逐步纠正和克服某些违反政策的现象。全区重点审查对象看管人数从4月份的464人降至5月底的246人，至7月5日确定为124人，其中属政治问题的35人，经济问题的73人，枪支弹药问题的5人，社会治安问题的11人。至7月，全区“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共有1411人受审查，揭露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181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678人，其中包括趁社会动乱进行贪污盗窃的刑事犯罪分子，总金额达54万多元，追回赃款赃物达13万元，收缴各种枪支筒22支，子弹1100多发。^①同时，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区共刊出大小批判专栏1000多期，召开各种形式的讲用

^① 中共福州市朝阳区革委会二号办：《朝阳区“一打三反”运动中执行政策、落实政策情况的初步检查报告》，1970年7月12日。

会、控诉会、批判会达 1500 多场,^① 有力地促进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的过程中,虽然也清理出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加上派性的干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盛行,党的正确审干方针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无情践踏,审查对象大都被当作阶级敌人遭受隔离、批斗、逼供信等非法手段,不少人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遭到打击报复,许多无辜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蒙冤受屈,身陷囹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对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二、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 年 5 月 7 日,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②,组织大批省直机关干部去干校下放劳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做法,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③ 此后,全国掀起了下放干部、大办“五七”干校的热潮。所有受审查、挨批判的干部,不论原来职务高低,统统限定时间离开原单位下乡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同年 12 月,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2 月 24 日,福建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动员干部、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到山区去的指示》,拉开了全省干

^① 《吴树坤同志代表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1 年 9 月 17 日。

^②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赞扬军队是“一个大学校”。“五七干校”是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③ 《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语,《人民日报》1968 年 10 月 5 日第 1 版。

部下放劳动及城镇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12月28日，朝阳区上山下乡支农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区革委会主任吴树坤任组长，区革委会副主任曹明文、陈金堡任副组长。下设区革委会上山下乡支农办公室，具体负责抓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各基层单位也相应成立了上山下乡支农小组。区革委会组织1195名宣传员参加的56个宣传队分赴街头小巷，挨家挨户进行宣传。1969年2月9日，仓山区首批102名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其中，3个民办中学学生75人，红星街道社会青年、城镇居民27人），^①奔赴闽北山区建西县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当月组织171名知识青年到建西、沙县农村插队落户。至年底，共有8155名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闽北山区安家落户。知识青年到农村后，有的当了小学教员，成为穷乡僻壤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了“赤脚医生”（即指农村不脱产的、“半农半医”的初级卫生人员），为缺医少药的农民解除病痛；有的立志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受农民爱戴的带头人。

但是，广大知识青年由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过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种困难，而且知青安置经费存在被贪污、挪用的现象，打击、迫害、强奸女知青的事时有发生。1970年大学、工厂开始招生、招工后，不少家长利用各种形式“走后门”使子女回城，某些主持其事的干部则依仗权力进行勒索。毛泽东在1973年4月25日给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老师、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中表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和一些违法违纪行为得到了及时解决和查处，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广大知青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

^① 福州市朝阳区革委会上山下乡支农办公室：《关于动员、组织本区首批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支农工作小结》，1969年3月20日。

解了矛盾。7月7日，仓山区革委会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传达贯彻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的有关精神，并派出336名干部深入基层调查，动员140名知识青年回山区。12月25日，朝阳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1975年4月5日，区革委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动员670人到闽侯、将乐、北峰等18个大队插队落户。同时，区内有48个单位在农村公社建立了知青点。至1978年底，全区共动员14748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9年1月，全区停止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

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中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和改变农村面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农村的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一些先进模范人物，而更多的人则以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地耕耘，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支持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当时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使大批知识青年在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国家人才生成的断层，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而且，为安置知识青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又因种种问题没有妥善安排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区革委会在动员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时，没有区别有无劳力，要求老弱病残一律上山下乡，给山区社队增加了包袱。根据福州市革委会的指示，动员全部闽江水上渔民410多人上山下乡，造成大批倒流告状，成了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区革委会于1969年10月至12月分三批将72名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至1972年才陆续调回。下放干部的主要任务有两条，即“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所谓“一面学习”，就是重点学习“阶级斗争课”，搞好“斗私批修”，继续进行“斗、批、改”；所谓“一面生产”是必修课，也是接受再教育的主要途径，实际就是参加纯粹的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自的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

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全区乃至全省的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同时，通过这种途径下放干部，并没有达到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实际在一些部门和单位变成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手段，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不良后果。

三、整党建党和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停止了正常的组织生活，亟须整顿和重建。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并强调指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在《指示》中，毛泽东作出一段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这被称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这次整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吐故纳新”。所谓“吐故”，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所谓“纳新”，就是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吸收入党。但在一些派性严重的单位，出现了“大吐大纳”、“造反入党”、“吐疏纳亲”等现象，其结果是一部分本来符合条件的党员却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被吸纳的新党员中则有一部分完全不符合条件，一部分造反派成员加入党组织，必然给党的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

在全国尚处于“大夺权”的混乱形势下，整党工作难以大规模展开。除个别地区和单位进行了试点外，不少地区和单位仅限于学习领会，酝酿试点，有的只做了初步工作。直至1969年4月党的九

^①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

大召开之后，各地才开始结合学习新党章，全面展开了“整党建党”运动。同年7月，朝阳区革委会部署在全区开展整建党运动。9月，结合整党建党运动，全区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出席代表524人。至年底，除划归市郊区的农业系统10个单位外，完成“清队”、整党任务的共有27个单位，“清队”审查对象828人；全区165名领导干部中已解放143人，有62名干部参加了“三结合”，全区陆续恢复了523名党员的组织生活，重建基层党支部60个。1970年4月，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中共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临时行使原区委的部分职权。核心小组由吴树坤任组长，陈金堡任副组长。同年，为配合开展整党建党运动，全区广泛开展了“四好”运动，坚持以“一好”带“三好”，推动各项工作，年终总评评出了“四好”连队22个（其中民兵“四好”连10个），先进集体17个，“四好”班、排624个（其中民兵“四好”班、排105个），“五好”个人9144名（其中“五好”民兵1915名）。^①

整党建党运动始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这一切实际上是北京“六厂二校”^②的经验。“六厂二校”是“斗、批、改”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抓的点，所谓的经验就是自上而下采取广泛吸收党内外群众参加评议的开门整党的方式。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学二批三吐四纳”：“一学”，主要学习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毛泽东整党建党学说和在“左”的理论指导下通过的九大新党章；“二批”，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各种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观点。“三吐”，即清洗那

^① 《吴树坤同志代表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1年9月17日。

^② “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些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不合格党员”出党；“四纳”，即吸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造反派”、“先进分子”入党，即所谓“吐故纳新”。通过整顿党组织，各级各单位都要建立新的领导机构，来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各项“斗、批、改”工作。

经过整党建党运动，至1971年9月区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前，全区有94%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吐故”占0.19%，“纳新”82人。经开门整党、“吐故纳新”，进一步提高了党员的觉悟，使党组织更加朝气蓬勃。同时，调整各级干部100名，充实和加强了152个单位和部门。全区区级以上干部已解放了93.3%，大多数参加了革命“三结合”和基层革委会的工作。^①

这次整党建党运动既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还产生了很多遗留问题。在思想上，它不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而是一次接受“左”的思想和理论灌输的活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发展的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争权夺利、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不可能得到解决；在组织上，它并没有使党组织成分更加纯洁、更加坚强，而是造成党内成分更为复杂，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党组织力量受到削弱。但通过整党建党运动，整顿、恢复、重建了党的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为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1971年9月17日至19日，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区机关礼堂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66名，列席代表74名。大会听取了吴树坤代表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区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一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广大党员

^① 吴树坤同志代表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1年9月17日。

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开展“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进行整党建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三是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大会还通过了《认真读书，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决议》，要求广泛深入开展一个“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形势和战备教育，继续深入开展批修整风，提高干部的思想和理论水平。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永发、方国春、叶汉婢、刘依梅（女）、朱华兴、朱荣义、陈一生、陈永财、陈忠勇、陈金堡、陈明斋、陈善源、陈锦云、张进宝、张济生、杨水才、邹本泰、吴树坤、郑寿桂、林金水、林恩全、俞玉英（女）、贺超（女）、高颜祥、隋文江共25人。9月20日，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朱荣义、陈忠勇、陈金堡、陈明斋、杨水才、吴树坤、隋文江共7人。^① 吴树坤任书记^②，陈忠勇、陈金堡任副书记。10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批复同意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届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从区委主要成员组成看，区委书记同时兼任区革委会主任，2名副书记同时是区革委会副主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区委下设政治组、生产组、办事组3个领导小组。从职能看，区委内未设办事机构，仍与区革委会合署办公。随后，全区基层148个应建的党支部普遍建立，并且增添了党的新鲜血液，有115名先进分子被吸收入党，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许多老党员中断多年的组织生活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整团建团工作也抓紧进行。全区共建立2个公社团委、161个团支部，占应

① 闽委〔1971〕综字116号：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福州市朝阳区委员会的批复》，1971年10月1日。

② 1975年3月22日，省委任命陈坚石为中共朝阳区委书记，免去吴树坤区委书记职务。

建支部的 77%。^① 这些对于遏制造反派势力，稳定全区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73 年 7 月，区革委会成员作出调整，“三结合”的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退出领导班子。福州军区、省革委会免去吴树坤的朝阳区革委会主任职务，任命陈明斋为朝阳区革委会主任。

第二节 被扭曲的国民经济建设 和纠“左”的努力

一、被扭曲的国民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被严重扭曲，工商业出现大滑坡，“以粮为纲”的贯彻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危害，其他社会建设事业也遭受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引起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不满。

工业方面，由于区属大多数企业因工人纷纷走向社会“闹革命”而几乎陷于瘫痪，再加上个体工商业被取缔，市场被撤销，连街道、居委会办的工场也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停办，1967 年至 1968 年，区属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1968 年 11 月，区革委会对原区人委有关各局（科、所）的业务组进行重建，隶属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同月，区革委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加强对生产业务的领导，使企业面貌有所改观。原区手工业管理局所属厂、社（除服装系统外）第四季度产值达 187.27 万元，比第三季度增长 51.06%，有些厂、社还进行了技术革新，试制新产品。如五金电器社试制成功 5 安培“单相电度表”，属省内首创，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同时，工业领域广泛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错误

^① 《中共朝阳区委 1971 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二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稿，1972 年 2 月。

观点，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搞好工作“转轨”，使区属工业和街道、社、队办工业有了很大发展。1969年4月，区革委会派出6个工作组，进驻区重点厂（社）开展企业整顿，帮助恢复遭破坏的生产秩序，遏制住工业负增长的趋势。但是，少数单位和不少厂、社中派性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仍未能得到很好地制止。8月28日和29日，区革委会两次召开千人大会，传达贯彻福州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的精神，通过开展大批判，加强领导班子。各单位揪出了破坏生产的人，整顿了劳动纪律，制定了生产制度和措施，克服了派性，促进了生产发展。1969年第四季度工业产值达300多万元，相当于全年工业总产值的30%。这一年全区工业总产值1045万元，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高值。

福州市革委会于1970年3月下放10家工厂归属区革委会之后，区革委会对区内工业进行了大调整，合并四塑、六塑、漆筷、水电、建材等11个厂（社）。同年，先锋（下渡）等街道的干部群众冲破禁令，恢复办起街、居工厂。先锋街道的经验得到区革委会的肯定和推广，从而促进了全区街道工业的兴起，既减轻了社会就业压力，又发展了生产。1970年，全区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手工业产品比1966年增长90%，产品质量也有所提高。1970年之后，全区实现综合利用85项，实现重大革新95项，小改小革112项。例如，盖山粮食复制品厂综合利用本厂产品的废渣、废水，生产“七〇二”农药和核苷酸等5种产品，年产值增加10万元，约占全厂总产值的2/3。区农械厂革新成功300吨冲床，提高工效1倍，节约用煤30%，又基本试制成功水稻联合收割机，为水稻耕作机械化作出贡献。冷作社革新边破机，提高工效20倍。蓄电池配件厂革新木隔板刨槽机，把已报废的刀片重新利用起来，节约资金近2万元。197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1480万元，比上年增长41.63%。1971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7%。1971年春之后，全区各条战线都开展了清仓查库，清出价值22万元的各种积压物资，清出废钢

铁 651 吨。^① 1971 年 1 月 6 日，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调整一批厂（社）体制和更改企业名称的通知》。原朝阳机械厂改名为福州市朝阳农业机械厂，原朝阳藤器社改名为福州市朝阳机器厂，原五金电器社改名为福州市朝阳机械仪表厂，原建筑三社改名为福州朝阳无线电修造厂，原朝阳机械厂木工钻部分划出成立福州市朝阳工具厂，原修车阀门社阀门部分改名福州市朝阳阀门社，将修车、修鞋、弹棉、刻印社合并成立福州市朝阳手工业服务社。

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要求各单位光明正大，不拉山头，反对自由主义搞小动作，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朝阳仪表厂原先两位领导成员各成一派，研究工作互找岔子，生产中一派干、一派歇。区委派出新任支部书记进厂后，不参与派性斗争，派性受到抵制，加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发展。朝阳化工社原先造反派当家，上下不齐心，企业历年亏损 8 万元。1971 年党支部成立后，带领广大职工打击歪风邪气，不但扭亏，还实现 4 项技术革新，提前完成年度计划。

商业方面，由于执行限制自由贸易、强化计划供给的政策，在三叉街、湾边、魁歧等水路要道设立检查站，严禁个体商贩从事城乡之间正常商品交易和物资交流，连销售小额数量的农产品也予以没收，并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在全区范围内封查国营、集体商业以外的贸易活动，一度造成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全区商业进一步萎缩，即使逢年过节，居民们也不得不排着长队，去购买统配物品。针对这种状况，商业部门积极贯彻为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方针，创办了综合服务部、服务站，为方便群众设立了近 200 个服务点和代售点。建新综合服务部建立后，经常主动深入社、队，访问调查，又购又销，又修补又加工，深受群众欢迎，被称为“备战夺粮的好后勤部”。全区 1970 年财税征收总

^① 《吴树坤同志代表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1 年 9 月 17 日。

额比 1969 年增长 15%。^①

农业方面，批判了“以钱为纲”、“重副轻农”以及“因循守旧”的错误思想，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农业八字宪法”。在“农业学大寨”^②的号召和激励下，仓山区社、队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表现出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决心。1969 年 11 月，全区开始兴修水利，大搞平整边角地，填平死水塘、盲肠河，开山造田、围垦沙洲的群众运动。12 月，区革委会发动群众开荒种粮、种菜养猪。至年底，开荒 73.1 亩，养猪 252 头。同月，盖山公社浦口大队发动群众战天斗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广大社员早出晚归，自带干粮，奋斗三年完成冠产洲、万兜洲、门前洲围垦任务。至 1972 年 2 月共投入人力 20 多万工，运石船 30 艘，围洲造田 2200 亩。1970 年 3 月，区革委会决定成立农林水组，负责指导原郊区划归仓山的 3 个镇农业、水利、畜牧、水产、蔬菜等生产。1970 年底 1971 年初，贫下中农和干部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狠抓增产措施落实，使 1971 年早稻总产量比前一年增产 11.8%，全区早稻平均亩产跨《纲要》；生猪存栏同比增长 73%。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1970 年粮食总产量达 7700 多万斤，比上年增长近一倍，扭转了 1969 年全区农村要吃国家回销商品粮 1300 多万斤的状况，基本实现了自给。1971 年还向国家献售余粮 460 多

^① 《吴树坤同志代表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1 年 9 月 17 日。

^②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先自然条件很差，土地贫瘠，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大寨干部群众以改造耕地为中心，经过艰苦努力，使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成为山区建设的一个先进典型。为此，毛泽东于 1964 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当时大寨的基本经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农业生产把学大寨作为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标志之一，在城镇、农村、公路两旁、山野田间，“农业学大寨”的巨幅标语随处可见。

万斤，卖油菜 17 万斤，实现了粮、油自给有余，创历史最高纪录。^① 到 1972 年 6 月，全区扩大耕地面积 5000 多亩，水稻种植面积从 3.8 万多亩扩大到 5.4 万多亩，建立稳定高产田 4.8 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增长。此外，蔬菜、畜牧、水果和集体副业也有所发展。

文教方面，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被批判，建国 17 年来的教育成果被否定，陈雪菲等一批工作成绩显著的专家学者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对象，知识分子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红卫兵和其它造反派在全社会进行破“四旧”，被单位和个人珍藏的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物品遭焚毁，不少文物古迹被破坏，连区机关档案也未能幸免。文化、教育机构瘫痪，学校停课，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停止，代之而起的是“红海洋”，到处可见红色的旗帜、标语、臂章、语录本；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个人崇拜极盛一时。1969 年，随着社会混乱局面的逐步扭转，学校复课，但学制缩短，且因轻视知识和教师，教学质量普遍较差。同年，区内大、中专院校被撤销。1971 年之后，区革委会着手整顿教育工作，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同时，相继成立文化、体育管理机构，组织较大规模的群众性歌咏比赛、文艺汇演，恢复小学生运动会和区体育运动会。此外，文教部门为方便工农子女入学，在农村增设了分校和初、高中班，使全区小学和初级中学教育基本普及。医疗卫生部门深入群众普遍进行了各种预防接种和“三虫”检查，整个郊区和部分街道实现了合作医疗。并培养不脱产“赤脚医生”和不脱产卫生员近千名，大力采集青草药、办土药房（场）、土法制药剂，逐步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

^① 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1972 年 6 月 23 日。

二、纠正极左错误的努力及受挫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外逃叛国，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按照中央的布置，全国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10月30日，朝阳区委召开基层党委、支部负责人会议，认真学习中央陆续发出的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并确定以红星街道、农械厂、北园大队、红卫兵小学为传达试点单位。省军区和市、区委组织56名党员干部下基层帮助传达。11月1日，区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全面的传达，之后在全区层层传达。到7日止，全区151个支部有88个支部（郊区30个，城区全部）、53699人听到了传达。^①12月9日至13日，机关干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其做法与成果：一是大摆大揭不正之风，揭发无政府主义、搞山头、闹派性等不正之风。共揭发出搞山头主义、闹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骄傲自满、讲假话、走非组织路线、好人主义等11个方面、共400多条意见；二是斗私批修，自觉革命，做到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三是进行整改，对存在问题边整边改。12月中旬以后，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后，区委均组织进行传达和批判，批判内容主要抓住林陈反党集团阴谋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唯心史观、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反革命两面派的行为等要害问题，并注重把传达学习与开展革命大批判、与进行回忆对比、与落实政策、与落实行动相结合，推动“批林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1972

^① 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朝阳区传达中央68号文件简报》，1971年11月8日。

年5月5日，区委根据福州市委对市、区两级机关进行整风的部署，在区机关开展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个基本原则，并联系实际，围绕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团结和加强组织纪律等三个方面整顿领导和机关作风。9月2日，区委发出《关于传达中央12个文件的具体安排意见》，决定从9月7日开始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中央文件，全面开展以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为内容的“批林整风”运动，并要求各级党委（支部）把“批林整风”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加强领导，切实抓紧、抓细、抓好，城区在9月20日左右、农村在9月25日前完成传达任务。1973年9月18日至22日，区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提出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通过传达、讨论和揭发，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认清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性质及其危害，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并抑制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增强了工作和生产积极性。

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从事阴谋活动的，因此，“批林整风”运动也自然集中在批判极左思潮上，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动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工业方面，全区广大职工遵照“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精神，大力支援农业，有11个厂、社全部或部分“转轨”，发展了小农具、小农药的生产。1972年，区革委会进一步整顿工厂生产秩序，加强企业管理，并组织干部、职工、技术员三结合攻关小组，大力开发农用机械和电子电器产品，有3项产品填补省内空白，工业产值和利润稳步回升。1973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利润分别比1971年增长26.4%和37.3%。1974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243.7万元，比上年增长17.5%。

农业方面，1971年底，全区“农业学大寨”运动投入劳力50万工，兴修水利44处，开山造田1100多亩，扩种双季稻5000多

亩，粮食总产量 8543 万斤，卖余粮 591 万斤，达到全区粮食自给，全区 520 个核算单位中有 85.6% 实现增产增收增分配。1972 年 6 月 23 日，区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区下定决心，艰苦奋斗，为实现大寨式区而努力奋斗。在减少粮食面积 800 亩种蔬菜的情况下，全年粮食总产量仍达 8260 万斤，比 1965 年增加了 2764 万斤。全区农村卖余粮 720 多万斤，超额完成 26 万斤。全区经济作物也有所发展，常年菜园面积达 3500 亩，基本做到均衡上市。^① 随后，农业生产出现反复。1974 年，农业生产又有所发展，粮食总产量 7554 万斤，比上年增长 11%。同时，发展了多种经营，蔬菜生产经过调整布局实现相应集中，逐步扩建了蔬菜生产基地，全年上市量达 33 万担，比上年 17.5%。^②

文化教育方面，1972 年 6 月 10 日至 14 日，区革委会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省、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区“复课闹革命”以来的教育工作情况，并对各级党委（支部）如何加强对教育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问题进行认真讨论，统一认识。区委决定，由区委常委隋文江分工抓全区教育工作；各公社党委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第一把手要管，应分工负责同志抓教育，并配好专职教育干部 1—2 人；城郊小学按公社建立党、团支部，按校或片成立党团小组，城区小学成立党总支，并按街道划片成立党支部，加强党对学校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校革委会（革领组）由学校干部、教师、工人、贫下中农代表 5—7 人组成，城郊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由公社党委审查，报区革委会政治组批准。

区委成立后，在纠正极左思潮的同时，还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至 1971 年底，共解放领导干部达 98% 以上，恢复组织生

① 《中共朝阳区委 1972 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二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稿，1972 年 1 月 15 日。

② 吴树坤同志代表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1 年 9 月 17 日。

活的党员达 97%，培养一批新生力量充实到 26 个基层党组织，使党支部更加朝气蓬勃，并调整 45 名骨干充实 43 个支部，充实和加强区革委会机关和街道办事处机构。^① 1972 年，根据工作需要和德才兼备方针，调整一批干部到适当领导工作岗位上，解放和使用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并且分别安排了非在职的宣传队干部和下放干部等近 200 名到区机关和基层单位，担负一定的工作。1973 年，区委又调整安排了一批本区干部和下放干部，调整使用了有技术专长的干部，加强了定案复查审批，对定性和监督处理的事件，特别是对申诉案件进行了复查处理。复查中对老案重定、纲上太高、处理偏严、依据不足或材料不实等都作了纠正。这些干部到新工作岗位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毛泽东在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错误的同时，却仍然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断定林彪集团是极右，提出批林仍然要反对极右；并错误地认为这样的运动以后还要多次进行。于是，江青等人在全国大反特反所谓“右倾回潮”，使批“左”成为禁区，造成“左”倾错误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反而继续发展。1974 年 1 月，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认为批孔可以从思想上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但更主要的是想借宣传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集团乘机另搞一套，借“批林批孔”运动大作文章，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煽动全国掀起揪斗老干部的恶风。结果，“批林批孔”运动使九一三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再度出现混乱。

根据省委提出的要纠正不认真、不严肃、不理解、不得力状况的指示精神，区委把“批林批孔”运动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与认真纠正“走后门”、搞特殊化和向传统决裂联系起来，把矛头对准

^① 《中共朝阳区委 1971 年工作总结报告》，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二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稿，1972 年 2 月。

林彪孔孟之道。区委从政治组、办事组抽调 8 名干部组成区批林批孔办公室，区委副书记陈明斋任主任，具体负责部署开展全区“批林批孔”运动。一是积极训练骨干。2 月 4 日，召开区、公社、街道全体干部、民警和区属工厂支部书记等千人会议，宣读、讲解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精神，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后又集中训练基层支部、单位的宣讲员 170 人。二是层层召开动员大会。2 月 8 日，召开全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狠批“孔孟之道”、“三字经”、“千字文”、“天才论”等，基层党委、总支、支部和革委会、革领组负责人，工、农、青、妇群众组织负责人，民兵排以上干部、生产队长，以及全体机关干部、民警和中小学教员，共 6000 人参加。随后两天，全区各地召开动员、批判大会 92 场，到会人数达 4 万余人。三是认真抓试点工作。区委直接抓好郊区建新公社红塘大队、城区朝阳塑料厂的试点，并选派 2 名干部到城门公社店前大队配合省委抓好试点。公社党委、街道支部也抽调 35 名干部下基层抓试点。^①

“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时，全区有些单位部分人员准备跨行业搞串连，组织战斗队，但区委领导思想认识一致，不仅没有一位常委卷入派性活动，而且区委主要领导还亲自找原想搞串连、拉山头的人谈心，给予正确的引导。3 月 6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中央 9 号文件”，对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彻底揭开福州地区“批林批孔”斗争的盖子，并要求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召开联席会议（简称“四联会”），对前段“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所谓错误作出检查。此后，一个“彻底揭开福州地区批林批孔斗争盖子”的运动在全省展开了，一开始主要是检查批判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所犯的“错误”，后由于“四人帮”的直接干预，转向集中批判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韩先楚。5 月后，全省

^① 中共朝阳区委批林批孔办公室：《批林批孔简报》第 1 期，1974 年 2 月 10 日。

“批林批孔”运动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在深入揭发的基础上，开始把“学、揭、批”结合起来，着重学习中央、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文件，学习儒法斗争的历史，批判儒家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批判林彪效法儒家“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不少党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又因所谓“复辟回潮”、“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再次受到冲击。10月18日至20日，朝阳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精神，区委书记吴树坤在会上讲话，对全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作了总结。此后，“批林批孔”运动虽然仍继续了一段时间。

第七章 1975 年整顿与 “四人帮”帮派势力的覆灭

第一节 1975 年整顿

一、批派性和落实政策工作的起步

1975 年 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7 月，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两项决策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而且坚定地提出进行整顿的要求，并以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为突破口，对国民经济和各方面工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文化大革命”中，福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被严重践踏，众多靠造反起家的人在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企事业单位攫取了重要权力，这些人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争权夺利者混杂在一起，闹派性，打派仗，派性势力根深蒂固，派性关系盘根错节，致使各级领导班子很不团结，普遍存在“软、懒、散”的现象。因此，整顿班子中的派性，调整领导班子，成为福建 1975 年整顿的重点。

朝阳区委通过恢复、调整机构来实现调整领导班子的目的。1975 年 4 月，朝阳区委、区革委会工作机构进行了整顿，恢复区委办公室，与区革委会办公室合署办公。撤销区革委会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其下辖的各组、局、办分别划为区委、区革委会的工作机构。政工组组织组改为区委组织组，政工组宣传组改为区委宣

传组，政工组统战组改为区革委会统战组。另外，设立农林水办公室、工交办公室、供销社、科委等。新调整的机构取消了原来“三结合”的班子，重新任免了干部。同时，根据省委关于反派性的部署，区委对“有派性而未脱钩断线的人”进行了排队。广大干部群众对派性长期作乱虽极为不满，却对反派性心有余悸，“最怕派性在上级有人支持，后台硬”，担心派性分子反攻倒算。省委认定“反派性是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要求各级党委坚决反右倾、抓重点，克服“恐派病”，对派性“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之后，区委于5月分别举办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学习班，集中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查摆派性具体表现，揭发派性的危害性。并强调指出，只要与派性彻底脱钩，不再搞派性，就既往不咎；对于执行错误路线的一般分子，改了就好；对于坚持不改，继续搞派性的，就严肃处理。当时送学习班、党校学习，名为“学习”，实际上是先行回避，发动群众，开展背靠背的检举揭发；然后，再逐个叫回去，进行面对面的揭批。8月26日，区委、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当前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强调要求：贯彻执行安定团结的方针，坚决清除资产阶级派性；抓革命，促生产，把生产搞上去，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9月4日至10月19日，区委举办区机关干部“学理论，抓路线，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学习班，机关干部118人参加，占机关干部总数的50%，其中党员83人，团员6人，小组长以上33人，基层单位3人。^①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坚持正面教育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把学习、揭摆和批判贯穿全过程，做到“三边”（边学、边揭、边批）、“三抓”（抓要害穷追猛攻、抓火候重点突破、抓苗头因势利导）、“四结合”（群众性自我教育和重点帮促相结合、面对面思想交锋和个别谈心启发相结合、小组揭摆

^① 福州市朝阳区机关干部理论学习班领导组：《朝阳区机关干部理论学习班总结报告》，1975年10月16日。

和大会揭批相结合、一般性问题正面教育和严重问题专案审查相结合)、“四批”(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阶级派性)、“五大讲”(讲路线、党性、大局、团结、纪律)。通过一个多月的学、揭、批,使广大干部认清了派性的危害性,并基本上弄清了区机关干部参与派性活动的组织和人员的情况。10月25日至12月4日,区委又举办第二期干部“学理论,抓路线,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学习班。共有200人参加,其中基层党支委以下62人,机关干部49人,基层骨干、知情者32人,公安干警57人。^①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促进领导班子和公安队伍革命化的群众性自我教育。

经过批派性斗争,打击了派性头头的嚣张气焰,掌握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中的派性状况。随着反派性斗争的深入,对派性采取的措施,从办学习班、送党校学习,发展到下放蹲点、交流调离、停职检查,乃至组织处分。除对极个别派性头头采取停职检查和组织处分外,比较多或比较普遍的是采取下放蹲点和交流调离两种措施。在此基础上,区委直接对班子中的派性分子采取措施,并调整了区社及部门的领导班子,重新启用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

批派性和整顿领导班子,沉重地打击了派性,使一些“靠边站”的老干部重新恢复工作,成了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处境尽管仍然很不好,但许多人都尽其所能,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在艰难中前行作出自己的努力。同时,通过整顿,初步建立较为健全的领导班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带来的恶劣影响,也为粉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奠定了组织基础。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批派性和

^① 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第二期干部理论学习班总结讲稿》,1975年12月。

整顿领导班子过程中也存在着以派性反派性、以派性整顿班子等现象。

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的，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在内的广大干部的案件进行复查，初步落实党的政策，是1975年整顿的另一项重点工作。2月，福建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应对“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中被错整的人落实政策。要求对未作结论的案件，应迅速根据事实材料，做好结案处理；对已经处理的案件，凡属结论不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定性错误的，都应予以改正或纠正；对历史关节问题，除确是叛徒外，未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应维持“文化大革命”前的结论，不作重新处理。根据《通知》精神，朝阳区委抽调干部建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并于4月23日召开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市委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精神，着手部署落实政策工作。到年底，共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清队”、“一打三反”、“清查5·16”等各种问题108人，变动结论的有36人。此外，区委于6月起，着手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城镇居民回城政策，复查各厂、校的审查对象。12月，区委着手落实“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和随迁农村的10名小学代课教师政策，全部收回转正定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阶段的落实政策工作只是初步的，有很大的局限性。许多被颠倒了的重大的是非问题仍无法纠正过来，只能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对个别典型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平反，而大多数的冤假错案根本得不到复查，虽复查了也有不少案件得不到平反，虽平反了也很少是彻底平反的，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尾巴，以致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对这些案件进行重新复查平反。然而，在当时那么困难的形势下，通过落实政策解放平反一批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而且，通过反对派性、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党的政策，党的领导得到了加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重新调动，全区形势趋向好转。

二、整顿工业企业

根据毛泽东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发出了《批转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全力推进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朝阳区委重点整顿全区工业企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抓生产的力度，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采取实际步骤和措施，推动工业生产的发展。1975 年初，区委派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 14 个厂（社）、3 个院（所）和 2 个街道进行企业和领导班子整顿工作，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促进经济建设。3 月，成立朝阳无线绝缘材料厂（由朝阳印刷厂的一个车间单独划出）。4 月，区委、区革委会召开办公会议，研究中洲仪表工厂单位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听取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和下一步打算。

6 月，省委提出全省工业企业整顿的具体措施：一要坚决消除企业领导班子中的派性，调整充实企业的领导班子；二要落实企业干部政策和老工人、老技术员政策；三要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在 6 月底 7 月初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上，省委再次强调要求改变企业班子中的“软”、“懒”、“散”现象，按照中央精神，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扎扎实实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坚决克服不敢抓管理、不敢抓规章制度的错误思想，纠正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的现象，迅速改变质量低、消耗高、事故多的严重情况。同时，要求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朝阳无线电修造厂的整顿工作取得成效，于 11 月试制成功了 BDT—10 超声波探伤仪，为省内首创，经石油部鉴定通过，于 1976 年正式投产。经过企业整顿，1975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 2521.26 万元，比上

年增长 13%，产品品种增加，质量有所提高。^①

12 月 12 日，区委提出《关于整顿企业的意见》，并抽调 110 名干部、积极分子组成 17 个企业整顿工作组，分赴 17 个厂、社开展整顿工作，^② 逐步把全区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推动全区国民经济搞上去。整顿工作重点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整顿好企业领导班子。主要是整顿企业党支部、革委会（革领组）的班子，对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及车间负责人结合进行整顿。从搞好领导班子整风入手，重点开展思想整顿，清除领导班子中的资产阶级派性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把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二把手配备好，并注意充实新生力量，把那些经过实践考验，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做出成绩的优秀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倾向。二是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考勤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等七项制度，坚持质量第一，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产量指标，品种指标，质量指标，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消耗指标，劳动生产率指标，成本指标，利润指标，流动资金占用指标）。三是搞好设备维修。组织力量进行安全、设备大检查，尤其对那些高级、大型、关键设备进行了突击抢修，使设备完好率在年内达到了国家规定标准；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和爱护设备的教育，从设备管理、使用、维护、检修等方面，把设备专责制建立起来，并对设备建立档案资料，做到人人爱护设备、台台设备有人负责；对新工人进行技术培训，要求操作能力符合要求后才能上台操作。

1975 年的企业整顿，有力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

^① 《陈坚石同志在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8 年 4 月 19 日。

^② 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关于整顿企业的意见》，1975 年 12 月 12 日。

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推动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 “四人帮”帮派势力的覆灭

一、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不断深化，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左”的政策，并逐渐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否定，因而既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其大部分工作，并错误发动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再加上“四人帮”的直接插手，使福建再度陷入混乱。靠造反起家的省委常委陈佳忠为首的“四人帮”在福建帮派势力，在企图改组省委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在地、县煽动夺权斗争，致使部分地方党委被夺权，一批坚决执行整顿的领导干部遭到打击，整顿时进入党政领导班子的许多干部纷纷被批斗或打倒，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派性重新泛滥。“四人帮”在朝阳区的帮派势力也错估形势，蠢蠢欲动，上窜下跳，惟恐天下不乱，竟不择手段地造谣言，放暗箭，四面出击，八方发难，否定毛泽东、党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否定全区1975年整顿工作的成绩。他们按照“四人帮”的腔调，攻击批派性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是“矛头向下”、“整群众”；胡说批派性是“镇压造反派”；胡说整顿领导班子是“排挤、打击新生力量”；攻击区委领导是“走资派”、“还乡团”；攻击整顿企业搞生产是“搞唯生产力论”、“搞管卡压”。他们制造混乱，刮起“层层揪”的妖风，逼区委领导“表态”、“转弯子”，逼区委召开所谓的“座谈会”，闹得区机关和干部群众不得安

宁，各项工作都受到严重损失。“四人帮”帮派体系在朝阳区的骨干分子还积极投靠“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妄图“搞垮省委，闹乱福州，乱中夺权”。他们积极参与围攻、揪斗省委主要领导，冲击围斗市委负责人，还插手外地，到处开黑会，作黑报告，告黑状，为篡党夺权做了充分的表演。

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的“批邓”之风，把全区搞得乌烟瘴气，是非颠倒，许多人被点名批判，尤其是积极推进整顿工作的领导人，几乎无一幸免。“四人帮”帮派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捣乱活动，使刚刚经过整顿的各级领导班子大多再次陷于瘫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破坏，各项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同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做制度的主人，不做制度的奴隶”等“左”倾思潮再度泛滥，全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被搞乱，社会出现动荡，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工业企业的生产秩序遭破坏，工业生产出现滑坡。197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只完成年度计划的86%，比上年下降6%，^①是1970年代中唯一的负增长的年份。然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理所当然受到了全区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

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经过近10年的内乱，广大干部群众在认识上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已大不相同，党心、军心、民心向往安定团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人们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做法，更加看清江青集团祸国殃民的面目。就在这一时刻，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不幸于1976年1月8日辞别人世。全国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纷纷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噩耗传来，朝阳区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声讨江青集团，但却遭到“四人帮”

^① 《陈坚石同志在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8年4月19日。

及其帮派势力的无理压制。“四人帮”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坚决反抗，并终于在 4 月 5 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中全部迸发出来，形成全国范围的强大抗议浪潮，显示出人民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支持。这场群众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却教育和鼓舞了全党同志，使人们更加认清了江青集团的反党面目及其本质。

1976 年下半年，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喧嚣正盛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几件大事进一步加剧了全国的动荡。7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朱德逝世；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里氏 7.8 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 11 度，造成 24.2 万多人死亡，16.4 万多人受重伤；9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悲伤痛苦和忧虑之中，江青集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10 月 6 日，党中央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14 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各族人民欣喜若狂，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消息传到福建，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10 月 19 日，区委向全区干部群众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23 日，全区工人、学生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到 11 月 15 日，全区共召开群众庆祝大会 762 场，声讨“四人帮”大会 197 场，有 7 万多人次上街游行。人们载歌载舞，开怀畅饮，烟花爆竹销售一空。全区还培训 800 多人理论骨干，传达中共中央文件，为群众解说“四人帮”的罪证材料。

粉碎“四人帮”集团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作为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给全党留下深刻的教训，从反面为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文化大革

命”的经验教训深刻教育我们，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彻底摒弃“左”倾错误理论，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采用正确的思想教育方法；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加强党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一个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党。

第四编

在徘徊中前进和 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1976 年 10 月—1978 年 12 月)

第八章 拨乱反正工作的局部进展

第一节 开展“一批二打三整顿”工作

一、揭批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为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中共福建省委结合中央下发的《关于印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三批材料，联系“四人帮”插手福建的实际，在全省范围内发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1976年12月12日，省委转发《罪证材料之一》，部署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行，揭批斗争进入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一是继续揭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结帮营私，结帮篡党；二是彻底揭查他们分裂干部队伍，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罪行；三是彻底揭查他们全盘否定1975年的工作，诬蔑大好形势，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当月，中共朝阳区委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材料组，并召开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开展全区的揭批工作。同时，区委深入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在全区范围内着手清查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有牵连的人和事。1977年元旦后，区委举办机关干部、基层支部负责人、政工干部共250人参加的学习班，集中传达、讲解《罪证材料之一》，后又分头到厂、社、街道、学校、医院向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传达和讲解。至1月11日，全区共召

开群众性的传达、讲解会 172 场、31890 人次。^① 区委书记陈坚石带领部分干部参加福州市委举办的清查学习班，着重清查“四人帮”在朝阳区的骨干分子的罪行。

3 月 17 日，省委转发《罪证材料之二》，揭批斗争转入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4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前一段揭批斗争经验；并确定在夏收大忙之前对县以上各级单位采取“四集中”的办法，即集中领导力量，集中重点清查对象，集中主要问题，集中时间，举办学习班，上下内外配合，协同作战，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揭批斗争。会后，全区各系统、各单位从 15 日开始传达和宣讲《罪证材料之二》，进一步开展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至 4 月 29 日，共召开大会 158 场，到会人数 30403 人次，占应到人数的 90%。^② 5 月 28 日，区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关于对参加“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进行审查的工作。8 月，区委先后举办多期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 119 人，重点审查对象有 24 人，并对积极参加“四人帮”帮派组织活动的有关人员和造反派进行隔离审查和停职检查。

10 月 27 日，省委转发《材料之三》，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把揭批“四人帮”运动引向第三阶段。根据省、市委的指示，朝阳区委随即发出《关于全面开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打击反革命、打击资本主义势力、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意见》，要求全区各系统、各单位党组织在加速抓紧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把领导重心逐步转

① 《传达中共中央〔1976〕24 号文件的情况反映》，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办公室《工作简报》1977 年第 1 期。

② 《传达中共中央〔1977〕10 号文件的情况反映》，中共福州市朝阳区委办公室《工作简报》1977 年第 4 期。

移到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揭批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把他们颠倒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同时，大力打击反革命，打击贪污犯罪活动，集中力量打一场总体战，促进工业生产和各项工作。

通过开展揭批查斗争，区委基本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到1978年4月，全区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有牵连的人和事122人，已基本查清的有112人，占91.8%，绝大部分人员都检查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全区属于清查对象的25人，已查清和基本查清的21人，其中逮捕5人。^①根据省委关于“认真贯彻既要严肃，又要慎重的方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以及定案结论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②的指示精神，区委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三种人分别作出了处理。第一种是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其中，对一小部分不肯改悔的，予以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放到群众中监督改造直至依法判刑；对那些罪行严重，但能同“四人帮”划清界限，确愿悔改的，予以从宽处理，一般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使他们在劳动和工作中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对有些虽有罪行，但能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并揭发“四人帮”亲信的罪行，有真诚悔改表现的，不划为骨干分子，保留党籍，给予一定的党纪或行政处分，但不能留在要害部门和领导班子内。第二种是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一些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对他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第三种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犯了错误的人，包括

^① 《陈坚石同志在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8年4月19日。

^②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清查工作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78年4月7日。

犯严重错误的人。对他们主要是把问题讲清楚，提高认识，接受教训，改了就好。至1978年底，全区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揭批查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它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澄清和纠正了被颠倒的思想、路线、理论是非，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强了团结，全区工作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它调整和充实了区委和区革委会各部门和一部分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本着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发展了新党员，党的领导逐步加强，党的力量逐步壮大。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受审查的人员进行了复查，对定性偏高、处理偏严的重新做了结论和安排，党的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所造成的恶果正在逐步清除。然而，由于刚刚粉碎“四人帮”，20多年来党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影响还来不及系统地清理，派性尚未消除，在揭批查斗争中出现打击面稍宽、处理稍重等偏差。

二、开展“双打”斗争

鉴于粉碎“四人帮”后，福建的帮派势力盘根错节，派性没有完全消除，社会局势仍处于动荡之中，福建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场“一批双打”斗争（即，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并要求各级党委把“双打”斗争同清查工作结合起来，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粉碎“四人帮”在福建的帮派体系。“双打”斗争打击的重点是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级敌人以及大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1976年12月，省委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恶毒攻击党中央、无耻吹捧“四人帮”的反革命案件和打砸抢案件列为重点，给予坚决有力的打击。根据省、市委的指示，朝阳区委结合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行了“双打”斗争，但这一阶段全区“双打”斗争还不够深入，发展也不平衡。

随后，根据中央的部署，省委采取集中打击的办法，于1977年4月之后开展了三次全省性清查打击流窜犯的统一行动，以铁路沿

线、沿海港口码头、闽江沿岸和公路交通干线的城镇、站点等为重点，进行打击活动。区委积极配合开展了打击流窜犯的统一行动，并围绕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和省、市铁路治安工作会议精神，对城市治安进行了整顿。8月，根据省、市委扩大会议精神，区委结合清查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由点到面开展一场“双打”斗争，将区属工交、建工、房管和街道等系统的20个厂、社作为第一批单位，进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9月，省委决定在夏收大忙之后，在全省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打击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活动。10月10日至11日，区委召开动员大会，传达贯彻福州市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在全区全面开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打击反革命、打击资本主义势力、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至年底，全区共召开揭批大会117场，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704人。他们有的内外勾结，盗窃国家资材；有的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有的城乡串通，投机倒把；有的巧立名目，设施勒索；有的搞私招乱雇，地下包工等等。1978年3月7日，区委又抽调26名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仓山公社的联建、湖边、先农3个大队开展“一批双打”斗争。

为加强对“一批双打”斗争的领导，区委于4月26日调整充实揭批“四人帮”和“双打”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申喜盛任组长，林恩全、高荣生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林恩全兼任主任。此后，区委确定“双打”斗争的重点是打击那些进行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打击那些打砸抢者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中最猖獗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并实行城乡、内外、上下全面动员，紧密配合，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双打”斗争的新高潮。抓住重点单位、重点案件、重点问题，把那些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统统揭露出来。对前段“双打”斗争进行分析，对单位进行排队，对正在开展“双打”斗争的单位，进行再动员、再发动，深入进行忆疑点，摆问题，揭矛盾，内查外调，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把运动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对问题多、运动还未开展起来的

单位，派进工作队，结合企业整顿，把“双打”运动开展起来。对已暴露的对象，组织力量，抓紧审查清楚，已落实的经济问题抓紧追赃退赔。10月20日至23日，区委召开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与会的有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基层单位第一、二把手、驻单位工作队正副队长，共210人。会议传达贯彻市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部署在全区开展“一批双打”斗争，要求以整风的精神，进一步狠抓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把“双打”斗争迅速推向新的高潮。经过“双打”斗争，至1978年底，全区共破获各类案件201起，打击处理各种犯罪分子400人，查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164人，作案总金额93906元，退赃27723元，^①有力地促进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

全区的“一批双打”斗争至1979年10月基本结束。期间，全区174个单位参加了这场运动，共成立64个领导小组，配备422名专案人员。共召开职工群众动员大会139场，参加3.7万人次；召开群众职工座谈会、讨论会2137场，参加18万人次；召开批判大会364场，参加3.6万人次。经过两年多深入细致的调查落实，全区共暴露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大小案件的线索1151条，涉及418人，非法金额达13万余元。经内查外调落实的有273人，占67%。其中，5000元以上5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25人，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17人，300元以下224人。对于结案的对象，根据情节轻重和态度好坏，也分别进行了处理。逮捕17人，送劳动教育改造11人，开除党籍1人，留党察看1人，记大过2人，记过1人，免于刑事处理43人，免于处理195人。^②

“双打”斗争的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包括一些“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在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极大地动摇并摧毁了“四人帮”

^① 《陈坚石同志在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8年4月19日。

^②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一批双打”运动总结》，1979年10月。

在朝阳区帮派体系的社会基础，强化了社会治安，维护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安定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全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在“双打”过程中，有些正常的经商贩运被当作投机倒把行为遭到打击，有些案件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够确凿、定性不够准确，产生了不良后果。

三、开展整顿工作

揭批查斗争的不断深入，也暴露出全区各级领导班子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干部不纯和“软、散、懒”等现象，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农村社队及工商企业经营管理混乱，漏洞较多，经济不清、财务不明的情况较为严重；弄虚作假，谎报成绩，主观臆断，瞎指挥等不良风气盛行，干部贪赃枉法，大吃大喝，侵吞和挥霍国家、集体资财等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这给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干部队伍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对全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朝阳区委根据省、市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结合揭批“四人帮”和“双打”斗争，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整顿工作，着重整顿领导班子，整顿工作作风，整顿经营管理。

首先，区委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采取既坚决又慎重的态度，清除“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注重配好一、二把手。至1978年6月底前，着重整顿配备好区委各部、委、办，区革委会各科、局、委、办，各街道和1978年建成大庆式企业或学大庆先进企业的单位的领导班子；至1978年底，着重整顿配备好各工厂企业、学校、医院、居委的领导班子。在整顿中，区委采取历史的、全面的态度，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排除派性干扰，较好地贯彻“老中青三结合”和党管干部等原则，有意识地提拔一批业务能力强、富有朝气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对于在“四人帮”横行时敢顶敢斗，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作风正派、能团结人的；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在各个

工作岗位上经过斗争实践证明有朝气、有干劲、有能力的，大胆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而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和卖身投靠“四人帮”的，野心勃勃、政治品质恶劣、作风很坏的，则坚决清除出领导班子。对于存在“软、懒、散”现象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加强。经过整顿和调整，各单位、各部门建立起执行党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一致，敢于负责，得到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领导班子。

同时，区委通过开展小整风运动，加强对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区委率先垂范，于1978年6月14日提出《关于在常委中开展小整风的意见》，决定以区委常委为主，吸收区革委会副主任和区委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开展一次小整风运动，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联系实际，澄清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改进领导作风，振奋革命精神。小整风分三个步骤进行。至6月底，区委常委组织学习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精神及有关文件，并召开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建议；7月上旬，区委常委先后召开4天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7月中旬以后，进行整改，并于7月28日召开机关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大会，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陈坚石代表区委常委会作了整风小结，提出了初步整改措施。一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区委常委每人联系一个基层单位，区机关每个部门也联系一个基层单位，并从机关50个副科长以上干部中抽调14人，从机关干部中抽调36人，下基层蹲点；^①二是建立区委常委会议和区革委会办公会议制度，研究需要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以及需要由区革委会组织实施处理的各项工作和各办、委、局、科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三是坚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大胆负责地处理好自己分工的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四是坚持集体学习制度，确定集中学习时间；五是坚持民主生活会

^①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关于区委常委小整风的情况报告》，1978年7月29日。

和上党课活动；六是坚持每周六到蹲点单位或经常联系的基层单位参加劳动的制度。至年底前，全区各基层党支部也都开展了小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通过揭批“四人帮”，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学习、批判和总结经验结合起来，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干扰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真正整出成效来，有力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通过小整风，一是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进一步分清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大是大非，肃清流毒，拨乱反正，弄清楚各条战线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二是帮助受“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而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统一了思想认识，划清了界限，认真总结了总结经验教训，增强了团结；三是切实解决了本部门、本单位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比如经营方向道路问题、领导班子不团结问题、作风不正问题、革命干劲问题，等等，特别注重解决了一二个突出问题。

其次，区委认真整顿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要求各级党组织通过反对自私自利、假公济私，反对弄虚作假、独断专行，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把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党的观念，增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克服和纠正那种否认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纪律、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健全民主集中制，形成既有广泛民主，又要有高度集中的良好氛围；坚决反对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要求区委、区革委会机关改进作风，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为基层服务，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真正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有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关心群众生活，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第三，区委抓住经营管理的整顿这个重点，认真搞好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分期分批地对工厂、企业、学校、医院、街道、居委会进行整顿，引导干部、职工和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特别加

强对工厂的整顿，强化企业经营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并着力抓好各项基础工作。

第二节 平反冤假错案和初步落实党的政策

一、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揭批“四人帮”斗争发动后，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要求尽快消除内乱带来的严重后果，纠正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1977年12月，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随后，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又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或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为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破除了这方面的禁锢。

“文化大革命”中，从区委到基层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戴上“走资派”、“假党员”、“叛徒”、“特务”、“三反分子”等帽子，进行揪斗、挂牌、游街、关“牛棚”，有的甚至被打伤致残。从区委书记到基层支部书记、厂长、校长等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的有108人，占领导干部总数的83%；区机关副科长、街道副主任以上干部67人，被批判揪斗的有51人，占76.12%；区委正副书记、正副区长除1人因生病长期休假外，6人都被批斗。1941年入党的老干部、区委书记郝玉生被无中生有地作为假党员、“走资派”而遭到残酷批斗，送进“牛棚”达3年之久。全区小学校长、书记、教导主任62人，被批斗后靠边站的57人，占91.94%。

1978年4月，福建省委批转省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关于落实政策中继续解决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

善处理”的指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和处理的干部案件进行全面复查，逐件予以落实。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仓山区委^①于5月起着手抓好机关干部立案审查对象的复查平反工作，7月开始全面铺开。区委常委直接抓疑难、重大案件，区委书记陈坚石亲自听取汇报。七八月间，区委共召开6次常委会议，研究了14个案件，占机关总复查数的36%。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机关干部39人（原区委领导3人由福州市复查，不计在内），这次复查给予改变定性的2人，平反的2人，推倒结论的7人，维持原审干结论的4人，维持审干结论补充新问题的2人，长期未作结论给予结论的2人，去掉不实之词澄清事实的4人，处理偏严给予减轻处分的3人，自杀改为去世的1人，以上复查变动的合计27人，占总数的69%；维持“文化大革命”以来定案不变的6人，维持历次复查结论的4人，右派摘帽的2人，合计12人，占总数的31%。^②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全区各部门、各支部也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逐个复查研究。区委还采取积极的态度，为“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林彪、“四人帮”，为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鸣不平 and 所谓“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等政治性问题被判刑的案件，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平反昭雪，把被颠倒了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对“文化大革命”中未立案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及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问题进行了平反和处理。

同时，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和政策依据，区委对复查的案件作出了处理。第一，凡是干部、职工的政治历史问题，过去已经审查作过结论，定性正确，“文化大革命”中又未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维持原结论，不重作结论；在干部结论中，被错误地戴上“犯走资

^① 1978年5月1日，朝阳区恢复为仓山区。12月，全区各街道、居委会也都恢复原有名称。

^②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干部政策》，1978年9月14日。

派错误”帽子的，予以取消；对于审查多年，问题仍未查清，且无法继续查证的，根据现有材料，尽快作出恰当的、实事求是的结论。第二，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站错队”和以人划线等问题，凡在干部、职工和群众中有这类结论或材料的，一律作废。第三，经过复查实属冤假错案的，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做好消除影响的工作。第四，认真做好安排干部的工作，并尽快处理好知识分子的审查遗留问题。第五，凡因冤假错案而株连子女的，有关单位主动发函给其子女所在单位，说明情况，消除影响，妥善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至1979年底，全区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审查的案件（其中立案507人，未立案265人），逐个进行复查，并在不同范围内召开了25场落实政策大会，为281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当场烧毁材料9526份、164斤，退还本人材料366份、笔记本29本。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16人，也都按政策规定给予改写了结论，处理好善后工作。全区共补发冤假错案工资44500多元。全区立案审查的507人中，复查后被推倒的169人，修改结论的87人，维持“文化大革命”前结论的165人，长期挂案新做结论的6人，以上共427人，占总数的84.2%；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结论的80人，占总数的15.8%。^①

二、初步落实党的政策

省委要求各级党委着手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的同时，对全省落实党的政策工作也作出全面部署。1977年8月，省委下发《关于继续认真做好落实政策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纠正因“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落实政策工作中的混乱，充分认识到落实政策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快恢复、健全

^① 中共福州市委批转仓山区委《关于文革中立案案件落实政策的总结报告》，1980年1月18日。

和充实落实政策工作机构，切实加强党委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进一步调查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遗留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布置“文化大革命”案件的全面复查工作。仓山区委把落实政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来抓，着手对自1957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冤枉的党员、干部进行复查平反和落实政策，改正其原处理结论并销毁一切有不实之辞的档案材料，恢复其职务和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1978年4月26日，区委恢复和调整充实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超任组长，区纪委副书记陈风和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同时，抽调干部充实各级办事机构，召开各部门、各系统、各基层负责人和区机关干部参加的全区性会议，对落实政策工作进行布置，并对有关职能部门作了明确分工。为了推动落实政策，区委还确定一名副书记牵头，抽调组织、宣传、公安、劳动等部门的10名负责同志，组成检查验收小组，对各口、各街道的立案案件，逐步地进行检查验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这项工作善始善终。至1978年9月1日，全区立案审查815人，已复查落实的540人，占总数的66.2%；原区管干部分配不当的有39人，1月至7月间调整工作的29人，可以工作还未适当安排的10人，因病长期不能工作的6人。^①

区委着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谬论和罪行，坚决把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肃清流毒，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问题，主要是加强教育，提高认识，对实行打击报复，残酷迫害群众，民愤极大的，坚决惩办，真正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加强对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充实力量，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属于哪里落实的

^①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干部政策》，1978年9月14日。

就要在哪里坚决落实。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加强调查研究，有条不紊地解决上山下乡、房屋代管等政策问题。

区委着手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召开有全区教职员代表参加的平反大会，为教育系统先进模范教育工作者、原仓山幼儿园园长陈雪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从而推动了教育系统落实政策的开展。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对那些确有真才实学而用之不当的科技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尽快调整归队，做到学以致用，发挥其专长。

区委着手为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摘帽和改正。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区委于1978年5月15日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申喜盛任组长，开展对全区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摘帽和改正工作。到年底，全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66人中，原已摘帽的37人，未摘帽的28人予以全部改正摘帽。未安置者全部给予安置，原迁往山区的35人及家属55人全部迁回仓山区落户。此外，认真做好地主、富农分子的摘帽工作和解决地富分子的成份问题，到1979年2月全区基本完成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摘帽工作。列入监改的对象中，经区革委会批准和群众评议，摘帽113人，继续监改5人。

区委着手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先后召开干部、职工群众、归侨和侨眷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全国、全省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并联系实际，揭批了“四人帮”在本区帮派势力破坏侨务工作的罪行，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对侨眷、归侨实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和一系列侨务政策，做好侨务工作。本着区别对待、先易后难的原则，对全区40起华侨房屋问题作出处理，最终妥善落实了6起，保护和褒扬了广大归侨、侨眷爱祖国、爱故乡的热情，进一步调动他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为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区委于1979年2月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讨论落实政策工作，并发出《关于做好落实政策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各街道、各单位、各级党组织以及负责

此项工作的同志必须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加强领导，组织力量，采取措施，排除干扰，加快速度，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通知》明确了任务分工：(1)“文化大革命”期间立案审查的案件，以及虽未立案但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都应进行复查落实。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诬陷不实的材料要销毁，造成的不良影响要消除。由区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继续抓好，由各有关街道和单位组织力量抓紧进行。(2)“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审查未作出结论的干部，应逐个作出结论，档案材料应根据规定予以清理。由区委组织部负责。(3)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和摘帽“右派分子”的安置，总的由区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机关2个对象的改正工作由区委组织部负责，学校5个对象的改正工作由区委宣传部负责，安置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合组织部、劳动科、民政科及有关街道进行。(4)四类分子的评审摘帽甄别工作由区公安分局负责，各街道配合。(5)“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部门处理的未起诉案件的复查落实，由区公安分局负责。(6)“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刑案件及有申诉的“文化大革命”前判刑案件的复查落实，由区法院负责。(7)统战人士冤假错案的复查落实，由区统战部负责，具体工作由所在街道进行。(8)“文化大革命”期间查抄财物的处理，由区公安分局负责，各单位、各街道配合。(9)内迁人员的落户工作由区公安分局负责，根据政策办理。(10)落实政策对象的复工复职、补发工资、工龄计算及其他劳动工资等问题，干部的由区委组织部负责，职工的由主管部门审定后，劳动部门办理手续。(11)对于上山下乡城镇居民中动员不当，安置不落实，需要收回的，由民政科负责审查，报公安分局办理迁移落户手续。(12)落实政策对象的房屋安排问题，由区房管分局负责。《通知》还规定了需要报请区委常委审批的案件：一是经复查原定为敌我矛盾性质，需要改变的（不包括四类分子甄别改正），或重新论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二是干部、职工开除公职，党员开除党籍需要改正的；三是区委主管的干部需要改变处分、改变结论和新做审查结论的；四是“右派分子”需要改正；五是统战对象需要落实政策

的；六是主管部门有争议的。^①

粉碎“四人帮”后，仓山区委着手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初步落实党的政策，调整社会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出了初步拨乱反正的尝试和努力。一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许多长期遭受诬陷和迫害的同志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解决，由于过去工作上的失误而处理不当的问题正在逐步改正，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逐步恢复。这对于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促进全区的安定团结，推动全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①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关于做好落实政策工作的通知》，1979年2月17日。

第九章 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整顿与恢复工农业生产

粉碎“四人帮”后，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地投身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福建省委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罪行，以肃清“左”倾思想在工农业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整顿和恢复全省工农业生产。中共仓山区委结合实际，积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重点整顿和恢复工业生产。

1977年8月，区委成立以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申喜盛为组长的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领导小组，并提出《关于揭批“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罪行，坚决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企业整顿的初步意见》，决定在区属各基层单位中开展企业整顿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运动。整顿的内容主要是：一要整顿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以纯洁班子，特别注意配备好一二把手；二要以大庆为榜样，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三要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抓好企业的计划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管理、技术管理和设备管理等；四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中共中央于1978年4月颁发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对企业整顿提出了具体标准，

明确规定：企业要以生产为中心，理直气壮搞好生产；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据此，仓山区委着手对工业企业进行了整顿。明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对职工工资实行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制度，并对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制度；主管部门要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精神，深入基层抓好实行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的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分别情况，逐步推广。1978年下半年，全区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否定而停止的奖金制度。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并对1977年开展“工业学大庆”情况作一次认真的检查，逐条对照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十八点要求和先进单位的经验，找出差距，明确方向，制订出1978年的具体规划、措施。要广泛开展优质、高产、低耗、安全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并加强对劳动竞赛的组织领导，建立日公布、旬检查、月小结、季评比、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的制度。各工厂企业要大搞增产节约，把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搞上去；大力加强班组管理工作，全面开展红旗班组、优等岗位和班组经济核算等活动；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狠抓扭亏增盈工作，坚决消灭经营性亏损。要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挖潜、革新、改造，并充分发动群众，把群众性科研革新运动普遍开展起来，采用土洋结合的方法，在各道工序、各个环节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经过整顿，全区范围内“学大庆、赶南宁”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先进单位、模范人物不断涌现，一个力争高速度，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形成了新的高潮。朝阳农械厂联合收割机车间被评为福州市“学大庆”红旗集体，橡胶厂、灯具社、建筑公司、皮鞋厂、二塑厂、电机厂喷灌机试制组等13个单位和部门被评为福州市“学大庆”先进单位（集体）。林其璋、严天官被

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工交、建工、教育、卫生、街道系统有 26 人被评为福州市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经过整顿，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业生产克服了缺电少煤、原材料不足的困难，实现了扭亏增盈。1977 年工业总产值达 3532 万元，提前 33 天完成年度计划，比 1976 年增长 24.5%。1978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4521 万元，比 1977 年增长 27.95%。其中，第一季度区工交系统工业总产值完成 783 万元，占年计划的 26.1%，比去年同期增长 66.8%；产品产量也实现同比大幅度增长，喷灌机增长 8 倍，电表增长 3 倍，木隔板增长 3 倍，泡沫拖鞋增长 10 倍，翻胎增长 2.5 倍，探伤仪增长 1.5 倍。^① 各种产品的质量和各项经济指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和改善，财政收入实现较大增长。

同时，区委牢固树立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大力支援农业，并根据省委于 1978 年 6 月制定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精神，着手开展农业整顿，明确农村社队经营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经营管理制度，从政策和措施上保证农村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农机产品，为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经过初步整顿，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全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区粮食总产量实现了较大增长，各种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和多种经营也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

二、恢复与发展科学教育事业

“文化大革命”是从科学教育战线开始的，这条战线的整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在重新恢复职务后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关于“建国后 17 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为社会主义服

^① 《陈坚石同志在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78 年 4 月 19 日。

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学教育领导的拨乱反正。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迎来了科学的春天。9月，全省科学大会召开，审议并通过《1978—1985年福建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明确了全省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及实现措施。

区委认真贯彻全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狠抓科学技术现代化。大搞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政策，培养专业的科技队伍。并要求各工厂、企业建立健全领导、科技人员、工人三结合的科研组织，制订科研规划，落实措施，加速技术改造的步伐，不断提高工业现代化水平。经过整顿，新产品研究开发、新技术应用取得新进展，区农械厂试制成功稻麦两用联合收割机，电机厂改进电动喷灌机，电器厂试制成功 BW10—10 柱上油开关，工具厂试制了 Py—40 型自动喷头，化工社试制成功农药中间体“656”乳化剂。

区委抓纲治校整顿教育，搞好教育革命。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院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办法招收新生。以此为契机，全区逐步恢复和建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学校正常，培养勤奋向上的良好校风和学风；努力办好学校，首先是办好1所市重点小学和4所区重点小学，加强基础教育，调整、充实和加强学校的领导班子；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加强师资培训工作和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生的生活条件，改善办学条件，狠抓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扫除文盲。

科学教育战线的整顿，也带动了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区委大力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除“四害”，大讲卫生，大灭疾病，整顿市容，提高健康水平；切实加强区医院和卫生院的领导，整顿管理制度，改进医疗作

风，提高医疗和护理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卫生系统的一些医务人员献出了验方、编写了学术报告。全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到1.6‰。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带来逐步走上正轨。

第二节 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一、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区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在党的路线指引下，在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清查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摧毁了“四人帮”在本区的帮派体系；初步落实党的政策，“四人帮”破坏党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正在逐步清除；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全区形势逐渐转好；对区属机关和一部分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和充实，使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在这种形势下，召开区第三次党代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78年4月19日至21日，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75人。大会听取并审议陈坚石代表区委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区，为搞好我区党的建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1971年区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主要工作，着重回顾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省、市委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斗争这个纲，工业生产和科学、文教、卫生事业都初见成效。会议要求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被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全都纠正过来；高速度地发展全区工业生产，搞好

街道和居委会建设，狠抓科学技术现代化，积极发展文教卫生事业；进行组织、思想和作风整顿，抓紧落实党的政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大会还听取了组织部、宣传部、工交、武装部、工会、团委、妇联等部门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肯定了各条战线抓纲治区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提出了加强全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民兵建设和发挥群众组织作用的任务。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陈坚石、申喜盛、陈忠勇、马长春、王恭贵、刘依细、陈善源、贺超（女）、严举乾、张钧、刘学苏、林恩全、陈凤和、高肩宇（女）、郭孟泉、林捷、唐木英（女）、严天官、吴怀德、李美珍（女）、刘德珍共 21 人，选举产生出席中共福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11 人。21 日，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常委会委员陈坚石、申喜盛、陈忠勇、马长春、王恭贵、刘依细、陈善源、贺超（女）共 8 人。陈坚石任书记，申喜盛、陈忠勇任副书记。大会还选举产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申喜盛、陈凤和、李香远（女）、李宗鑑、陈心榕、所荫溥、贺超（女）共 7 人。申喜盛任区纪委书记，贺超（女）、陈凤和任区纪委副书记。

区第三次党代会的召开和区第三届委员会的产生，为之后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实现全区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78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为期 36 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但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讨论了关于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从而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做准备的会议。随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召开。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

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仓山区委立即带头学习和研究，提出有关宣传、学习、落实的意见。区委宣传部举办宣传员学习会，领会公报的基本精神，为全面开展宣传、学习公报培训骨干，研究如何使全会精神迅速传遍千家万户，做到人人明白。1979年2月2日至10日，区委召开区、街道、居委会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月份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如何把全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随着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不断深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坚决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真正从思想上转变过来，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充分认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从此，全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满怀希望地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附 录

大 事 记

(1949 年 8 月—1979 年 2 月)

1949 年

8 月 17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攻入福州，福州宣告解放，仓山区同时解放。

8 月 2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银圆券”及地方一切货币均为非法货币，即日起禁止流通。

8 月 26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孙立保、尚慎华等人，接管国民党政府福州市仓山区公所和区警察分局。

8 月 30 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仓山区公所成立，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区长孙立保。区公所下辖 25 个保 462 个甲，共 13635 户，64077 人。

9 月 3 日 仓山区公安分局成立，下辖麦园、仓前、上渡、下渡、舍人 5 个派出所。5 日，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孙立保为区公安分局局长。

9 月 6 日 仓山区军警联合办事处成立，着手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发动群众揭发和监视隐藏的敌对分子，并对外籍人员进行登记。

9 月 7 日 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免去孙立保仓山区公所区长职务，改派李新华任仓山区公所区长。

9 月 9 日 福州市政府任命李新华为仓山区公所区长。

10 月 2 日 仓山区万余群众参加省、市提灯火炬大游行，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29日 国民党军派出4架飞机，窜入仓山区仓前一带，投弹数枚，炸死3人，伤及数人。

11月7日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作为中共福州市委派出机构，李新华任书记。区工委内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并在区直机关建立仓山区第一个党的基层支部。

11月 仓山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设主席1人，副主席3人，王依铨任主席。

12月8日 仓山区公所设立仓前、文藻巷、万春巷、敦睦里4个市容摊贩管理委员会，着手整顿市场，对流动摊贩、地摊划片定点，加强管理。

1950 年

1月1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林森县（今闽侯县）管辖的白湖、双湖两乡划归仓山区。9月又改划归郊区管辖。

2月7日 国民党军派出2架飞机轰炸仓山区，投下燃烧弹数枚，炸毁房屋40多间、楼房2座、民船11艘、死伤80余人。

2月 仓山区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区工委书记李新华兼任主任。

3月21日 仓山区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区农民协会，选举产生农民协会委员20人，王恭贵任主席。

5月1日 仓山区开始宣传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7月6日 福州市人民政府水上区公所成立，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区长杨坤。区公所下辖洪山桥至魁岐水域及江南、江北两乡，共26保325甲，3312户，14808人。

8月9日 为改造基层政权，废除保甲制度，仓山区成立民主建政工作委员会，由区长李新华、区公安分局局长孙立保、分局治安股长杨凯、行政专员张步余、驻军营副教导员毕政教等5人组成，着手开展民主建政工作。至9月10日结束，全区共建立麦园、仓前、观井、临江、新港、藤山、下渡、上渡8个居民委员会和166

个居民小组。

8月 仓山区公安机关结合民主建政工作，全面进行户口调查登记，逐户核实人口。全区共有13635户，64077人。

9月 仓山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区长李新华兼任主任，部署开展群众性的防病灭鼠运动。

10月 仓山区成立“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工作委员会”，在全区范围内对各种反革命分子进行登记。至1951年1月15日，共登记各种反革命分子261人，收缴反动证件235件。其中，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分队长以上共173名，特务88名。

11月 仓山区、水上区成立分别由张玉英、陈照熹为主任的民主妇女代表会，着手筹备召开区妇女代表大会。

12月 根据省、市委的部署，仓山区、水上区着手部署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

1月 仓山区工委在全区干部群众中开展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活动，纠正“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把教育运动从机关、团体、学校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2月25日 水上区成立民主建政工作委员会，着手改造基层政权。至3月9日，正式宣布彻底废除保甲组织，建立5个居民委员会和177个居民小组。

是年春 仓山区农会委员菖蒲村农民林发泉带头联合几户播种、耕草能手，自动组成临时互助组，在农忙时为左邻右舍缺乏劳力的家庭帮工。至1952年7月，全区13个农业自然村普遍成立临时互助组。

3月4日 仓山区、水上区分别成立禁烟禁毒登记处。

3月6日 仓山区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操场召开镇压反革命宣判大会，约6000人参加。

3月31日 福州市工商联仓山区分会筹备会成立。1953年3月，正式成立福州市工商联仓山区分会，选出执委会和监委会委员

计 26 人，沈幼兰任主任委员。

4 月 13—15 日 仓山区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区各阶层代表 305 人参加。区长李新华作《三个月来抗美援朝情况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工作报告》，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作《关于目前形势与福建任务的报告》，区公安分局局长孙立保作《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订立抗美援朝的爱国公约、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签名、对日问题投票、五一示威游行等决议。会后，成立了抗美援朝支会。

6 月 15 日 仓山区土改工作队分成 3 片（下渡地区分 2 片，其他地区 1 片），分别进驻 13 个自然村开展土地改革。

6 月 中共福州市水上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张汇三。同时，中共福州市委决定，张汇三任水上区公所区长。

6 月 省工业厅在港洲路 30 号创建地方国营造纸实验厂，为区内首家国营工厂，年底投产。

7 月 福州市人民政府结合整顿火柴市场，以仓山区内港头建华、南光两家火柴厂为基础，合并全市数十家大小火柴厂，由国家投资 70%，设立福州华光火柴公司，成为区内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58 年 3 月改为国营福州火柴厂。

8 月 28 日 仓山、水上区公所撤销，分别成立仓山、水上区人民政府，作为县一级政权机构。仓山区政府由李新华任区长（1952 年 7 月由姜彬接任），内设秘书室和民政、财粮、文教、建设、工商 5 个股，下辖公安分局、卫生事务所。水上区政府由张汇三任区长（1952 年 12 月由周德山接任），内不设股，只配秘书和 3 名助理员，下辖卫生事务所。

9 月 9 日 福州市总工会仓山区办事处成立，作为市总工会的派出机构，主任施荫棠。后于 1954 年撤销，又于 1958 年复建。

9 月 中共福州市委决定，李新华任仓山区政府区长（1952 年 7 月调离仓山）。

11 月 27—30 日 根据政务院下发的《大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仓山区和水上区分别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选举产生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助区人民政府工作，开始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出席会议代表由区政府与各界人士协商决定，各 145 人。仓山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长李新华作《关于解放两年来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区公安分局局长孙立保作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 19 人。

12 月 6 日 水上区成立“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学习委员会领导小组和检查小组，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三反”运动。至 1952 年 7 月基本结束。

12 月 12 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水上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副书记林少华。

1952 年

2 月 9 日 仓山区取缔一贯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进行登记的一贯道徒 634 人。

2 月 10 日 仓山区成立取缔反动会道门宣传办公室，举办反动会道门罪行展览会，召开公判大会，共动员全区 536 名群众从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自动退道。

2 月 13 日 仓山区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145 人。会议中心任务是贯彻福州市第二届临时人民代表会议精神，发动全区各界人士开展“三反”运动，以及在工商界中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情报）运动。

4 月 仓山区公所组织爱国卫生宣传队，发动各单位基层干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工作，并动员群众广泛订立爱国卫生公约。

5 月中旬 仓山区“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区工委、区政府、公安分局、税务分局、卫生事务所 5 个单位共揭发出贪污分子 45 人，贪污金额 1.77 亿元（旧人民币，下同），退出赃款 1.12 亿元，共计判处徒刑 3 人，判处劳改 1 人，开除 9 人，撤职 8 人，降职 3

人，记过 4 人，警告 1 人，免于处分 16 人。

5 月 仓山区 20 多家藤器个体户组成首家生产合作社——仓山藤器生产合作社。

6 月 17 日 仓山区清毒委员会成立，区工委书记李新华任主任，区公安分局局长吴敏任副主任，区长姜彬等 7 人任委员。全区着手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清毒运动，至 9 月底，共登记烟民 201 人、烟贩 80 名、烟馆 26 家，逮捕烟毒犯 104 名。其中，判处死刑 1 人，有期徒刑 8 人，基本上消除了烟毒的危害。

6 月 26 日 仓山区成立积案清理委员会。7 月 18 日，在天安堂召开审判处理大会，判决罪犯 26 名。

6 月 水上区公安机关开展“花船”（妓女船）、租睡船登记，加强管理，共登记 121 艘。至 1958 年予以全部取缔，经改造后从事运输服务。

7 月 15 日 仓山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共划定地主 17 户，没收、征收其田地 235 亩，分给 556 户贫苦农民。

7 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仓山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副书记高伯英。

7 月 中共福州市委决定撤销中共仓山区工委和水上区工委，分别成立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员会和水上区委员会，书记分别为李新华和张汇三。

7 月 中共福州市委决定，姜彬任仓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7 月底 仓山区“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共划清 2748 个工商户的类型，其中完全守法户 1215 户，基本守法户 1330 户，半守法半违法户 281 户，严重违法户 22 户，揭发出偷漏国家税收 54.47 亿元，偷工减料 1.14 亿元，盗窃国家资财 6.45 亿元，行贿干部 2.8 亿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203 万元，并揭发出其他欺诈暴利、私卖黄金、贩卖烟毒等不法行为计 15.35 亿元，最后分别给予罚金、警告、补税、退财等处分，共补税 15.68 亿元，退财 5.35 亿元，罚金 500 万元。

8 月 仓山区召开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出席 100 人，选举产

生区妇联执委 17 人，成立了由宋宝琴任主任的民主妇女联合会。

10 月 16 日 仓山区全面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复查判定工作。

11 月 福州市消费合作社仓山总社、三塔儿消费合作社、仓山供销合作社合并为一家国营、集体合资企业，下设 7 个供应点和 1 个门市部。

11 月 28—29 日 仓山区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 107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长姜彬作《关于目前形势和贯彻劳动就业登记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区政府关于调整居委会区域划分的意见。

12 月 3 名英国传教士先后撤离仓山回国，外国传教士操纵仓山区天主教的历史自此结束。

12 月 中共福州市委决定，张质珉代理仓山区委书记，1953 年 4 月正式任书记；周德山任水上区政府区长（1953 年 11 月调离）。

1953 年

1 月 3 日 水上区成立运输改造办公室，着手对船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教育。5 月，水上区小驳船运输合作社成立。

1 月 29—30 日 仓山区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代表 145 人。听取和审议了区长姜彬作《关于一年来政府工作及今后三个月任务的报告》和区公安分局局长徐永年作《关于镇压残余反革命分子及防空问题的报告》，讨论取缔反动会道门和镇压反革命任务。

2 月 10 日 仓山区成立取缔反动会道门宣传办公室，举办反动会道门罪行展览会，召开公判大会。全区有 536 名道徒退道。

2 月 18 日 仓山区着手开展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补课运动，全区共有 32 个行业，包括店员及手工业、印刷、食品、羽毛厂等行业工作 1447 人参加。至 5 月结束。

3 月 仓山区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共组织 627 名干部（其中脱产干部 101 人，不脱产基层干部 526 人）进行了学习，共召

开各种大小群众会和各种类型座谈会 543 次，受教育的成年男女共 26256 人次，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3 月 福州市工商联仓山区分会成立，主委沈幼兰。1953 年 12 月撤销分会，正式成立仓山区工商联。

5 月 水上区召开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50 人，选举产生区妇联执委 9 人，成立了由薛碧轩任主任的民主妇女联合会。

6 月 24 日 水上区着手开展船民民主改革补课，历时两个月，建立 9 个船民协会支会，会员 2350 人。1956 年 4 月仓山区、水上区合并后，船民协会自动消失。

6 月 16 日 仓山区召开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 145 人。听取和审议了区长姜彬作《关于区政府五个月来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确定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做好拥军优属、防空、防特和普选工作，号召全区人民大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保证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6 月 仓山、水上两区分别成立选举委员会，开展首次普选工作，至 9 月 25 日结束。仓山区 18 岁以上选民 38483 人，分 51 个选区，选出区人民代表 95 人。水上区 18 岁以上选民 10163 人。

10 月 16 日 仓山区开展镇压反革命复查判定工作，至 1954 年 2 月，基本上弄清了全区的反革命活动情况，并作出了结论或处理，历时三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至此结束。

10 月 29—31 日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仓山区、水上区分别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仓山区出席代表 95 人，选举产生区长姜彬，委员 11 人；水上区选举产生区长张汇三，副区长张心绪，委员 7 人。

11 月 15 日 仓山区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全区粮食计划供应工作，并决定在区委领导下成立仓山区粮食工作办公室，由区委副书记姜彬任办公室主任，区委委员分工负责，每日碰头讨论。同时，抽调本区 83 名干部，以及省、市机关和军区等单位 66 名干部，合计 149 名，组成区粮食工作办公室与中心粮站，私营粮店均

改为代销店，并按居委会成立 8 个工作队，深入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及计划供应政策的宣传。

11 月 23 日 仓山区开始初步实施粮食计划供应，居民群众按照划分的地区带户口簿到指定粮店买米。

12 月 8 日 仓山区委召开全区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大会，区委书记张质珉作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总结报告，对总路线的内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等做了进一步的宣传教育。

12 月 仓山区工业企业达 750 余家（含个体户），比 1949 年 8 月增加一倍。

1954 年

2 月 11—12 日 仓山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选举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贯彻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工作，区长姜彬作《区人民政府三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

2 月 历时三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

4 月 仓山区委开始在工人中筹备建党。年底，成立全区第一个工人党支部。

7 月 5—7 日 仓山区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区长姜彬作《四个月来政府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总结区政府四个月来的工作，对第三季度工作任务作出部署，讨论宪法草案的宣传问题。

7 月 仓山区、水上区分别召开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仓山区出席代表 100 人，选出区妇联执委 21 人，主任夏明。水上区选出区妇联执委 11 人，主任黄敬莹。

7 月 中共福州市委决定任命姜彬为仓山区委书记。

8 月 15 日 仓山区对私营棉布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 11 户私营棉布商合并为 4 家代销店、经销店。

8 月 30 日 设在仓山区洋洽的福州市最大食品厂——民天食品

厂实行公私合营。1955 年 9 月改名为福州第一食品厂。

8 月 仓山区实行食糖计划供应，指定 14 家店铺经销食糖。

9 月 7 日 水上区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基层设 2 个指挥所。

9 月 26 日 仓山区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基层设 6 个指挥所。

12 月 仓山区开展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成立 2 家国营百货门市部和 16 家供销合作社，对私营工商业者实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

1955 年

1 月 20 日 国民党军飞机滥炸福州市区，在仓山、水上两区境内投炸弹 14 枚，炸沉船一艘、炸死 5 人、炸伤 11 人，受灾 62 户、295 人。

1 月 仓山区人民防空指挥部成立，仓山区委书记姜彬兼任总指挥。下设办公室，主要任务是监视空情，组织疏散城市居民和夜间灯火管制，组织医疗救护、消防，维护社会治安等。

1 月 中共福建省委任命汪茂森为水上区委书记。

2 月 27 日 仓山区公安机关破获一起反革命集团，逮捕反革命分子 1 名，管制 2 名，警告 3 名。

2 月 仓山区粮食工作站升格为区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全区粮油计划供应及票证签发等工作。

3 月 仓山区开始设立街道办事处，将原 8 个居委会改为下渡、藤山、仓前、麦园、临江、上渡 6 个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下辖 48 个居委会。

3 月 仓山区内制茶业开始公私合营。到年底，区内何同泰等 33 家私营茶厂（行）并入地方国营福州茶厂。1956 年产茶 3726.75 吨，有职工 1500 多人，为全省最大的制茶企业。

5 月 5 日 仓山区委成立肃清反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分 4 批开展一场肃反斗争。

5 月 中共福州市委决定，郑义坚任水上区政府区长。

6 月底 区委、区人民委员会、区公安分局 3 个单位共 201 人

参加了第一批肃清反革命斗争。

8月 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城镇粮食“以人定量”的供应制度，仓山区按照“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和照顾生产的原则划分口粮等类别标准进行供应。

9月17日 仓山区成立社会镇压反革命办公室，并在街道、派出所成立工作组，着手开展社会镇反运动。至1956年1月底，先后组织3次统一行动，逮捕反革命分子97名。

9月 仓山区62家私营粮油代销店，经社会主义改造，合并为17家国营粮油店。

10月7日 仓山区和水上区人民政府均改称为区人民政府。仓山区人委设秘书室、民政科、工商科、卫生科、兵役局、人事科、手工业科、公安分局、房地产管理所、粮食管理站、税务分局等13个工作机构。水上区人委内不设科室，只配备秘书和若干助理员，下辖公安分局和卫生事务所。

11月10日 仓山区公安机关组织229人参加全市统一行动，破获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集团，逮捕反革命分子32名，搜查121个点，查获一批反革命罪证。

1956年

1月11日 仓山区公安机关组织156人参加全市统一行动，逮捕隐藏在基督教内的反革命分子8名。

1月 中共福州市委任命郝玉生为仓山区委书记。

1月 仓山区内协记、大茂等30多家私营锯木场，并入地方国营“五一”锯木场，另有20余家并入福州贮木场。至此，区内私营木材加工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1月 全区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新高潮，各初级合作社的农户纷纷联合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月底，共办起4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0%。

2月 中共福州市委决定，梁寰海任仓山区人委区长。

3月下旬 区粮站、清洁队、救火会3个单位共105人参加第

二批肃反斗争。

3月底 仓山区 700 多户零售商全部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4月12日 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将水上区和仓山区合并成立仓山区。

4月12—15日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仓山区第一次党员大会在仓山区进步路原市劳动局礼堂（现微生物研究所）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 150 名，其中正式党员 86 名，候补党员 64 名。大会听取并审议了郝玉生代表区委作《中共仓山区委会工作总结报告》，讨论通过《关于坚决执行城市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加强手工业、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对生产工作的领导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郝玉生（女）、孙志忠、孙荣桂（女）、徐坤义、施荫棠、曹恒雅、林良浦、黄清风（女）、胡芳清、冯以贤、林书金、黄玉清等 12 人为区委委员，组成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一届委员会。15 日，中共仓山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郝玉生、孙志忠、孙荣桂为区委常委，郝玉生任书记，孙志忠、汪茂森任副书记。大会还选举产生出席中共福州市代表大会代表 4 人。

4月 仓山区成立选举委员会，开展第二届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全区 18 岁以上选民 52286 人，参加选举的 49718 人，占选民总数的 95.08%，选出区人大代表 125 名。

6月初 全区 21 所小学和 16 所市民业余小学共 412 名职工和教员参加第三批肃反斗争。

6月21日 仓山区开展以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苍蝇）为中心的夏季爱国卫生运动。

6月 区委在全区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把 500 多家手工业个体户改造成 32 家手工业合作社（组），为区属工业发展奠定基础。

7月 水上区船民组织一个初级运输社，拥有小驳船 553 艘，社员 1327 人，占总人数 97.2%。至此，船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9月24—26日 仓山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省林业干校礼堂召开，出席代表 125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三年来区人

民委员会工作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梁寰海为区人委区长，施荫棠、叶鸿宝为副区长，郝玉生等 16 人为委员；选举王学芝为区人民法院院长，梁寰海等 47 人为福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9 月 30 日 仓山区妇女联合会在全区妇女中开展“五好”（好妈妈、好婆婆、好媳妇、好妻子、好邻里）活动。至年底，共评出区“五好”积极分子 208 人，福州市“五好”积极分子 70 人。

10 月 区旧货合作店组成合作社，为全市首批旧货合作社。

10 月 区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 230 人。选举产生区妇联执委 34 人，主任王碧英。

11 月 经过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全区手工业者共 690 户，增加收入的 609 户，占 88%；保持原收入的 38 户，占 5.5%；降低收入的 43 户，占 6.5%。每人每月工资收入最高 28 元，最低 5 元。

12 月 区内商业各行业完成合作化，全区小摊贩 2308 户 2580 人，其中 1141 人上山支前、返乡或从事副业劳动，1439 人安排到国营、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工作。至此，仓山区基本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年底 仓山区通过“转让”和“新办社”，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区总农户的 97.5%，土地有 3487.29 亩，占土地总数的 95.8%。其中，城区共组织了五星、万里、金星、联建、燎原 5 个高级社和 1 个仓山蔬菜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 1565 户，占城区总农户的 99%。

1957 年

3 月 7 日 仓山区公安分局开始对土地改革中划定的 24 名地主、富农进行成分评审工作，历时 1 个月。通过自评、社员评定、干部鉴定，并经区人委审批，有 15 名摘帽改为农民，另有 4 人取消管制。

4 月 10 日 中共仓山区委成立由区委常委等成员组成的整风指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开展整风运动。全区共 12 个区属机关单位分

别成立整风中心小组，约 400 名机关干部、民警参加了整风运动。6 月，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约 336 人参加了这场斗争。至 10 月底，全区共有 5 名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直到 1979 年才给予纠正。

上半年 仓山区基本完成了农民个体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集体经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7 月 区委对合作化后区属职工收入变化情况进行调查，比合作化前增加收入的占 70%，降低收入的占 20%，持平的占 10%。

8 月 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 125 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 8 个月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听取区委宣传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

10 月 25 日 仓山区委整风指导小组发出《仓山区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整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主要对象是区委、区人委、各领导机关以及党的各部门负责干部，关键是整顿思想作风，认真改进工作。

12 月 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仓山区街道组织和区划调整方案。全区 6 个陆上街道办事处调整为 4 个（上渡、仓前、下渡、临江），桥东、桥西两个水域办事处合并为水上办事处，居委会从 33 个调整为 52 个。

1958 年

是年初 区公私合营企业和个别工厂职工参加第四批肃反斗争。10 月，区属新扩建工厂和公私合营企业新职工参加新四批肃反斗争。

1 月 21 日 区委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反右派斗争，共有 5 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 1 人被开除送劳教），被分批分期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 1979 年后才给予纠正。

1 月 区委在各系统、各单位开展“双反双比”（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至 3 月暂告一段落，共有 6766 人参加。

1月 中共仓山区手工业委员会成立，区委第二书记孙志忠兼任书记。

2月 区委召开千人干部（扩大）会议，传达省、市委会议精神，提出全区生产“大跃进”规划，并重点检查和批判了“不能跃进、不必跃进、不敢跃进”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拉开了仓山区“大跃进”运动的帷幕。

2月 全区工商企业开展“四定”（定资金、定员、定额、定点）工作，至5月中旬结束。

3月12日 区委整风办公室发出《关于在机关进一步开展双反双比运动的意见》，决定开展一场“双反双比”的整改运动，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同时，要求在机关内部以反“五气”（官、暮、骄、阔、娇）、反保守为中心，在全体干部中掀起一个比干劲、比深入群众、比先进、赶先进、向先进看齐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

3月 仓山区成立选举委员会，开展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全区应参选的选民56339人，参加选举的54738人，占选民总数的97.16%，选出区人大代表107名。

3月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仓山区内福建师范学院和区第一脱胎漆器厂视察。

4月1日 仓山区粮站及所属各粮店下放到各街道（公社）管理，各居委会设立粮食服务部。到1959年又恢复为国营粮站（店）。

5月5—8日 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省林业干校礼堂召开，出席代表107人。会议听取选举工作报告；审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出区人委委员21名，梁寰海任区长，施荫棠、陈坤荣任副区长。

5月 区委开始在区直各系统中评选福州市劳动模范，仓山幼儿园园长陈雪菲等11人首次被市人委授予“福州市劳动模范”称号。

5月 在“全民办厂”的口号下，仓山区掀起大办工厂的热潮，

仅 5、6 两个月内，就办起了以手工业为主体的 528 个厂（场）和 100 多个卫星厂，组织生产人员 1200 多人，投资 5 万多元。

6 月 区委决定将三叉街百余亩土地作为工业生产基地，创办农业机械厂、郭宅竹器厂、仓山焦化厂（现三化）、民政砖瓦厂等。

6 月 区委决定成立中共仓山区财贸委员会。

6 月 为加强街道工业管理，区各街道办事处开始设立工业办公室。到 7 月底，全区各街道均设有工业办公室，下辖 176 个厂（场、组），员工 9421 人。

上半年 仓山区食杂、食品、柴炭、百货、饮食、服务等行业合作商店转为国营商店，酒杂、废品、贸易、缝纫等行业商店及民天食品厂、福泰糕饼厂由福州市下放仓山区管。

7 月 仓山区第四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听取妇女工作报告，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保护妇女合法权利。选出区妇联执委 21 人，主席王碧英。

8 月 12 日 仓山区成立审干五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列入审干范围的有 661 人，重点审查 233 人，占 34.19%。

8 月 盖山红旗人民公社成立。

8 月 仓山区小学教师 295 人暑假集中开展“拔白旗、插红旗”整风运动，重点检查 95 人，占总人数 33.3%。

9 月 15 日 福州市第一个以福州造纸厂等工厂为主体的城市公社——先锋人民公社在仓山区内成立。

9 月中旬 仓山区委制定《关于建立仓山区人民公社的工作方案》，并成立公社、分社筹委会，加强宣传教育。

9 月 仓山区开始以国家赎买方式，对私人出租的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年底，共改造 2601 户，建筑面积 39.9 万平方米。

10 月 在“以钢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区掀起“大炼钢铁”高潮。区内福建师院附中、省建筑工程学校、省造纸厂等 60 个单位 2.4 万多人停课、停工，建立土炉、转炉 1452 个。到 1959 年 1 月止，4 个月全区炼出废钢铁 347.6 吨。

10 月底 仓山区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共有 2 万多户、10.6 万多

人，下辖临江、仓前、上渡、跃进、水上等 5 个分社。区内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居民均加入，实行政社合一，并实现食堂普遍化、托儿经常化、服务事业集体化，大搞商业服务部，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和普及文化教育活动。

是年 在大办人民公社高潮中，自由市场被撤销，各菜市场成为具有国营和合作性质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全区居民日常消费实行配给制，主副食品、蔬菜及生活用品等实行配额供应。1961 年，开始恢复 4 个中心菜市场，8 个小型菜市场。

1959 年

1 月 18 日 仓山公安机关破获水上反革命团伙，逮捕罪犯 67 名，随后移送市法院审理。

1 月 25 日 仓山区委、区人委按户口把全区 53 个居委会调整为 42 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约辖 500 人，选基层干部 126 名。这个办法受到福州市人委通报表扬。

3 月 19 日 区委水上工作部和区人委水上工作科撤销。闽江上下游运输社、小驳船社、内河运输社合并成立福州市水运公司，划归市交通局。从洪山桥到魁岐沿江 1200 户、6000 多船民，分别划归邻近陆上街道（公社）管辖。

5 月 仓山区委在区直机关开展算帐整风运动，发动群众揭发“作风不纯”的党员。

6 月 16 日 仓山区整顿民办工厂，至 8 月 30 日结束，将 394 家小型场、厂合并为 25 家工厂，有职工 919 人。

6 月 26 日 仓山区委开展街道算帐整风运动，先集中街道干部和基层干部 107 人进行整风，后又转入群众性的全面整风，先后召开 80 场大会，受教育人数达 3525 人，至 8 月底基本结束。

6 月 省劳动模范、仓山竹器厂党支部书记梁敬淦带领全厂职工技术攻关，实现从破竹到制品全过程机械化，被省政府评为“福建省先进单位”，并受到国务院嘉奖。

6—8 月 仓山区委开展民办工厂整顿，将区内 394 家微型工厂

(场)合并为 25 家,共有职工 732 人,干部 54 人。

8 月 9 日 仓山区开展群众性的全面整风,先后召开 80 场大会,受教育人数达 3525 人,至 8 月底基本结束。

8 月 仓山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 107 人。听取区委书记郝玉生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审议通过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区法院工作报告。

9 月 临江中心幼儿园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中国人民保护儿童全国委员会联合授予“全国儿童工作先进单位”称号。被省妇联授予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10 月 15 日 省委财贸部工作组配合区委对区商业体制进行调整,纠正“大跃进”期间盲目发展商业的偏差。精简区商业机构,紧缩区商业局;撤销工业品、饮食、服务 3 个总店;精简蔬菜、废品调拨站。公社设综合商店,大队设供给部,精简职工 1342 人,占职工总数的 41.44%。

10 月 28 日 区委召开区、街、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省、市委关于“鼓干劲、反右倾”的精神,部署开展全区“反右倾”斗争。最终全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4 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 人,“严重右倾思想”46 人,严重个人主义 15 人,蜕化变质分子 1 人,敌对分子 1 人,坏分子 1 人。对这次运动造成的错案,1961 年才予以甄别平反。

1960 年

1 月 12 日 仓山区公安分局根据中央决定,摘掉全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帽子 25 人,撤销管制 4 人,免予处理 13 人。

2 月 12 日 为大办教育事业的需要,全区吸收百余名新教师。至此,全区共有公办教师 421 名,其中党员 35 名,分属 3 个党支部。

2 月上旬 区委发出“开荒造林、大兵团作战”号召,动员 6880 人到高盖山等地开山造林,在 10 天内开荒 9912 亩,造林

139 亩。

3 月 30 日 全区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活动。至年底，共实现技术革新 2384 项，攻关 182 项，提出合理化建议 3 万余条。

3 月底 在“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全区共办起大小工厂 1075 个，经整顿归并后为 348 个（其中社办 42 个，队办 306 个），参加生产人数达 7506 人，占全区居民中可以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劳动人数 9232 人的 81.3%，其中 80% 是家庭妇女。

4 月 10 日 区人委与区人民公社管委会实行政社合一，区辖 5 个街道办事处均改为人民公社。至 5 月 1 日，全区共建立 8 个城市人民公社：即以街道居民为主的临江、仓前、上渡、下渡、水上 5 个人民公社，以工厂为主的先锋、亚峰两个人民公社，以福建师院师生为主的长安人民公社。全区居民应报名入社 9858 人，批准为社员的 9203 人，占 95.8%，机关、工厂等集体单位报名入社的团体社员 35105 人。

4 月 区委决定增设农村工作部。1961 年 5 月撤消。

6 月 8 日 区委“三反”办公室提出《关于本区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意见》。同时，作为福州市和本区的试点单位，饮食行业的冷作厂和农村的后坂、黎升两个大队先期开展“三反”运动。

6 月 24 日 区先后两批下放 48 名干部到基层劳动锻炼。

6 月 仓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由区委宣传部兼管。同年 10 月为区技术革命委员会所代替。

6 月 区委增设统一战线工作部。

7 月 12 日 区委“三反”办公室提出《关于全面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意见》，对运动的必要性、指导思想、组织准备工作以及运动的对象、政策等作出了规定。

7 月 20 日 区粮食工作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区委抽调 48 名干部，深入 77 个单位调查纠正虚报冒领、套购投机、贪污粮票、涂改粮证等违法情况。

8 月 6 日 根据福州市委扩大会议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对“三反”运动作出研究和部

署，确定“三反”运动必须从反官僚主义入手，克服片面性。区委书记施荫棠在会上强调指出，全区干部队伍中存在官僚主义、贪污盗窃、浪费等问题，特别是一部分干部存在严重官僚主义，工作不深入，或有严重暮气，不执行党的政策。因此，开展“三反”运动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

10月8日 区委召开工农代表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全党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决定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到年底，区属38个单位（含系统）共精简职工8097人，占职工总人数的24.8%。其中，6个机关单位共精简职工138人，占机关单位职工总数的20%；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作的5572人，占精简总数的68.8%；抽调69名干部到仓山公社工作，充实农村第一线干部力量；组织2000多人的专业队，兴办12个自给性农场。

10月8日 区委决定从农业公社划出4个大队给城市人民公社挂钩办农场（金星大队给仓前街道、后坂大队给临江街道、东升大队给下渡街道、联建大队给上渡街道），组织闲散妇女劳力753人，办起4个农场，到1961年停办。

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仓山区人民武装部成立，韩正平任部长，蒋勇任政委。

11月15—17日 仓山区委举办有农村人民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小队长、贫农积极分子、大队长、支部书记、会计、各部门负责干部）近600人参加的训练班，通过思想动员、学习文件，反复教育、解决问题，统一认识、部署工作等步骤，对《紧急指示信》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贯彻。

12月27日 区委召开五级干部扩大会议，联系实际全面检讨“大跃进”运动期间的工作失误，研究制定落实《紧急指示信》和省委《补充规定》的具体措施，消除思想障碍，安定民心，把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真正动员起来，迅速彻底地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以整顿被破坏了的思想作风。

12月 仓山区第五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30

人。选出区妇联执委 23 人，主任王碧英。

是年 在“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下，仓山区工业企业出现盲目攀比，提出产值翻番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不计成本地扩大生产。全区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增长约 7 倍，但亏损企业由零上升到 10 家，占企业总数的 28%。

1961 年

是年初 仓山区各系统、各公社普遍根据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一般群众、层层发动、层层教育的原则，采取大会报告与小组座谈相结合、算账与回忆对比相结合、培养典型现身说法与普遍开展算账对比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组织实践相结合等办法，在广大干部与群众中开展了以生活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 月 2 日 区委决定恢复上渡、亭下山、文藻山、中洲、敦睦里 5 个自由市场和市管会，在三叉街、洋洽设服务部，突破了原来由国家统一经营副食品的格局。

2 月 2 日 区委、区人委在商业系统中调整企业所有制结构，动员 1958 年并入国营商业的小商贩退出，退还其资金和用具，组织开设合作店 88 家。

2 月 25 日 区委成立十人整风领导小组，并在全区财贸、街道、工交、机关、文教 5 个系统开展整风运动，至年底结束。

2 月 区委动员并批准 1958 年以来转为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小商贩 414 人，携带资金、用具，自由组建了 88 家合作商店，在商业体制调整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2 月 区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场以反对“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进一步揭露“大跃进”运动期间浮夸、独断和瞎指挥的作风问题，进一步纠正工作中的重工轻农、重大轻小、重产值轻效益等思想偏差，以吸取教训，教育干部，转变作风，端正政策，健全制度，纯洁组织。

3 月 10 日 区委批准区委宣传部《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抓紧时机，坚持正面

教育和大鼓干劲的方针，根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补充规定》的精神，区别不同对象，针对实际思想，运用各种形式，大讲形势，大鼓干劲，有目的、有重点地进行活的思想教育。

4月19日 区委开展一次区委领导核心的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五风”，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教训，教育广大干部。

4月25—29日 区委召开第五次常委扩大会议，揭露浮夸、瞎指挥，重工轻农，只抓大、精、尖产品和产值，挤去小商品和轻视妇女儿童工作等错误。

5月 区委进一步调整商业体制，将7家地方国营商业企业改变为集体商业企业，压缩整个商业系统的经营规模，共精简职工2069人。

6月 仓山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05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委工作报告，通过《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安排好人民生产的决定》。

8月15日 区委通知各单位把1958年后从仓山公社6个农业大队流入城市务工的农业人口逐一系列册，并动员其回乡劳动。

8月18日 区委、区人委带头动员1958年以后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干部亲属86人全部迁回农村。

8月20日 仓山区开展第四届人民代表换届选举，至9月15日结束。全区人口101605人，18岁以上有选举权的56566人，实际参选54309人，选出区人民代表107人。

8月24日 区委调整手工业，压缩企业生产规模，调整产品结构，把26个工厂调整为21个合作社、3个合作厂、2个合作小组，其中17个全民所有制工厂改为集体所有制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

11月 区人委组织社会闲散人员50人到市郊北峰创办恩顶农场，开荒种甘薯，到1962年10月农场移交市农垦局管理。

12月11日 区委提出《关于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初步意见》，要求认真贯彻“团结职工群众的绝大多数，打击极少数，教育与惩办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快、稳、细地推进运动的开展，并明确运动的重点是财贸部门以及工厂企业的领导和

掌管经济物资的采购、供销、仓库部门，在机关、街道、居民、农村、工厂职工、学校中则应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严厉打击处理二盘商、严重违法和蜕化变质分子，以配合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的开展。

12月16日 区委决定成立反对商品“走后门”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委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胡芳清任主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庆生任副主任。

12月22日 区委成立甄别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全区1959年“反右倾”斗争时受处理的干部逐一甄别。到1962年6月结束，33名受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全部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12月23—26日 仓山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区文化馆召开，出席代表107人。会议听取普选工作总结和当前形势的报告，审议并通过区人委和区法院工作报告。选出区人委委员19人，梁寰海为区长，陈善源为副区长。并选举出席市四届人大代表49人。

1962年

是年初 仓山区相继恢复开放梅坞、洋洽、三叉街、菖蒲、太平巷、河边、公园、对湖、岭后、程埔等10个农贸市场，并在三叉街、洋洽开设依托行栈，组织物资交流。同时，加强市场管理，全区共设立9个管理委员会，执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管理政策。

1月20日 区委调整农村家庭手工业，将全区2458户2933名妇女参加的88项家庭手工业归口管理。采取“三收一统”，即机电、运输、土木修建收归公社管理，闲散劳力、粗杂工、临时工的调配权归公社，各大队设生产管理员收管理费。

3月5日 区委成立精简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施荫棠任组长，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庆生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区委工交、财贸、组织、宣传等部门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着手开展精简职工、精简城镇人口工作。到12月止，全区精简干部122人，精

简职工 3048 人，有 943 人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3 月 区委调整区属工业，将全区 15 个工厂占总数的 45% 上调市管，有 20 个厂（社）下放社办。改为手工业合作社 8 家，生产小组 8 家，职工共 1237 人。年底，全区工业总产值 245.6 万元，比 1961 年减少近千万元。

6 月 区委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区 12 家全民所有制企业，保留 5 家，停办 2 家，转为集体所有制 5 家。有 4 家区集体所有制工厂转为生产合作社，18 家街道办集体所有制工厂停办。全区共精简职工 1015 人。

7 月 16 日 区委成立建筑业整顿领导小组，对 3 家区属建筑社、3 家公社（街道）建筑社进行整顿。年底，建立区建筑合作联社。

7 月 为加强对军事工作领导，区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仓山区人民武装部党组，属军、地党委双重领导，书记吴树坤。

10 月 仓山区公安分局对全区“四类”（地、富、反、坏）分子进行甄别评审，历时一年。共纠正错划 32 人，撤管摘帽 41 人，改变成分 11 人，打击违法 58 人。

11 月 17 日 区委批准 1958 年后改造的 13 个行业、1153 人小商贩退出国营企业，归各行业统一领导，实行分散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活跃市场经济。

12 月 4 日 区人委贯彻《城市居委会条例》，整顿 36 个居委会。各居委会设正副主任 5 人，下设社会福利、文教卫生、治保、调解、妇女、青年等 6 个委员会。

12 月下旬 在总结 3 个整社试点合作社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仓山区在手工业系统开展了第一批整风整社运动。参加运动的有 18 个厂（社），1279 名职工。

1963 年

2 月 1 日 区委整社办公室成立，并抽调干部 70 多人进驻厂、社开展整社运动，到年底结束。发现社干中弃工经商的有 493 人，

退社单干的有 445 人，开地下工厂的有 78 人，买卖票证的有 40 人，贪污盗窃的有 47 人，聚餐请客 3.5 万余元。工交系统 28 个厂（社）管理不善损失 11.2 万多元。

2 月 团区委开始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学雷锋活动。

3 月 5 日 仓山区成立第五届人民代表选举委员会，开展第五届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至 9 月结束。全区 18 岁以上选民 57325 人，参选 56272 人，选出区人民代表 113 人。

3 月 27 日 仓山区 150 名社会青年第一批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崇安、建阳农村落户。

4 月 20 日 根据省、市委的指示和部署，仓山区委决定以增产节约运动为中心，有计划、有步骤地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区开展新“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反铺张浪费）。全区共有 118 个单位（机关 14 个、工交单位 68 个、财贸系统 10 个、文教卫生系统 26 个），总人数 8716 人，其中干部 930 人，（县级 23 人，区级 117 人，一般干部 790 人），职工 7716 人。时间从 5 月初到 8 月中旬，分为三批开展。

4 月 24 日 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区委书记、区长在会上作新“五反”运动的“下楼”检查，开展互相批评。随后，区委、区人委的各部、局长也先后在各自单位党员会上检查。

5 月 17 日 根据市委关于机关“五反”运动转入第二阶段的指示精神，区委安排在区属机关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反铺张浪费运动，历时一个月，主要是澄清各种混乱思想，提高工作水平，改变工作作风，反对特殊化（包括经济上的特殊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感），解决严重的违法乱纪问题。

7 月 16 日 区委发出《关于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手工业合作社开展整社运动的初步意见》，决定在全区广大职工群众中进行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民所有制及大集体所有制单位中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在手工业合作社（店）中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和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整社运动。

10月9—13日 仓山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区人委礼堂召开，出席代表113人，列席57人。会议听取普选工作总结，听取和审议区人委工作报告和法院工作报告。选出区人民委员会委员19人，梁寰海任区长，陈善源任副区长。

11月15日 仓山区成立公社资产清理办公室，派员到4个公社33个大队及13个下马厂清仓算账。各公社设清资小组。

11月28日 区委在信平居委会、区木器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

12月24日 区委提出《关于贯彻市委“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报告”的意见》，确定全区74个单位首批展开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者6460人。

1964 年

2月 区委在机关干部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和“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大兴革命化”活动。3月在各行业中铺开。至年底，全区共有246个学“毛著”小组，学员3308人，涌现出学习积极分子176人。

3月 仓山区开展“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专业队伍相结合的办法，充分、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进行大清大查。区属机关、企业共揭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共214人，金额10万多元，破获投机倒把案15起，收缴赃款2.5万元。

4月6—10日 区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联系本区实际，采取边学、边对照、边找差距、边提措施的办法，提出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基层蹲点，参加劳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按党的政策去发现和解决问题。

5月14日 区先进集体、“五好”职工（社员）大会召开，总结交流先进经验。与会先进集体代表24个，“五好”职工（社员）238人。会后，在20个厂（社）推动“比、学、赶、帮”的增产节约运动。

5月 仓山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113人。听取和审议区人委工作报告和区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7月 仓山机电生产合作社试制成功全省第一台农用喷灌机，经莱农试用后正式投产。10月，送北京参加全国农业机械展览会上展演3个月，受到朱德等的好评，被评为全国喷灌机产品第一名。

8月18日 福州市人委决定，仓山区辖4个人民公社恢复为街道办事处。另设水上办事处，址设江滨路，下辖6个居委会，辖地范围以水上派出所辖区为准。

12月 区委决定从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抽调干部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到年底，共处理违法案件330起。

1965年

5月12日 仓山区企业作出调整。区塑料厂、民福厂、蚕丝社、旅具厂上调市归口管理，小商品厂、草织厂、漆筷社、文化用品社由区管理，区农肥厂下马，陶器厂交区建筑联社管理，各厂（社）聋、哑、残、跛、寡、孤、独者21人由民政科收回安置。

6月21日 全区错划的“右派分子”30人，从区委统战部移交给区公安分局管理，成为专政对象。

7月22日 区委派员进入公、检、法机关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1966年4月基本结束。

7月29日 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大会，开展整党动员，出席会议430多人。

9月15日 区工业体制调整，区属7家工厂上调归市手工业管理局管理。

11月15—17日 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区委全体委员及党员副科长以上干部参加。区委书记郝玉生传达中央及省、市委有关会议

精神，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掀起增产节约、技术革新运动的新高潮。

是年 仓山区农业战线出现解放以来增产最多的一年。粮食总量达 1561123 斤，比 1964 年增长 13.6%；蔬菜上市量达 107787 担，完成年计划的 128.3%，比 1964 年增长 17.5%；生猪上市 2003 头，比 1964 年增长 40%。此外，淡水鱼、水果和其它经济作物都获最新成绩。

1966 年

2 月 15 日 区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号召党员领导干部学习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3 月 仓山区成立选举委员会，开展第六届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全区应参选的选民 58833 人，参加选举的 58742 人，占选民总数的 99.8%，选出区人大代表 117 名。

4 月 经中共福建省委批准，施荫棠任仓山区人委区长。

5 月 18 日 区委邀请 21 位工农群众评论员座谈、学习所谓《评三家村》文章，批判《兵临城下》等电影。

5 月 全区党组织生活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8 年整党建党运动后才恢复。

5 月 业已筹备就绪的仓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未能如期举行。从此，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迫中断达 12 年之久。

6 月 19 日 区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会后，成立区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区属工厂、商店、学校干部职工及街道居民群众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6 月 24 日 区文革小组对区内“二社、二摊、一馆”（美术社、缮写社、茶摊、连环书摊、文化馆）的政治问题开展调查，揭发其“开黑店”、“说黑书”、“讲黑话”等行为。到 7 月 6 日，在 20 个书摊收缴禁书 5350 本，取缔无证商贩 410 户，整顿有证商贩 440 户，整顿美术、缮写两社及 20 家连环书摊，整顿 17 个茶摊。

7月 区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励精、福民、晨光等3所民办中学，在教育系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

8月6日 区内各中学以“东海前线红卫兵”为主体的部分学生冲向社会，进行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冲击或捣毁教堂、寺庙17处，一批由单位或个人珍藏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物品遭焚毁，不少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或被完全毁坏。

8月24日 区内各中学红卫兵1983人，配合基层干部和工人796人，先后3次搜查“地富反坏”和“牛鬼蛇神”的住宅。到10月5日，共抄查769户，批斗83人，戴高帽游街110人。

8月29日 区内福建师大附中学生成立“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此后，全区各行各业造反派组织陆续出现。

8月30日 区机关干部成立红卫队，全体干部参加，以防止外来冲击。

9月初 区内市属中学红卫兵冲击区委机关。从此，一场所谓“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全区扩展。

9月22日 全区各单位掀起大搞“红海洋”活动，区内各主干道和单位院内墙壁均用红油漆油刷作底，书写毛泽东语录；各种红色的旗帜、标语、臂章、语录本随处可见；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个人崇拜盛极一时。

9月 在梅坞路墙上出现第一张由区小学贴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此后，各学校师生、工厂工人、机关干部、居民纷纷上街贴大字报。

10月21日 区人委清理红卫兵历次大搜查收缴的物资，对枪支弹药、反动证件、迷信品等没收上缴；可疑物品扣留审查，一般物品退还本人。

10月 根据市委部署，区委在麦园路18号成立“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抽调区委、区人委干部接待外来串联的师生食宿，并购置一批冬衣、棉被供他们御寒。

11月14日 区委召开基层党员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与会170

多人，8人作学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

是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私营商业被取缔，农贸市场被当作“资本主义孳生地”相继被撤销，商品实行凭证供应。

1967 年

1月24日 区委、区人委被区机关造反派“市机联总”非法夺权，区委、区人委及所属工作机构的印章相继被收缴，造成区委、区人委机关工作无法进行。25日，“市机联总”、“工联总”九分部、工农赤卫军、教工赤卫军、附中66915、附中红九二以及仓山公社农民组织等宣布联合掌印，区委书记、区长及各部门负责人“靠边站”，区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

1月底 区内各造反派组织因对福州市1月26日群众冲击福州军区的看法不同，逐步形成对立的两大派别。区机关内部形成以“市机联总”为首认为“糟得很”的反对派和以“朝阳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一司”为首认为“好得很”的赞成派。

2月底 为制止仓山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武装部奉令派出人员进驻区委、区人委机关，并成立区人民武装部生产领导小组，由区人武部副部长曹明文任组长，下设农业、工交、街道、文教、卫生、财贸、组织、宣传、保卫、综合10个组，替代区委、区人委的全部职能，领导全区的革命和生产。

3月5日 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

3月5日 区公、检、法机关被军事管制，成立福州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仓山区军管小组，取代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的职能，直接介入全区“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且承担支援全区工农业生产任务。1968年9月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政治组下设人民保卫组，行使公、检、法职能。

8月13日 福清、闽侯县农民群众组织“五二九”农民造反总司令部以抢救“八二九”革命小将、彻底解决老区平反问题为借口，组织几千名农民进城，途经仓山区上藤路时遭到革造会工联总

九分部阻击。当进城队伍到达海关埕江边时，被对岸的台江区造反派组织枪杀3人，最终未能进城，被迫撤回。

8月23日 区人武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会后，派干部到各农业大队组建由民兵、革命领导干部、贫下中农代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1968年

上半年 区人武部组织区内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举办学习班，签订有关实现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协议，为筹组区革委会做好准备。

9月11日 经省革委会批准，仓山区改名朝阳区，陆上4个街道办事处和52个居委会也都改名，其中，临江改名朝阳，仓前改明文革，下渡改名先锋，上渡改名红星，水上未更名。

9月19日 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区革委会由29名委员组成，由军队干部、机关干部、群众代表（包括“八二九”、革造会两大造反派群众组织）“三结合”。军队代表区人武部政委吴树坤任革委会主任，军队代表区人武部副部长曹明文、机关代表陈金堡、群众代表张为忠、赵锁金任革委会副主任。区革委会取代区委、区人委职能，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后又在这三大组内下设组织、宣传、外事等职能小组。革委会还内设党的核心组，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随后，全区各街道（公社）、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也实行“三结合”，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至1969年1月，全区实现了所谓“山河一片红”。

9月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区内各大、中学校，领导学校开展所谓“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

9月 区革委会派机关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街道，开展“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

9月 区革委会组织约2万人在福建师范学院召开批斗所谓“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省、市、区代理人的大会，拉开了全区“斗、批、改”运动的帷幕。

11月7日 区革委会在省农业干校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约有150多人参加，包括原区委、区人委主要负责人，有38人被扣上“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等罪名而受到重点审查。至1969年3月学习班结束时共定案19人，除2人犯经济案件外，其他17人都属扩大化的冤假错案。

11月 区革委会对原区人委有关各局（科、所）的业务进行重建，隶属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

11月 区革委会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批判无政府主义，加强对生产业务的领导。

12月28日 朝阳区上山下乡支农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区革委会主任吴树坤任组长，区革委会副主任曹明文、陈金堡任副组长。下设区革委会上山下乡支农办公室，具体负责抓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各基层单位也相应成立上山下乡支农小组。

12月 区革委会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各街道相应成立“群众专政指挥组”，全区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和实行“群众专政”的高潮。

1969 年

2月9日 仓山区首批102名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其中，3个民办中学学生75人，红星街道社会青年、城镇居民27人），奔赴闽北山区建西县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当月组织171名知识青年到建西、沙县农村插队落户。到年底，共有8155名知青和城镇居民到闽北山区安家落户。

3月 区革委会在省农业干校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区直机关干部122人（占总数91%）参加学习，先后有30多人被扣上“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变节分子”等罪名，一批干部、群众蒙冤受屈。学习班至9月10日结束。

4月 区革委会派出6个工作组，进驻重点厂（社）开展企业整顿，帮助恢复遭破坏的生产秩序。

上半年 区工业系统各厂（社）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实现技术革新63个项目（较大的有23项）。

7月7日 区革委会举办区直机关整党学习班，到8月26日结束。此后，在区文教、卫生、企业和居民中开展整党运动，陆续恢复523名党员的组织生活，重建基层党支部60个。

7月 区革委会部署在全区开展整党建党运动。

8月28日、29日 区革委会两次召开千人大会，传达贯彻福州“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的精神，通过开展大批判，加强领导班子。

8月30日 区革委会召开千人大会，贯彻中央“八二八”命令，收缴散落在社会中的武器弹药，并着手整顿社会秩序。

9月 区革委会结合整党建党运动，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积代会）。出席代表524人，大会推选100名代表出席福州市积代会。

10月 区机关首批干部下放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到年底，先后下放三批干部计74人，到1972年才陆续调回。

11月 全区开始兴修水利，大搞平整边角地，填平死水塘、盲肠河，开山造田、围垦沙洲的群众运动。到1972年6月，全区扩大耕地面积5000多亩，水稻种植面积从3.8万多亩扩大到5.4万多亩，建立稳定高产田4.8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12月8日 区革委会举办以“四好”、“五好”活动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基层革委会及宣传队长254人参加。

12月9日 居民委员会开始改为民兵建制，设班、排、连，每班辖30至50户，排辖10班，连辖3至9排。1970年撤销，恢复原建制。

12月 盖山公社浦口大队发动群众战天斗地学大寨，广大社员早出晚归，自带干粮，奋斗三年完成冠产洲、万兜洲、门前洲围垦任务。截至1972年2月，共投入人力20多万工，运石船30艘，围

洲造田 2200 亩。

1970 年

1 月 10 日 区革委会对水上连家船、捕鱼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 8 月 10 日，动员 94 户 278 人到尤溪、沙县农村落户，共发给住房、农具补助 1.5 万多元。

2 月 区革委会在各单位全面开展“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到 7 月 12 日基本结束。共有 1411 人受审查，共揭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 181 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678 人，其中包括趁社会动乱进行贪污盗窃的刑事犯罪分子，总金额达 54 万元，追回赃款赃物达 13 万元，收缴各种枪支筒 22 支，子弹 1100 多发。

3 月 区革委会决定成立农林水组，负责指导原郊区划归仓山的 3 个镇农业、水利、畜牧、水产、蔬菜等生产。

4 月 经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中共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临时行使原区委的部分职权。核心小组由吴树坤任组长，陈金堡任副组长。

12 月 25 日 朝阳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

是年 先锋（下渡）街道冲破禁令，开始复办街、居工厂（场组）。

1971 年

1 月 6 日 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调整一批厂（社）体制和更改企业名称的通知》：原朝阳机械厂改名为福州市朝阳农业机械厂。原朝阳藤器社改名为福州市朝阳机器厂。原五金电器社改名为福州市朝阳机械仪表厂。原建筑三社改名福州朝阳无线电修造厂。原朝阳机械厂木工钻部分划出成立福州市朝阳工具厂。原修车阀门社阀门部份改名福州市朝阳阀门社。将修车、修鞋、弹棉、刻印社合并，成立福州市朝阳手工业服务社。

3 月 15 日 区机关开展整风，进行反骄破满的自我教育运动。

5月5日 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调整一批厂（社）体制和更改企业名称：朝阳阀门社改为朝阳阀门厂；原修车阀门社修车部分划出成立福州朝阳修车社；原朝阳冷作社改名为福州朝阳冷作厂；原朝阳区文化社改名福州朝阳印刷厂；原朝阳石棉制品社改名福州市朝阳石棉制品厂。

5月21日 区革委会举办党员干部“批陈整风”学习班，批判陈伯达“天才论”等唯心主义，整顿作风。到10月8日共举办3期。

9月17—19日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区礼堂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66名，列席代表74名。大会听取并审议吴树坤代表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届委员会。20日，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朱荣义、陈忠勇、陈金堡、陈明斋、杨水才、吴树坤、隋文江共7人。吴树坤任书记，陈忠勇、陈金堡任副书记。10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批复同意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届委员会成员名单。

10月8日 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朝阳区搬运社和朝阳区竹木运输社合并，成立朝阳区运输社，撤销朝阳区运输联社机构。朝阳区运输社成立革命委员会，下按班、排、连建制，经济实行统一核算。

10月30日 区委召开基层党委、支部负责人会议，认真学习中央陆续发出的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大事来抓，并确定以红星街道、农械厂、北园大队、红卫兵小学为传达试点单位。11月1日，区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全面的传达，之后在全区层层传达。

12月 全区“农业学大寨”投入劳力50万工，兴修水利44处，开山造田1100亩，扩大双季稻5000亩，粮食总产8543万斤，

在全区 520 个核算单位中有 85.6% 增产增收增分配。

1972 年

1 月 全区普遍开展以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为主要内容的“批林整风”运动。到 1974 年结束。

3 月 17 日 区委决定，在建新公社红塘大队劳光生产队拨出水田 63 亩，金山生产队拨出山地 20 亩作为居民和知识青年插队劳动的基地。

5 月 5 日 区委根据市委对市、区两级机关整风的部署，在区机关开展整风。这次整风，以中央 12 号文件为纲，以毛泽东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个基本原则，联系实际，围绕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团结和加强组织纪律等 3 个方面整顿领导和机关作风。

5 月下旬 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到本区作“优选法”报告会。会后，全区各工厂、企业建立“优选法”推广应用领导小组 43 个，提出研究项目 147 项，试验 86 项，取得效果的 43 项，正式投产的 25 项。

6 月 10—14 日 区革委会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省、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本区“复课闹革命”以来的教育工作情况，并对各级党委（支部）如何对教育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问题进行认真讨论，统一认识。区委决定，由区委常委隋文江分工抓全区教育工作；各公社党委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第一把手要管，应分工负责同志抓教育，并配好专职教育干部 1—2 人；城郊小学按公社建立党、团支部，按校或片成立党团小组，城区小学成立党总支，并按街道划片成立党支部，加强党对学校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校革委会（革领组）由学校干部、教师、工人、贫下中农代表 5—7 人组成，城郊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由公社党委审查，报区革委会政治组批准。

6 月 23 日 区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

决定》，号召全区下定决心，艰苦奋斗，为实现大寨式区而努力。

7月13日 区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区下定决心，艰苦奋斗，为实现大寨式区而努力奋斗。

7月 朝阳农械厂研制成功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参加华东六省农业机械现场交流会，填补了全省空白。

9月2日 区委发出《关于传达中央12个文件的具体安排意见》，决定从9月7日开始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中央文件，要求城区在9月20日左右，农村在9月25日前完成传达任务，全面开展以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为内容的“批林整风”运动。指出：传达批林整风文件是全党的中心任务，各级党委（支部）要加强领导，切实抓紧、抓细、抓好，并以传达学习中央文件为动力，妥善安排好学习、工作和生产，做到学习和生产两不误。

12月3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仓山区“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军队代表奉命返回部队。

是年 为缓和副食品供需矛盾，区内义序、郭宅、螺洲、城门、林浦、上洋、下镜等农村开放7个农贸市场。另在港头设零星蔬菜、小淡水、小杂果销售点。

1973年

1月13日 区召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到7月3日止，共有758名知识青年上山插队，有387名倒流回城的知青返回农村。

7月7日 区革委会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21号文件（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并派出336名干部深入基层调查，动员140名知青回山区。

7月 区革委会成员进行调整，“三结合”的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退出领导班子。福州军区、省革委会免去吴树坤的朝阳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陈明斋为朝阳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9月18—22日 区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大”精神，提出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

运动。

12月25日 区委研究决定，成立朝阳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1974 年

1月10日 全区开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至2月8日，先后召开4次大会，批判“孔孟之道”、“三字经”、“千字文”、“天才论”等。

2月4日 区革委会召开区、公社、街道全体干部、民警和区属工厂支部书记等千人会议，宣读、讲解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精神，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

2月8日 区革委会召开全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狠批“孔孟之道”、“三字经”、“千字文”、“天才论”等，基层党委、总支、支部和革委会、革领组负责人，工、农、青、妇群众组织负责人，民兵排以上干部、生产队长，以及全体机关干部、民警和中小学教员，共6000人参加。

10月18—20日 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精神，区委书记吴树坤在会上讲话，对全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作了总结。

12月21日 区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全年共破获投机倒把大案29起，金额107万多元。

是年 全区657名知识青年，分三批上山下乡。

1975 年

是年初 区委派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14个厂（社）、3个院（所）和2个街道进行企业和领导班子整顿工作，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促进经济建设。并派干部到建新公社开展农业学大寨试点工作。

2月 城市区划作出调整，区属建新、城门、朝阳3个公社及

红星农场划归郊区管理。

3月22日 省委任命陈坚石为中共朝阳区委书记，免去吴树坤中共朝阳区委书记职务。

4月5日 朝阳区革委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动员670人到闽侯、将乐、北峰等18个大队插队落户。到年底，区内共有48个单位在农村公社建立了知青点。

4月23日 区委召开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市委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精神，着手部署落实政策工作。到年底，共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各种问题108人，变动结论的有36人。

4月 朝阳区委、区革委会工作机构进行了整顿，恢复区委办公室，与区革委会办公室合署办公。撤销区革委会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其下辖的各组、局、办分别划为区委、区革委会的工作机构。政工组组织组改为区委组织组，政工组宣传组改为区委宣传组，政工组统战组改为区革委会统战组。另外，设立农林水办公室、工交办公室、供销社、科委等。

5月 区委分别举办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学习班，集中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查摆派性具体表现，揭发派性的危害性。

6月 区委决定成立对台工作办公室。

6月9日 区委贯彻“五七指示”，向各小学选派“工宣队”。到年底，有260名“工宣队员”，进驻18所小学。

8月26日 区委、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当前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强调要求：贯彻执行安定团结的方针，坚决清除资产阶级派性；抓革命，促生产，把生产搞上去，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8月 区委举办干部“学理论、抓路线”学习班，清除资产阶级派性，整顿思想，整顿企业，促进安定团结。

9月4日—10月19日 区委举办区机关干部“学理论，抓路线，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正面教育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把学习、揭摆和批判贯穿

全过程。机关干部 118 人参加，占机关干部总数的 50%。

10 月 25 日—12 月 4 日 区委举办第二期干部“学理论，抓路线，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促进领导班子和公安队伍革命化的群众性自我教育。基层党支部以干部、机关干部、基层骨干、知情者、公安干警等 200 人参加。

10 月 区委抽调干部 71 人组成普及大寨工作队，下分 7 个工作组，分别进驻建新公社所属建新、建红、台屿、建中、燎原等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1 月 10 日 区委转发《朝阳公安分局关于认真贯彻市委 128 号文件，开展打击行凶犯罪，整顿社会治安的请示报告》，要求广泛深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把打击行凶犯罪活动和清查、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匕首、凶器结合起来；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

11 月 朝阳无线电修造厂试制成功 BDT—10 超声波探伤仪，为省内首创。经石油部鉴定通过，于 1976 年正式投产。

12 月 1 日 区委落实“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和随迁农村的 10 名小学代课教师政策，全部收回转正定级。

12 月 10 日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免去陈明斋朝阳区革委会主任职务，任命陈坚石为朝阳区革委会主任。

12 月 12 日 区委提出《关于整顿企业的意见》，并抽调 110 名干部、积极分子组成 17 个企业整顿工作组，分赴 17 个厂、社开展整顿工作，后逐步把全区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推动全区国民经济搞上去。企业整顿着重抓好三件事：一是整顿好企业领导班子；二是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三是搞好设备维修。

1976 年

4 月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展开，区委再次受冲击，区机关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

7月 朝阳电器厂试制成功 DW—10 柱上油断路器，经省机械厅鉴定为省内首创，获福州市科技奖。

10月19日 区委向全区干部群众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10月23日 全区工人、学生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到11月15日，全区共召开群众庆祝大会762场、声讨“四人帮”大会197场，有7万多人上街游行，欢庆胜利。

12月 区委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材料组，并召开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开展全区的揭批工作。同时，区委深入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在全区范围内着手清查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7 年

1月 区委举办机关干部、基层支部负责人、政工干部共250人参加的学习班，集中传达、讲解中央下发的《关于印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后又分头到厂、社、街道、学校、医院向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传达和讲解。至1月11日，全区共召开群众性的传达、讲解会172场、31890人次。

1月 朝阳机电厂研制成 DE—1 电动喷灌机，经福州市鉴定，该机可用水、农药、化肥同时混合喷灌。福建省确定为“六五”期间全省推广的新技术产品。

1月8日 区“工业学大庆”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500人，特邀代表66人。之后，全区工交企业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活动。

3月3日 朝阳农械厂经过6年研制，试制成功东方红—20联合收割机。1978年4月又试制成功闽江150型稻麦联合收割机。

4月15日 全区各系统、各单位开始传达和宣讲中央下发的《关于印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进一步开展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工作。至4月

29日，共召开大会158场，到会人数30403人次，占应到人数的90%。

8月 区委举办多期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119人，重点审查24人，并对积极参加“四人帮”帮派组织活动的有关人员和造反派进行隔离审查和停职检查。

8月 根据省、市委扩大会议精神，区委结合清查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由点到面在全区开展“一批双打”（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斗争，将区属工交、建工、房管和街道等系统的20个厂、社作为第一批单位，进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

8月 区委成立以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申喜盛为组长的打击资本主义势力领导小组，并提出《关于揭批“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罪行，坚决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企业整顿的初步意见》，决定在区属各基层单位中开展企业整顿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运动。整顿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和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加强企业管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9月24—27日 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大精神和省、市委的传达贯彻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10月8日 区委发出《关于全面开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打击反革命、打击资本主义势力、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意见》，要求全区各系统、各单位党组织在加速抓紧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把领导重心逐步转移到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揭批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把他们颠倒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纠正过来。同时，大力打击反革命，打击贪污犯罪活动，集中力量在10、11两个月打一场总体战，促进工业

生产和各项工作。

10月10—11日 区委召开动员大会，传达贯彻福州市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在全区全面开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打击反革命、打击资本主义势力、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至年底，全区共召开揭批大会117场，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704人。

是年开始相继撤销魁岐、湾边、三叉街3个检查站，并在三叉街、太平巷、仓后街、洋洽、堤边、程埔6处增设“三小”（零星蔬菜、小淡水、小杂果）市场。1978年改为农贸市场。

1978年

3月7日 区委抽调干部26人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仓山公社的联建、湖边、先农3个大队开展“一批双打”斗争。

4月14—17日 仓山区第七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出席代表283人。选举陈坚石为区革委会主任，申喜盛、陈善源、王恭贵、严举乾为副主任，选出出席福州市七届人大代表82人。

4月19—21日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75人。大会听取并审议陈坚石代表区委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区，为搞好我区党的建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届委员会，选举产生出席中共福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11人。21日，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常委会委员陈坚石、申喜盛、陈忠勇、马长春、王恭贵、刘依细、陈善源、贺超共8人。陈坚石任书记，申喜盛、陈忠勇任副书记。大会还选举产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申喜盛、陈凤和、李香远（女）、李宗鑑、陈心榕、所荫溥、贺超（女）共7人。申喜盛任纪委书记，贺超、陈凤和任纪委副书记。

4月26日 区委调整充实揭批“四人帮”和“双打”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申喜盛任组长，林恩全、高荣生任

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林恩全兼任主任。

4月26日 区委恢复和调整充实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贺超任组长，区纪委副书记陈凤和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推动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至9月1日，全区立案审查815人，已复查落实的540人，占总数的66.2%；原区管干部分配不当的有39人，1月至7月间调整工作的29人，可以工作还未适当安排的10人，因病长期不能工作的6人。

4月 全区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有牵连的人和事122人，已基本查清的有112人，占91.8%，绝大部分人员都检查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全区属于清查对象的25人，已查清和基本查清的21人，其中逮捕5人。

5月1日 朝阳区复名仓山区。12月，各街道、居委会均恢复原有名称。

5月15日 区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申喜盛任组长，开展对全区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摘帽和改正工作。至年底，全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66人中，原已摘帽的37人，未摘帽的28人予以全部改正摘帽；未安置者全部给予安置，原迁往山区的35人及家属55人全部迁回仓山区落户。

5月 仓山区委传达贯彻省委〔1978〕12号文件，开始落实政策工作，以复查落实机关干部立案审查对象为重点，7月开始全面铺开。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机关干部39人（原区委领导3人由福州市复查，不计在内），这次复查给予改变定性的2人，平反的2人，推倒结论的7人，维持原审干结论的4人，维持审干结论补充新问题的2人，长期未作结论给予结论的2人，去掉不实之词澄清事实的4人，处理偏严给予减轻处分的3人，自杀改写去世的1人，以上复查变动的合计27人，占总数的69%；维持“文化大革命”以来定案不变的6人，维持历次复查结论的4人，右派摘帽的2人，合计12人，占总数的31%。

6月14日 区委提出《关于在常委中开展小整风的意见》，决

定以区委常委为主，吸收区革委会副主任和区委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参加，开展一次小整风运动，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联系实际，澄清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改进领导作风，振奋革命精神。7月28日，区委召开机关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大会，区委书记、区革委会主任陈坚石代表区委常委会作了小整风运动的小结，提出了初步整改措施。

7月 区恢复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卓宝镇（兼）。

7月 全区企业恢复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奖金制度。

10月17日 区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基本结束，对“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立案的784人进行全面复查，改变结论的102人，修改结论的50人，纠正冤假错案的82人，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184人予以平反。

10月20—23日 区委召开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市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部署在全区开展“一批双打”斗争，要求以整风的精神，进一步狠抓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中心，把“双打”斗争迅速推向新的高潮。会议还提出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把1978年工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完成得更好，为1979年更大跃进打下良好基础。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基层单位第一、二把手、驻单位工作队正副队长共210人参加了会议。

10月20—23日 区委召开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与会有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基层单位第一、二把手、驻单位工作队正副队长，共210人参加。传达贯彻市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部署在全区开展“一批双打”，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完成1978年的工业生产和各项工作。

11月1日 福州市工业作出大调整，区属40家企业上调市归口管理，区工交办、工业局撤销。区仅留下街道工业企业。

11月 市委决定区开设敦睦里等6处为农副产品贸易市场。

12月20日 在省、市委统一部署下，仓山区对刑事犯罪分子进行集中搜捕，共出动公安干警、党政干部、民兵、联防队员、基层干部319人，对重点地区、复杂场所等进行搜查，除行动前拘捕

的 23 人外，经过搜捕抓获 67 人，占需捕对象的 78.8%。

1979 年

1 月 全区停止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截止 1978 年底，共动员 14748 人上山下乡。

2 月 区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讨论落实政策工作，并发出《关于做好落实政策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各街道、各单位、各级党组织以及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必须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加强领导，组织力量，采取措施，排除干扰，加快速度，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工作。《通知》还明确了任务分工。

2 月 2—10 日 区委召开区、街道、居委会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 1 月份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如何把全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国共产党福州市仓山区历届委员会 领导机构成员任职时间表

(1949—1978)

(一)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水上区工委成立至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一次党员大会前 (1949.11—1956.4)

1949年11月7日,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李新华任书记。1951年6月,中共福州市水区工作委员会成立,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张汇三任书记。1952年7月,中共福州市委决定撤销中共仓山区工作委员会和水上区工作委员会,改建为县级党委,分别成立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员会和水上区委员会,书记分别是李新华和张汇三。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

工委书记:李新华(1949.11—1952.7)

区委书记:李新华(1952.7—1952.12)

张质珉(代,1952.12—1953.4)

(1953.4—1954.5)

姜彬(1954.7—1956.1)

郝玉生(1956.1—1956.4)

区委副书记:姜彬(1953.7—1954.7)

孙志忠(1954.9—1956.4)

郝玉生(1955.8—1956.1)

中共福州市水上区委:

工委书记:张汇三(1951.6—1952.7)

区委书记:张汇三(1952.7—1954.7)

汪茂森(1955.1—1956.4)

区委副书记:张心绪(1954.7—1956.4)

(二) 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一次党员大会后至朝阳区革命委员

会成立前 (1956.4—1968.9)

1956年4月12日,中共福州市委作出决定,将仓山区委和水上区委合并成立仓山区委。并于4月12日至15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州市仓山区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一届委员会。1956年至1958年,区委设书记处。

书 记:郝玉生 (1956.4—1968.9)

第 二 书 记:孙志忠 (1957.7—1958.7)

第一副书记:孙志忠 (1956.4—1957.7)

副 书 记:汪茂森 (1956.4—1958.7)

郭立德 (1958.8—1959.12)

梁寰海 (1959.4—1963.10)

施荫棠 (1959.8—1964.1)

叶聿芳 (1960.2—1961.5)

蔡水党 (1960.2—1961.5)

林良浦 (1960.8—1963.9)

原树华 (1961.1—1961.5)

吕学仁 (1964.2—1968.9)

温乐亭 (1965.4—1968.9)

常 委:(书记均为常委,略)

孙荣桂 (1956.4—1956.9)

施荫棠 (1958.11—1959.8; 1964.1—1968.9)

高月梅 (1958.11—1963.4)

徐坤义 (1956.12—1960.4)

王恭贵 (1959.4—1960.5)

林良浦 (1959.10—1960.8; 1963.10—1964.7)

陈景培 (1962.12—1965.3)

胡芳清 (1962.12—1966.3)

韩正平 (1962.12—1965.9)

姜成元 (1965.6—1966.1)

(三) 朝阳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 (1968.9—1976.10)

1969年9月11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仓山区改名朝阳区。

19 日，朝阳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设委员 29 名，由军队干部、机关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区革委会集党、政机构于一体，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取代原区委、区人民委员会的职能。

主 任：吴树坤（1968.9—1973.7）
陈明斋（1973.7—1975.12）
陈坚石（1975.12—1976.10）

副 主 任：曹明文（1968.9—1971.9）
陈金堡（1968.9—1973.7）
张为忠（1968.9—1973.7）
赵锁金（1968.9—1973.7）
陈明斋（1971.9—1973.7）
袁士杰（1973.3—1975.5）
陈善源（1973.5—1976.10）
陈坚石（1973.8—1975.12）
申喜盛（1975.12—1976.10）
宋 坚（1975.12—1976.10）
王恭贵（1976.6—1976.10）

（四）中共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后至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前（1970.4—1971.9）

1970 年 4 月，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中共福州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临时行使原区委的部分职权。

组 长：吴树坤（1970.4—1971.9）
副 组 长：陈金堡（1970.4—1971.9）

（五）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至中共福州市仓山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前（1971.9—1978.4）

1971 年 9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二届委员会。

书 记：吴树坤（1971.9—1975.3）
陈坚石（1975.3—1978.4）
副 书 记：陈忠勇（1971.9—1978.4）
陈金堡（1971.9—1973.7）

陈明斋 (1973. 7—1975. 12)

陈坚石 (1973. 9—1975. 3)

申喜盛 (1975. 12—1978. 4)

常 委: (书记均为常委, 略)

朱荣义 (1971. 9—1973. 7)

杨水才 (1971. 9—1973. 9)

隋文江 (1971. 9—1975. 2; 1976. 10—1976. 12)

陈明斋 (1971. 9—1973. 7)

黄鸿铭 (1973. 5—1975. 3)

袁士杰 (1973. 3—1975. 4)

陈善源 (1973. 4—1978. 4)

陈扬光 (1973. 12—1975. 3)

刘 英 (1976. 12—1977. 11)

王恭贵 (1973. 10—1978. 4)

高瑞泰 (1977. 5—1977. 11)

贺 超 (1977. 11—1978. 4)

(六) 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1978. 4—1978. 12)

1978年4月19日至21日, 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中共福州市朝阳区第三届委员会。

书 记: 陈坚石 (1978. 4—1978. 12)

副 书 记: 申喜盛 (1978. 4—1978. 12)

陈忠勇 (1978. 4—1978. 12)

卓宝镇 (1978. 11—1978. 12)

常 委: (书记均为常委, 略)

马长春 (1978. 4—1978. 12)

王恭贵 (1978. 4—1978. 12)

刘依细 (1978. 4—1978. 12)

陈善源 (1978. 4—1978. 12)

贺 超 (1978. 4—1978. 12)

蒋 勇 (1978. 6—1978. 12)

后 记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部署，经中共福州市仓山区委批准，《中国共产党仓山历史·第二卷（1949—1978）》的编纂工作于2009年底正式启动。中共仓山区委高度重视地方党史二卷的编纂工作，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党史工作，从经费和人员等方面对编纂工作予以充分保障。区委杨新坚书记亲自为本书作序，区委分管党史工作的领导多次对编纂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意见。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既努力体现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又不回避党所犯过的错误和曾走过的弯路，并力求突出反映地方党史的特色。

本书从提纲的拟定、资料的征集，到编写定稿，前后历经六载，期间几易其稿。在编纂过程中，省委党史研究室逢立左主任、黄玲副主任以及市委党史研究室王命瑞主任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帮助。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黄超凡亲临指导并对全书进行审改，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副调研员杨占城修改和完善了有关章节。区委和区直有关部门领导及有关老同志、党史专家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福州市档案馆、仓山区档案馆等单位在编写人员查阅、复印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区直部分单位及部分镇、街提供了相关党史资料，建新镇、盖山镇编写

了本地的党史二卷。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写史难，写当代史更难。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虽竭力搜集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认真仔细地加以分析判断，多方征求意见，力求写得客观、公正些，但限于学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加上有些档案文献资料的缺失，使本书难免存在错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历史当事人和史学界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 者

2015 年 12 月